



图说香港

抗战

叶曙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说香港 抗战



请关注“广东教育出版社”

上架建议：抗战·传记

ISBN 978-7-5548-0169-7



9 787554 801697 >

定价：79.00元



图说香港 抗战

叶曙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说香港抗战 / 叶曙明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8-0169-7

I. ①图… II. ①叶…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香港—图集
IV. ①K265.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21117号

策 划: 应中伟 林玉洁
责任编辑: 林玉洁 李木子 李 鹏
责任技编: 姚健燕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林玉洁

图说香港抗战

TUSHUO XIANGGANG KANGZHAN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889毫米×1194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395 000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169-7

定价: 7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第一篇 香江怒吼 / 1

筑起民族精神的堡垒 / 2

手无寸铁兵百万 / 18

风雨歧路中的文化人 / 27

雷火起于草间 / 35

第二篇 蒙尘之珠 / 59

和平已到绝望时 / 61

12月8日那一天 / 77

九龙陷落 / 92

黑色圣诞节 / 107

第三篇 再会香港 / 129

投奔怒海 / 131

胜利大营救 / 144

生与死之间 / 160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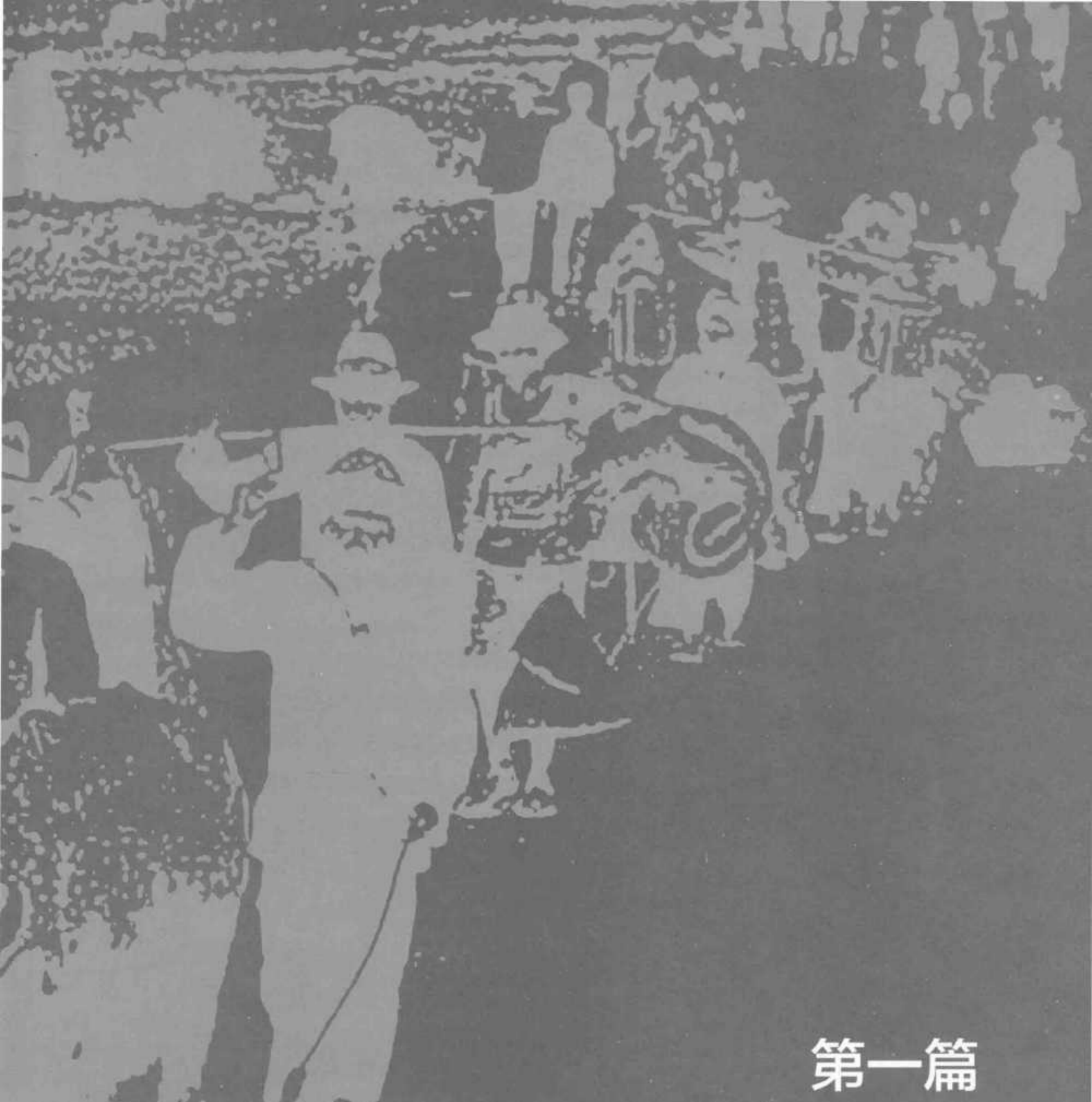
第四篇 苦尽甘来 / 179

艰难岁月 / 182

港九独立大队 / 198

铁鹰与猛虎 / 211

最后的战争 / 221



第一篇

香江怒吼《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世界，横流方剧。法西斯主义就像一场大瘟疫，在全球肆虐，人类的命运面临着一场生死大决斗。香港，这个位于东经114° 15'、北纬22° 15'的太平洋小岛，“细眉细眼”，精致玲珑，面积不过81平方千米，加上九龙半岛、新界及262个离岛，亦不过区区1000多平方千米，是中国963万多平方千米辽阔国土的万分之一，如同沧海中的一颗宝珠，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她的所在，然而，此时此刻，她却第一次有了与全体中华民族共存亡，与整个文明世界同兴废的感觉。

筑起民族精神的堡垒

一轮巨大的火红夕阳，正在缓缓西沉。天空被照耀得一片通红，薄薄的烟霭，如同燃烧一样。俯瞰着维多利亚港的太平山，在火烧云的烘托之下，愈发显得苍凉与雄浑。这里就是香港，北面是神州万里，江山如画；南面是浩瀚大海，波涛茫茫。在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帆影云

1931—1941

年，香港是中国进口军用物资的重要口岸，成为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图为当时运送海外援华物资的香港码头



集，各种大风帆船、电船、铁驳船，穿梭往来；夹杂着一些火轮船，频繁地入港、离港，大片浓黑的煤烟，在密如丛林的船桅上方，升腾、缭绕、缓缓扩散。

从远处瞭望，感觉不到气氛的异样，但其实外弛内张，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香港的局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失守。随后，南京、徐州、九江等城市相继沦陷。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真的要亡了吗？但中国政府誓言：中国不会亡，中国必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绝对没有局部解决的可能，绝对没有速战速决的可能。

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大部分港人的祖籍都在广东或福建，战局的发展，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们的心。北方炮火纷飞，民众争相逃往南方，就像太平洋的海潮一样，从四面八方漫过了五岭，漫过了珠江三角洲，一波一波涌向香港。在省城开来的佛山号、金山号、泰山号轮船上，在广九线的火车里，在深圳河两岸，人们拖儿带女，挑着箩筐、推着木车，朝着茫茫大海，蹒跚而行。听着难民带来各种乱世凶年的噩耗，港人北望神州，满怀忧愤，难遣肝肠寸断之痛。

每天傍晚，湾仔大道中、中环大笪地荷李活道、西营盘大马路和九龙油麻地上海街、旺角山东街等地，在星罗棋布的凉茶铺里，许多市民围聚在昏暗的灯下，一边喝着凉茶，一边听电台广播，或看晚报新闻。每逢传来日军攻占某地的消息时，便叹息不已；听到中国军队反攻夺回某地时，便欢呼雀跃。

早在1935年，香港的电影人激于抗日爱国热情，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大观影片公司出品了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生命线》。但当时港英政府认为影片会影响与日本的关系，禁止在香港上映。《生命

《生命线》剧照



线》成了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然而，中国内地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整个国际形势都在急剧逆转，香港的抗日气氛，也日益浓烈。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上海，沦为孤岛后，国产电影的制作中心，已转移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电影市场，仍然充斥着各种歌舞升平，把“乾隆下江南”一类无聊题材，亦搬上银幕，翻炒再翻炒，甚至许多诲淫诲盗、格调颓废的影片，亦畅行无阻，被人批评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一场电影界的座谈会上，著名电影人蔡楚生拍案而起，怒斥“日本人以两百万元来收买华南电影界，借以破坏我们抗战宣传的重要工具”，博得影界同仁的齐声附和。当蔡楚生振臂疾呼，要打倒电影界“两重人格”的投机商时，人们报以热烈掌声。1938年，在进步电影人的推动下，香港发起了“电影清洁运动”。国民政府的中央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也应香港电影界之请，在港设立检查机构，使那些投机影片商不能肆意地违背抗战原则，一味摄制颓丧人民意志、诲淫诲盗的无聊电影。

1938年初，在港九的皇后戏院、中央戏院、娱乐戏院、东方戏院里，放映着《神秘之花》《慈母心》《泰山出险》一类电影，但没有一部影片能够像3月2日公映的《最后关头》那样，引起巨大轰动，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旋风。香港中央戏院和新世界戏院公映一周，场场爆满。随后在九龙平安戏院上映，也是座无虚席。当影片中人物高喊出“一定要把侵略者驱逐出去”的口号时，戏院中掌声雷动，震撼屋宇，甚至有观众跟着大声疾呼。多少人为之泪洒衣襟，多少人热血沸腾。

这部影片的诞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一笔。它是由一批香港电影人发起，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南粤影片公司、南洋影片公司、合众影片公司、全球影片公司、启明影业公司等多家电影公司联合摄制。影片的制作资金，由香港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人群策群力，集腋成裘。粤剧老倌薛觉先、音乐家兼电影导演钱广仁各捐100元港币，吴楚帆、黄曼梨、陈云裳等电

薛觉先





1 / 何甘棠
2 / 南海十三郎
3 / 马师曾演出剧照

影艺术家也纷纷解囊，共襄盛举。香港电影界赈灾会主席何甘棠一人独捐1000港元。连电影的胶片也是由电影公司和电影工作者捐出的。

影片分成为七段，分别由陈皮、李芝清、南海十三郎、苏怡、赵树燊、高梨痕分别执导，最后一段由集体导演。薛觉先、马师曾、唐雪卿、谭兰卿、白燕、吴楚帆、谢益之、林坤山、邝山笑等著名艺术家领衔，香港、广东、上海数百位影剧明星联袂演出，何甘棠也客串出演，甚至还邀请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现身银幕。当时他还没有公开投敌，是一位“焦土抗战”的鼓吹者。影片讲述了各界人士共赴国难，抗日救国的悲壮故事。

在这些导演与演员中，不乏香港社会名流和誉满当世的艺术大师。何甘棠本名何启棠，是香港第一望族何启东（何东）的同母异父弟弟。由于他热心公益，一生曾四次获得国民政府授予嘉禾勋章，并获英国圣约翰救伤总会授予爵位奖章及慈善银奖章，1928年，获英国政府授予OBE勋章。何甘棠有一位世界闻名的孙子——李小龙；而他另一位兄长何福当过怡和洋行、沙宣洋行买办和定例局（立法局）议员，是



3



薛觉先20世纪30年代的演出广告

当时的华商五巨头之一。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的澳门赌王何鸿燊。

马师曾和薛觉先这两个名字，在戏剧舞台上，更是珠璧相映，璀璨夺目，其艺术成就，超越了粤剧舞台，堪称国之瑰宝。马师曾是广东顺德人，所饰演的丑角，极受观众喜爱。独创的“乞儿腔”，更是风靡省、港、澳和海外华人地区。薛觉先也是顺德人，10岁开始演戏，能文能武，生、旦、丑、净、末诸行当，行行皆演，当当皆精。他的反串花旦，全行第一。唐雪卿是他的妻子，广东香山（现中山、珠海）唐家村人，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侄女。

南海十三郎本名江誉镠，又名江枫、江誉球，广东南海张槎塍边村人，是著名粤剧编曲家，创作过《寒江钓雪》《心声泪影》《梨香院》《七十二铜城》等脍炙人口的唱本。他的父亲江孔殷是广东大名鼎鼎的巨绅，师从康有为，参与过“公车上书”。慈禧太后曾赐给江孔殷120盆兰花，令他名声大噪。清末同盟会革命时代，许多革命党人都与江家过从甚密，连孙中山都是座上宾。江孔殷的名字，在省、港、澳地区，有着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最后关头》群星熠熠，光彩耀眼，然而，它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经典，却是因为它代表了在国难深重的时代，香港电影人的团结精神，代表了香港的主流民意。无论制作方式，还是影片内容，都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它是香港第一部正面宣传抗战、号召全民上前线杀敌救国的电影，第一部义拍电影，第一部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集体演出的电影，充分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众志成城”的本旨。

影片在内地、港澳、南洋、南北美、小吕宋、南非

南海十三郎





《最后关头》剧照

拍卖上映权所得2.39万元，除以3000元为前方将士购置雨具外，其余全部购买救国公债。在抗战初期的艰苦岁月中，《最后关头》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后来被列入中国百部名片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1938年10月21日，随着华南最大城市广州的沦陷，日军铁蹄侵逼惠州、东莞、宝安，香港已进入炮火射程之内。人们从空气中已能闻到浓浓的硝烟味。维多利亚港的上空，就像涌起了暴风雨前的乌云，骤然间阴影如幕，海水如沸。

这一年，由赵树芹编剧，赵树燊执导，吴楚帆、石友宇、白燕、杜宇、曹达华、黄寿年等人联合主演，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出品的《四子从军》，描



《上海火线后》剧照

写四兄弟奋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故事。由汤晓丹执导，白燕、李清、卢敦、陈倩如、张瑛、黄寿年等主演，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出品的《上海火线后》，描写日军侵占上海后，普通小市民的苦难生活。这部影片与《小广东》（汤晓丹、罗志雄导演，1940年6月公映）、《民族的吼声》（汤晓丹导演，1941年7月公映）合称“抗战三部曲”。

电影艺术家们还把一些真实的战役直接搬上银幕。由蔡楚生编剧，司徒慧敏执导，陈云裳、李清、周志诚、陈天纵、曹达华、高威廉主演，新时代影片公司出品的《血溅宝山城》，描述“八·一三”上海之战，中国军队坚守宝山，誓死不让寸土，直至弹尽援绝，全部殉国的壮烈故事。由鲁司执导，邝山笑、小燕飞、伊秋水、黄丽丝、廖梦觉、何大傻等人主演，中南光荣影片公司出品的《八百壮士》，再现了国民革命军第88师谢晋元副团长率领420名将士，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孤军抗敌，血战四昼夜的英勇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民族的吼声》剧照



《流亡之歌》剧照。此影片反映沦陷区民众的苦难生活

蔡楚生



蔡楚生，广东潮阳县（今汕头市）铜孟镇集星村人，出身贫寒，只读过四年私塾。据电影编剧凌鹤在《蔡楚生论》一文中说，蔡楚生到15岁时还不会写信，那时他正在一家店铺里做学徒工，是这家店铺的账房先生讲自己的儿子才11岁就会写信的一番话刺激了他，于是便在一天的杂事做完之后，拖着疲倦的身体，钻进“三层楼上白鸽笼似的卧房”里，“从货箱的旧报纸中认识他所要认识的字句”。

蔡楚生从临时演员做起，当过剧务、美工、宣传、场记、置景、副导演和编剧。1931年夏，他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导演。1933年，蔡楚生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他曾执导反映上

海“一·二八”抗战的电影《共赴国难》和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影片《渔光曲》，蜚声影坛。上海沦陷后，他遭到日军的缉捕，辗转逃到香港。在港期间，他不仅创作了《血溅宝山城》，还创作了另一部抗战电影《游击进行曲》（司徒慧敏执导）的剧本。

不久，大地影片公司在香港成立，作为宣传抗战的阵地。蔡楚生当仁不让，亲自执导“大地”的第一部国语电影《孤岛天堂》，该片改编自赵英才的小说，描写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在一位东北流亡舞女的协助下，展开锄奸行动的惊险故事。蔡楚生亲历过上海抗战，有切身感受。他邀请影坛巨星黎莉莉、蓝马和香港本地艺人李清、姜明等加盟演出，影片在1939年推出，大受欢迎，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

自1937年以后，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激励民众抗战斗志的粤语黑白、彩色电影，诸如《边防血泪》《公敌》《肉搏》《焦土抗战》《大义灭亲》《儿女英雄》《时代先锋》《锦绣河山》《女性之光》《回祖国去》《时代先锋》《铁血锄奸》《保卫大四邑》《前程万里》等。这些作品，如号角，如鼙鼓，如旗帜，如火炬，如云合雾集、风激电飞的天象奇观，搅动着香港民众的血脉，激励着他们的觉醒奋起。



《血溅宝山城》剧照



《孤岛天堂》剧照。此影片反应沦陷区民众的反抗精神

一些内地拍摄的抗战影片，也在香港上映，如欧阳予倩编剧，陈云裳、梅熹、韩兰根、刘继群、章志直、殷秀岑等人主演，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华成制片厂出品的国语片《木兰从军》，在香港也获得好评如潮。报纸上每天以大幅广告宣传：

“历史古装爱国大名片。无限观众以空前热烈态度要求《木兰从军》展映！公映以前，巨幅广告，或许有用！公映以后，观众口碑，广告失效！”

由袁丛美编导，高占非、黎莉莉等主演，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热血忠魂》，号称“国民党机械化部队、骑兵师、中央军校学生十余万人参加合力演出，中国第一部海陆空军大战影片，费资十余万，耗时二载，始克完成”的巨片，1938年6月在香港上映。影片描写国民党军队高旅长毁家纾难，

《热血忠魂》剧照



奋勇杀敌的故事。他的家乡被日军占领，高家老幼誓死不屈，惨遭杀害。高旅长率领队伍反攻，日军以高家大院为据点，负隅顽抗。高旅长并不知家人生死，然其心中一念，唯知“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利益，什么都可以牺牲”，下令轰毁自家的宅院。在激战中，虽负伤血染征袍，仍不忘激励将士：“剩下一兵一弹也要抗战到底！”

尽管全国的抗战形势仍处于艰难阶段，但对香港来说，那却是一段雄风热血、浩气盈天的岁月。

在香港历史上的多个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演艺界人士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走在民众队伍的前列，勇敢地发声。七七事变后，香港各种抗日救亡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怒发。弹丸之地，竟出现了青年会剧艺社、女青年会剧社、中华歌咏班、银联剧团、春秋剧社、洪流剧社、海燕剧社、蚂蚁剧社、红白剧社、中国艺术剧团、中国救亡剧团、七七剧社等两百多个专业和业余剧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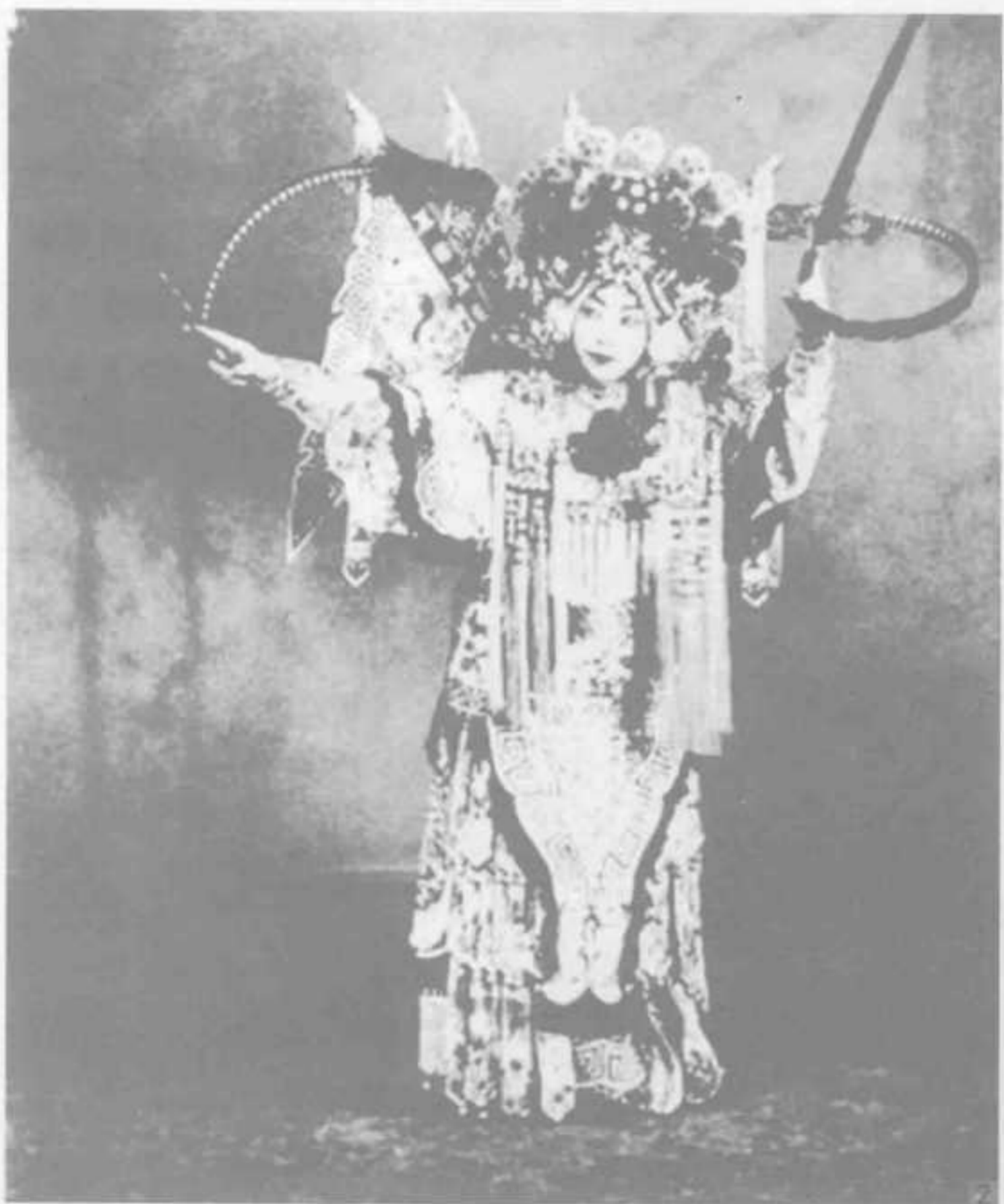
1938年年初，名满天下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携家眷和剧团赴香港演出。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曾多次请梅兰芳到电台演讲，均被梅兰芳拒绝，诚如其哲嗣梅葆玖所说，在弟子们心中，梅兰芳的形象是“有傲骨但没有傲气，温和却不软弱的文人风骨”。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梅兰芳以到香港演出为由，举家逃往南方。他在香港演出《梁红玉》《抗金兵》和《生死恨》等剧目，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香港最大的戏院——位于德辅道西的太平戏院，便留下过梅兰芳的舞台倩影。他饰演的梁红玉，满身披挂上场，一个垫步，一个亮相，一段西皮慢板：

想当年两狼关一场血战，
这深仇何日报永记心间。
恨金兵又来犯长江天险，
俺这里定巧计誓与周旋。

全场观众无不为之喝彩。《抗金兵》和《生死恨》都是梅兰芳为抗日救亡而编演的新戏，借古讽今，表现反抗异族入侵的气节。演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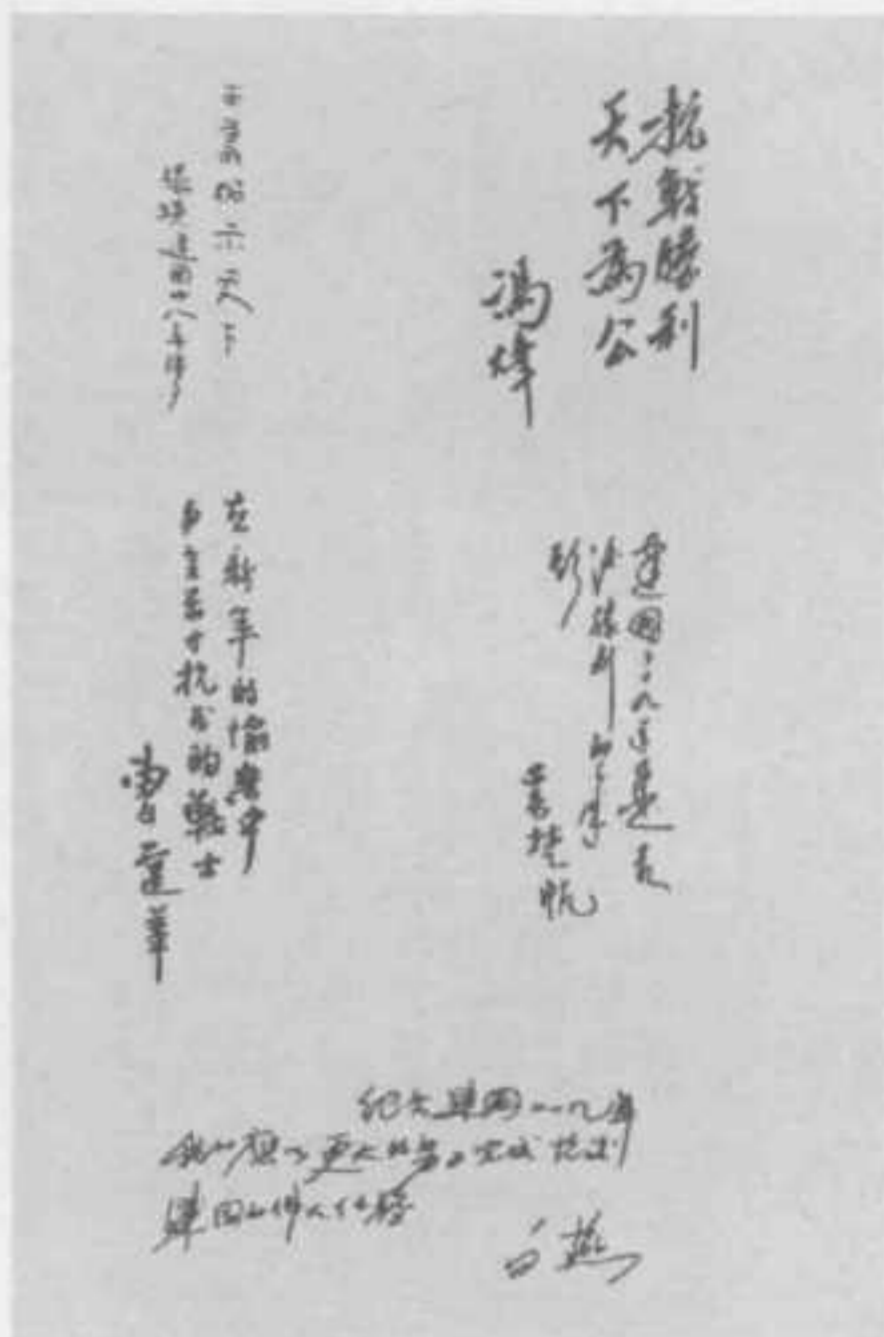
2

1 / 梅兰芳饰演梁红玉
2 / 梅兰芳演出《抗金兵》剧照

一结束，梅兰芳送走了剧团，自己和家人却在香港干德道半山的一幢公寓，悄然住下，不再北返，也不再登台演出。虽然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作为一个艺人的风骨，却铮铮有声。

1938年7月，由香港影剧界知名人士卢敦、胡蝶、李月清、张瑛、赵如琳等人发起组成时代剧团，他们在宣言《我们的工作态度》中说：“我们没有忘掉我们底使命……既然没有拿着枪杆跑上前线去，在后方……也得站好自己底岗位。”他们公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阳翰生编写的《前夜》。而七七剧社把《放下你的鞭子》《飞将军》和《春风秋雨》等著名戏剧作品，搬上舞台，搬上街头。丁丑剧社是由仿林、梅芳、养中、青华英文书院等几间学校的学生联合组成的业余剧团，自筹经费，排练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烙痕》等剧目。


演员胡蝶



电影艺术家们勉励抗战的题词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照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中国左翼戏剧联盟成员陈鲤庭创作的一部独幕剧，以街头卖艺形式演出，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悲惨遭遇。这出街头剧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成为一部动员抗战的力作。“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这首著名的民间小调，悲如泣，愤如诉，从东北的白山黑水，一直唱到了香港、九龙，唱遍了油麻地、尖沙咀、旺角、跑马地、中环和湾仔的街头巷尾。

香港的盛夏，潮湿而闷热。当汗透衣衫的青年学子，在烈日暴晒之下，用稚嫩而嘶哑的嗓音喊出：“使你们挨冷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我们是有我们的武器的，就是空着两只手，拳头也是我们的武器呀！”观众个个怦然动容，人人握拳透爪，血脉贲张。

1941年9月中旬，由王莹和金山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来到香港，话剧《雾重庆》在香港公演。这是作家宋之的在1940年创作的一部五幕话剧，讲述重庆陪都时期，一群流亡青年在山城挣扎图存的故事。他们的结局各有不同，有的因性格耿直，不善逢迎，患病郁郁而死；有的走私发国难财，自甘堕落；有的钻进了政客圈中，同流合污。话剧在香港受到热烈欢迎。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社，亦先后到香港演出。各所学校组织的歌咏团，顶着夏天的溽暑和冬天的寒风，到处演唱抗战歌曲。

在爱国电影和戏剧的激励下，香港的热血青年纷纷挎上行囊，高唱着《中国一定强》的歌曲，返回内地，为抗战出力，为建设大后方出力。甚至连中学生也组成了“中国港侨救护团”，定期赴前线服务。太平山上，维多利亚港两岸，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一定强！一定强！一定强！

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电影人、戏剧人、音乐人，牵手并肩，走到了一起，不遗余力，其内心所企慕，全然是为履行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义务，当祖国面临最危急的关头，保持民族气节，彰显国家主体的尊严，昭示民族独立的精神。他们坚信，未来中华复兴之基，必将奠立于这种精神之上。

手无寸铁兵百万

大江南北，战争已成燎原之势，受北方及东南战局所冲，北平、上海这些文化重镇，均已相继崩塌式微，文化事业一落千丈。不肯向侵略者低头的文化人，纷纷逃亡，或奔赴大后方的重庆、桂林，或前往南方的香港。到1941年初夏，人数已达数百之多，很多是在国、共两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从重庆、桂林等地转移来的。

这时，日本对东南亚的野心，已路人皆知，太平洋风雨飘摇，局势日益险恶，香港孤悬海上，被日本陆海军重重包围。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洞若观火，由于地理上缺乏长期防守所需的纵深，香港易攻难守，沦陷是迟早的事。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把那么多文化精英汇集到香港？

有部分人固然是出于对局势的误判，认为日本不敢挑战英国，香港可以偏安一隅，幻想这里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托



战前的维多利亚港





抗日战争初期的廖承志



1938年，茅盾一家人在香港

命之所，但更多的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由于香港无论政治或军事的位置，在太平洋上，都有其特殊的战略意义，被国民党、共产党，乃至日本、英国、美国等各方力量视为必争之地，形成了犬牙交错、激烈交锋的态势，偏安之局，绝难持久。因此，把文化人转移到香港，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1938年1月，廖承志根据其时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意见，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地点在皇后大道18号，对外以“粤华公司”茶叶商行作为掩护。周恩来曾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爵士会面，表达了“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不公开挂牌，请港督给予关照”的意思，得到港英政府的默许。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任务，盖有三项：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参考。

周恩来在194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说：“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与茅盾谈话时，再次指出：“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

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①

大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及指导方针下，肩荷着“开辟新阵线”之重任。他们在香港，从事办报、出版等工作，继续以笔杆子，宣传抗日。昔日文坛的各种派别门户，都被打破，文人学者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达至空前的团结，挥洒笔墨，利用小说、诗歌、散文、特写、通讯等形式，为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学，谱写新的章节。

香港的报刊出版业一向发达，报馆、书局林立，《申报》（香港版）《华侨日报》《循环日报》《大众日报》《珠江日报》《星岛日报》《华字日报》《南华日报》等众多媒体，在战前呈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盛景，当各地的文化人陆续到达后，更为香港出版界、新闻界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活水。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江西省余江县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家。1933年1月，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但不久便流亡海外。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祖国，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开宗明义，揭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一时洛阳纸贵，销量达到20万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邹韬奋当选为执委。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政府查封。邹韬奋流亡香港，不久重返上海，旋因涉“七君子案”，锒铛入狱。获释后他在上海继续奋斗，主编了《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战》

邹韬奋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1939年，在香港
抗日画展上宋庆龄与
漫画家丁聪合影

通俗版周刊和《抗战画报》六日刊等杂志。

1941年2月，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邹韬奋决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一职，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从重庆去了香港。他向外界表明心迹，“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

邹韬奋到港后，恰好廖承志正在筹办《华商报》，邀请他参与其事。廖承志在2月致电周恩来，谈到《华商报》的筹办情况：“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定名《华商晚报》（即《华商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胡仲持任总编辑。编委则由长江、夏衍、逸群和我担任。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们每月津贴一千元港币。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①

《华商报》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钊，广东五华人，曾祖父是个石匠，后来在香港经营采石和房地产致富。1934年，邓文钊在英国剑桥大学获经济系硕士学位。在读期间加入了“左翼读书会”，成为左派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邓文钊在香港担任大英银行华

^① 廖承志：《关于《华商报》的一组电报》，载《深圳档案文献选编》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人经理，他利用邓家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站及接受华侨捐献的联络站，把大批华侨捐献的物资，转运到内地。他在港岛有一幢大宅，俗称“红屋”，是宋庆龄、廖承志经常用来会见客人的地方。

《华商报》于4月8日创刊。廖承志在8月26日向中共中央报告，《华商报》的销量，达到五千五百份以上。他在报告中写道：“开办迄今通由邓文钊做生意出资本，未花我们半文钱。现在实际销路已超过五千五百份，为香港晚报最大者。”^①

周恩来为这份报纸定的基调是“不红不白，灰些”，以便吸引更多的香港和海外读者。报名是集孙中山的题词而成，又邀请何东爵士为创刊号题写了“唤醒侨胞”四个大字，都是为了以中性面目示人，增添一些商界、侨界色彩。但一群热血的左翼文人集合在一起，想“灰些”也很难灰得起来。

胡愈之干脆把这份报纸称为共产党的“海外党报”。《华商报》总主笔张友渔说：“本来想办得灰一些，但办起来还是红了。”因为报纸不仅批评汪精卫，还批评蒋介石，而且刊登了茅盾的《腐蚀》、邹韬奋的《抗战以来》、夏衍的《春寒》、郭沫若的《洪波曲》，整个报纸染得透红。报房不肯接受《华商报》，只能直接交给报贩。报贩为此少不了挨骂受气。“尽管这样，《华商报》在香港还



何东爵士和女儿

^① 《邓文钊》，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大众生活》新一号



在香港出版的《大地》封面

是销几万份。在香港的二三十家报纸中，能销几万份的就是很不错的了。”^①

而邹韬奋撰写了20万字长文《抗日以来》，在《华商报》上连载至6月30日，共77篇。他一面参与《华商报》工作，一面为复办《大众生活》奔走努力。5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正式复刊，邀请了金仲华、茅盾、乔冠华、夏衍、胡绳、千家驹等著名文化人，参加编辑委员会。

《大众生活》一经复刊，便作金石之声。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在5月的《大众生活》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提出改革政治最低限度的九项主张：一为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二为团结更具诚意；三为民主政治须即实施；四为确定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五为严惩贪污，整饬官常；六为对改善民生，宜迅作有效的处置；七为解除抗战文化的压迫与封锁；八为特务工作必须改变方向，应用以对待敌伪，不能用以统治人民；九为切实保障侨胞回国投资及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的安全，保障侨胞捐款的合理运用，制止达官贵人在海外豪奢之生活。

当时，香港的左翼报刊，还有八办主办的《华侨通讯》、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茅盾主办的《笔谈》、郁风主编的《耕耘》、马国亮主办的《大地》画报、周鲸文主编的

^① 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1



2



3

- 1 / 茅盾在香港主办的《笔谈》
- 2 / 梁漱溟、俞颂华在香港主办的《光明报》
- 3 / 郁风与黄苗子在香港创办《耕耘》杂志

《时代批评》和宋庆龄主办的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梁漱溟任社长、俞颂华任总编辑、萨空了任总经理的《光明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刊》等，也都在此时纷纷出版。夏衍、黄药眠等创办了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等创办了香港中国通讯社。

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1年5月成立了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潘汉年等五人组成，专事组织领导文化人开展抗日文化活动，陆续创办了



1939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份以抗战为主题的杂志《东方画刊》封面

《星岛日报》《新闻通讯》等报刊。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在这些报刊的周围，汇聚了大批从内地撤来的文化人，包括女权活动家何香凝、诗人柳亚子、作家茅盾、出版家邹韬奋、编辑家胡愈之、历史学家胡绳、记者萨空了、剧作家于伶、文学家胡风、经济学家千家驹、法学家张友渔、翻译家戈宝权、杂文家廖沫沙、世界语专家叶籁士、戏剧理论家葛一虹等。

活跃在香港新闻第一线的报人，不尽是左翼人士，“救亡”这面旗帜，把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召集到一起了。陈荆鸿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广东顺德人，少怀大志，游历名山大川，师从康有为习书法。抗战前在广州西关主办《越华报》，沦陷后走难到香港，担任《循环日报》社长。这份报纸曾经是香港最著名的大报之一。陈荆鸿的著作《独漉堂诗笺释》《蕴庐诗草》《蕴庐文稿》

何香凝



等，在文坛享有盛誉。

这些文化人，虽不能荷枪上阵，覆军杀将，但手中那一支如椽大笔，亦足以激扬民气，横扫千军。范长江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有“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之句，恰是这批文化人在香港奋斗的写照。曾在《华商报》工作的李筱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亦尝作感慨之言：“1941年的香港，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精粹汇集的中心。”^①

风雨歧路中的文化人

香港之所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文化精粹汇集的中心”，不仅因为这里有茅盾、邹韬奋、夏衍这些站在文化战线最前沿，为国家民族奔走呼号，为时代舞台带来耀眼光芒的左翼文化之星，还因为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一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同样毫光四射的名字：陈寅恪、叶恭绰、梁漱溟、戴望舒、许地山、萧红、张爱玲、端木蕻良、骆宾基……都曾在香港地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陈寅恪，江西九江义宁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陈寅恪当时一身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并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是

1938年初春，陈寅恪怀抱幼女美廷在香港罗便臣道寓所



^① 李筱峰：《太平洋战争中抢救文化人的伟大创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

晚清有名的“维新派”官员，父亲陈三立也是一位名满朝野的士大夫。1937年北平失陷后，日本人看中陈三立的名气，百般招致，但遭到陈三立的断然拒绝，老先生杜门不出，绝食五日而死。

传统士人对家国的兴亡，有着至纤至微的感应力，有如树叶之于秋风，亦如枯草之于野火。当陈寅恪为父亲办完后事，随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合大学前身，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迁往云南时，颠沛流离，辗转万里，在这位视传统文化比生命还重的学人心底，唤起了无限的黍离之感、桑梓之恸，一如回肠九曲，欲吐还吞。陈寅恪在云南留下了“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角已沧桑”的诗句，便是这种苍凉心态的表露。

流亡途中，陈寅恪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作，女儿亦得了百日咳，不得不留在香港治疗，陈寅恪自己随校西行。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牛津创校三百年第一位获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足引以为殊荣。而陈寅恪久患目疾，亦希望借机赴英国治疗，于是欣然接受，并在6月下旬，结束了西南联大的课程，由滇返港，计划和全家搭船前往英伦。

可惜天意从来高难问，他到港后，因欧洲战争爆发，地中海航线戛然中断，全家被迫滞留香港。刚刚逃出平津沦陷区的陈寅恪，就这样，阴差阳错，又闯进了香港这个风雨如晦、朝不保夕的高危地区。

陈寅恪一面在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一面等候船期，但随着战局发展，海路复通的希望渐渐渺茫。他只好给牛津大学写信说：“我原来打算在八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① 读之令人不胜唏嘘。

^① 载《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1937年的香港大學





许地山

1941年8月4日，陈寅恪的好友许地山去世。许地山，著名小说家和学者，笔名落华生，出版过《空山灵雨》《缀网劳蛛》《道学史》《印度文学》等著作，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兼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陈寅恪在云南时，许地山照顾他留在香港的妻女，寻医问药，无微不至，两家结下深厚情谊。许地山的遽然辞世，于他本人而言，避过了目睹香港沦陷的惨痛经历，但对陈寅恪来说，却又是一个大打击。他为好友作挽联：“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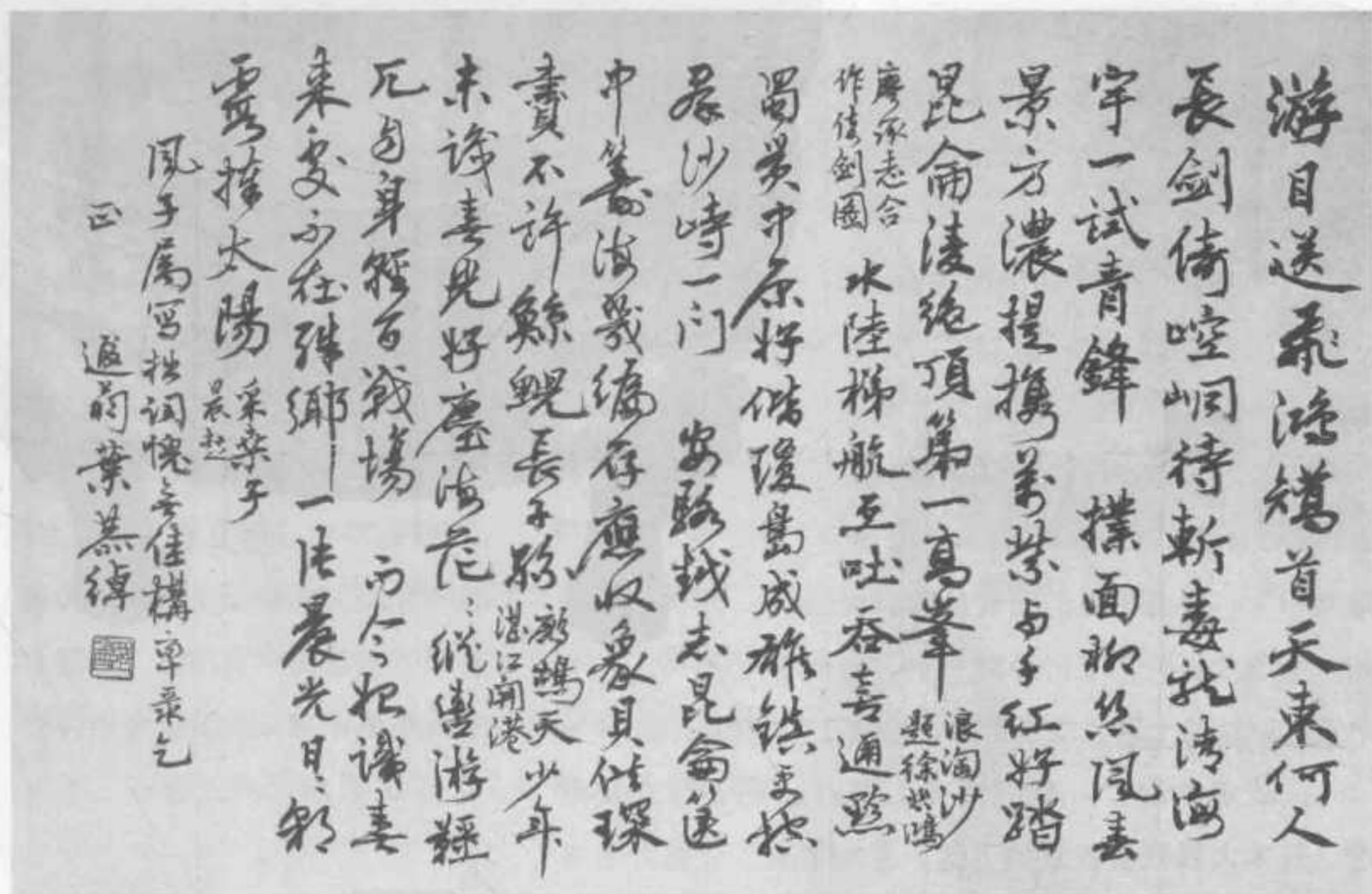
打击接踵而至，仿佛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愈发灰暗，这使得对抗战前景本来就深感悲观的陈寅恪，心情跌到谷底。居港期间，在他的文字中，反复出现“恹恹”“不适”“忧闷不任”“心绪甚恶”“不胜悲”这些字眼。然而，他对前途的悲感，与那些汉奸卖国贼完全不同，他是因为博览古今安危、治乱之变，从历史上南宋、南明之亡，兴起一种沧桑悲情而已，他鄙视一切向侵略者屈服的人，更不会为侵略者服务。

叶恭绰，出身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清末历任邮传部路政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并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对中国的铁路建筑颇有贡献，被人目为“交通系”的核心人物之一。然而，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文人，继承了有“南词正宗”之誉的祖父叶衍兰衣冠，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通，著有《遐庵诗稿》《遐庵清秘录》《遐庵词》《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等书。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1935年出任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

上海沦陷后，目睹神州陆沉，四海扬腥，叶恭绰悲不自胜，乃挈眷避地，趣赴香港，以鬻字卖画维持家用，过



叶恭绰



叶恭绰书法

着青鞋布袜，蔬食啸歌的简朴生活。侪辈多劝他，香港非安全之地，不宜居留，他却赋诗作答：“寻养岩松气，天珍社栎材。澹宁犹可勉，吾驾不须回。”表达了“志士不忘在沟壑”的誓愿，虽是社栎之材，亦要有岩松之气。他还引《晋书·王导传》故事，勉励朋侪：“神州戮力须公等，老我新亭事短吟。”《王导传》记：“过江之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壮哉此语！雄哉此志！

1941年，叶恭绰在香港倡议成立“中国文化促进会”，并在香港大学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出版《广东文物》一书，借以推广祖国的历史

文化，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出一份力。然而，最为文史界所津津乐道的，还是叶恭绰保护毛公鼎一事。

毛公鼎是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被一位村民发现的，为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上有四百九十九字铭文，记载毛公向周宣王献策之事，被史家称为“抵得一篇尚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民国年间，毛公鼎辗转到了叶恭绰手中，他视若无价之宝，以华匱十重，缙巾十袭，珍藏在内地银行内。

抗战爆发后，叶恭绰逃离上海时，毛公鼎未及带走，日本人四处查找它的下落，急如星火，还把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关了起来。为了保住毛公鼎和救出侄子，叶恭绰托人造了一个假鼎，交给日本人。叶公超出狱后，在1941年夏天，带着真的毛公鼎秘密逃往香港。这件珍贵文物，才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香港沦陷后，叶恭绰又托德国友人把毛公鼎偷运回上海。几经转手，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件文物终于献给了政府，完成了叶恭绰的初愿。

读书人，寄身于天地之间，当有一份对国家民族、古圣先贤、历史文化应尽之责。但患难之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顶天立地，无愧于“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之问的。1938年年初在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的胡兰成，便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读书人。

胡兰成因为与才女张爱玲的一段感情纠葛，成了后来好事者乐此不疲的话题，但当时胡、张二人尚未相识，胡兰成住薄扶林道学士台，与自称是反动文艺与左翼文艺间“第三种人”的作家杜衡、边写作边在国民党



毛公鼎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任职的英俊小生穆时英、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干事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过月份牌的画家张光宇等人为邻。胡兰成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南华日报》上，以流沙为笔名撰写社论，并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译国际通讯，专门研究世界局势和各类国际问题。

《南华日报》的主办人林柏生，广东信宜人，1929年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翌年创办《南华日报》，他的身份是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蔚蓝书店是两个招牌，一套人马，陆续出版了《日本史》《日本战



张爱玲

胡兰成





林柏生

时经济》《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苏联的远东红军》《世界的资源》等书，“成绩单”倒也皇皇可观。

蔚蓝书店的背景，与汪精卫有极深的渊源。1930年汪氏秘书曾仲鸣和朱朴二人主插画报《蔚蓝》，在上海创办蔚蓝书店。“八·一三”事变后，这批人转移到了香港，同样承担着“开辟新阵线”的任务。1938年年初，新的蔚蓝书店在香港皇后道华人行开张。书店成了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的据点之一，汪氏投敌前，与日本秘密接洽，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联络机关。12月19日，汪精卫脱离重庆，潜赴河内，响应近卫声明，12月30日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

蔚蓝书店和编译社的人，大部分都追随汪氏投敌去了。汪精卫在河内时，论功行赏，组织班底，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所谓“首义分子”，每人发了五万港元安家费。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以往也常在蔚蓝书店出入的。胡兰成也不例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艳电发表之日，我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块大石上坐了好一会，但亦没有什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①当汉奸也能写得如此干净清爽，胡兰成那支妙笔，果然能开出花来，但文笔再好，也是枉读诗书。

由此可见，战前的香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左、中、右各色人等，救国的、卖国的、公开的、地下的、文的、武的，汇聚在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棋布错峙，明争暗斗，形成了“八方风雨汇香江”之势。

^① 胡兰成：《今生今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雷火起于草间

当内地沿海地区都沦为战区时，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便愈加显得重要了。中国政府亟需的抗战物资，要从这里转运到内地，为此，政府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纷纷来港设置分支机构。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此时俨然成了战时对外转运、国际贸易及外汇基金运筹的总枢纽。

许多内地工厂为了躲避战火，千方百计往香港搬迁。据统计，到1940年下半年，从内地迁港并继续开工的大小工厂，已注册或未注册者，合计有432家。内地学校也往香港搬，广州沦陷前，广州大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知用中学、广州大学附中等学校，都陆续在香港、九龙、新界设立临时校舍，继续开课。

1939年一群徒步抵港的难民



战火烧至广州后，情况急剧恶化，驻防香港的英军开始在鲤鱼门和汲水门布置电缆，安放水雷，规定所有轮船必须按指定的时间、航线出入港口，入夜则封锁海面。临战气氛，一天天浓厚起来了。战争逼近的另一个征兆是：从珠三角涌来的难民，与日俱增，简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排山倒海。香港人口从20世纪初的26.3万，到1939年突破163万，达到了每20年增长1.4~1.6倍的惊人速度。

世界经济尚未从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复苏，1937年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英镑、美元相继贬值，累及香港经济也一蹶不振，银根收紧，市面陷于萧条，商界哀鸿遍地：深水埗、旺角、九龙城大量新建楼宇，十室九空，租金一减再减，亦无人问津；酒楼、茶居门可罗雀，店家绞尽脑汁，推出各种优惠来吸引食客，仍难以维持。但随着难民潮的到来，香港房地产竟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畸形的繁荣，市区的空置楼宇，几乎被租赁一空，租金逐日飞涨，以致港府要出台规定，限制业主以加租方式驱赶旧租客。

在1938年6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了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广州避难市民，来港者近十万众！”为了控制来港人潮，在广州沦陷前，港英政府作出规定，凡来港者，无论搭船或火车，必须每人持有港币至少20元或同价的财物，才准许入境。





在6月2日的《申报》上，载有一条令人心酸的消息：

敌机向广州市区施行强暴投弹，毁我非武装区域，故连日逃难来港者达三万余名。昨日下午3时40分，由广州开来之轮船，有佛山、东安两轮，载来搭客三千人有奇。而未有20元之搭客，被带往警署暂留查问者，约在70人。据逃港之难民谈，彼等在广州落船时，多数乘夜在西濠口等候，否则无法落船。火车原定下午5时50分在省开行，但正午12时以前，车站已挤满搭客等候。



1940年，徒步抵达香港新界的难民



1

6月3日《申报》的消息：

敌机接二连三惨炸广州，故逃难来港之难民，有增无减。昨日到港之轮船，有泰山、西安、天一、广西等轮，西安、天一两轮于下午3时10分抵港，载来难民二千余人。泰山轮则于4点30分抵港，载来难民亦有二千余人之多。广西轮于6时到港，载来难民九百人。其中无20元备款被逗（扣）留者有百人，由囚车送往警署留讯者。此次逃避来港之难民，而未有携备20元被留者，连日甚伙。

- 1 / 九龙的一所难民村
- 2 / 难民营内的情形
- 3 / 难民营中的儿童



2



3



表面繁荣的下面，是危机与苦难的日益加深。这种情况，日甚一日，持续到广州沦陷，省港之间的水陆运输交通，被完全切断。但民众翻山越岭，泅水渡河，穿越边境者，依然络绎不绝。在1939年3月2日的《申报》就曾报道：“自日机惨炸深圳后，避港难民，又突激增，据警务总监司徒永觉氏称，去周内截至去月廿五日止，本港新界难民增加人数，总共3000有奇，悉由政府各难民所收容。其中有4名为军人，其余悉属平民云。兹将去周各难民营人数录后：京士柏1428人，马头涌780人，北角1524人，锦田2633人，粉岭北站989人，粉岭南站1284人，槎坑577人，共9880人。而去周则总共仅有6996人云。”

栖身于街头的难民





1

- 1 / 在元朗接受慈善团体赈济的难民
- 2 / 在北角专为难民而设的医院
- 3 / 香港中国青年救护团成员正在给难民看病



2



3

这只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百多个星期中的一个星期的情况。这类消息，充斥香港各大报章，充斥着几乎每个星期、每一天。据3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滞留在港九及新界各难民营里，已超过一万人，还有大量露宿野外，或流入市区的难民，处境更为艰难，却无从统计，情况实在堪忧。

内地每一次遭逢天灾人祸，香港人总是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香港各界踊跃发起救助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上流社会举办各餐舞会、赛马会为难民筹款，下层社会则以卖花、街头义演等形式筹款，或走街串巷，沿门募捐，然后把各界捐出的帐篷、衣物、被褥，送到难民手中。

PATRIOTIC KIDS DO THEIR
BIT BY DONATIONS
ANAK-ANAK KETJIL TOEROET
MENDERMA

募舞兒愛
款獅童國



1



2

- 1 / 1939年5月，长洲儿童舞狮募捐，支持抗战。一天之内，募得五百余元港币
- 2 / “睡狮猛醒”，振兴中华，长洲儿童的爱国行动，使观众感动流泪

1938年8月，在深水埗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有两个菜贩子，激于“火一般的热心”，决定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当，然后用这笔钱购进了一批蔬菜，在市场上义卖。当“义卖捐款救国”的标语在摊位前一贴出，人们便“呼”一声围了上来，小贩呼吁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内地抗战救国。菜很快被抢购一光，许多人是用高于市价的价钱来买他们的菜。收市以后，小贩把一天所得全部捐了出去。

这两个菜贩的义举在附近的村民和街坊中迅速传开，第二天开始有一些小贩效法他们，第三天加入的人更多了，有七十多位深水埗小贩，联合举行义卖。“义卖冬瓜二十担捐款救国！”“义卖萝卜，赶走萝卜头！”“爱国人人有责”的横幅和标语，红红绿绿，琳琅满目，挂满了市场和街巷。附近工厂的工人闻风而来，争先恐后，掏出仅有几个斗零（港币的五分钱），参加义买义卖，现场人头攒动，喧呼盈天：“饿死再说罢，打日本鬼要紧呀！”“连本带利，捐给政府，大家要齐心来买啊！”

有一些小学生组成了“跪救团”，沿着深水埗的街道，逐个商店门前跪下，恳求大家出钱救国。此情此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最后往往是孩子与围观者哭成一片。有一些到街市买菜的女佣，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场摘下自己手上的戒指，捐了出去。

一传十，十传百。深水埗小贩的义卖活动，经报纸一宣传，整个港九、新界都沸腾



1939年，一位女学生于中环卖花筹款赈济难民

了。中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蔬菜行、水果行纷纷响应，沿街的水果摊档都贴上了义卖标志，有些小贩还租下房子，举行室内义卖，把义买者的姓名用红纸记下，贴在门口：“张太太购香蕉一根，捐款五十元”“李先生购苹果一个，捐款一百元”……有一位外籍女士用两百元买下三个蜜橘，现场排队的顾客欢声如雷，无不投以崇敬的注目礼。

西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上环也加入了义卖行列，洋货摊、鲜花铺、报馆、饮食、运输等行业都加入了义卖行列。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货运汽车有义运，码头工人有义挑，飞发铺（理发店）有义剪。而且义卖活动，迅速从个人行为，发展成集体行为。几十家腊味店联合起来义卖，募得七万多元。酒楼茶室五行公会召开全体同业大会，一致通过举行定期义卖，统一行动，张贴标语，许多酒楼还专门设计了“轰炸东京”“水淹东瀛”等菜式，吸引食客。

义卖当天，各大酒楼、食店人满为患，一天就募得三万余元。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街边卖香烟的老妪、擦皮鞋的街童，平日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自己也是家无隔夜粮，身少御寒衣，却把极微薄的收入捐了出来。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仅一个月时间，香港小贩的义卖就筹得超过100万港元。对此海内外的报纸争相报道，不仅震撼了全中国，极大地鼓舞了前方与后方的军民，也震撼了全世界，让世人看到，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国人，依然葆有这样坚忍、顽强、勇猛、慈悲的精神，民族有此脊梁，中国是不会亡的。

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为支援内地抗战和救助同胞，香港人不分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贱富贵，不分行业职业，有一分钱，出一分钱，有一分力，出一分力。在1938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前夕，华商总会举行了两次义卖，拍卖的物品包括毛巾、衣服、花瓶等，也有钻石戒指一类贵重物品。九龙藤业也宣布加入义卖，从“九一八”纪念日起，一连义卖两天，各商行积极响应，纷纷捐出义卖藤器。香港各界赈难会、华商总会则联合发动募捐防毒面具。

广州沦陷后迁到香港的中国妇女慰劳会举办首饰抽奖会，奖品包括各种钻石珠宝首饰，全部由各界人士捐出，一元一张抽奖券，筹得款项用于救助难民。演艺界纷纷举行巡回义演。一批国民党的留港中央委员也发起开办平民学校，向本港学校商借校舍，收容难民中的失学儿童，收取最低学费，或完全豁免，务使失学儿童能够继续求学。东华医院一次性拨捐5000元给保育会作为难童的给养费。

当时中国政府发起一人捐献一元偿还外债的活动，也得到港人的热烈响应。中华艺术剧团举办巡回义演，写信给各慈善社团及学校，要求合作，得到了积极回应。剧团应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之请，奔赴青山参加该校的联谊会，作为中艺巡回义演的第一站，演出剧目为《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约三百人，都深受感动。演出结束，即席向观众募捐，以为一元还债运动。募得一



1



2

1 / 参加义卖的女演员

2 / 1939年，演员吴楚帆及梁上燕于一场球赛举行期间为抗战义卖筹款

元纸币16张，一毫银币510枚，仙士140枚，还有小学生以其价值4仙的食品券5张捐出，共得港币68.6元。由学生会代表点数宣布后，将款由该校直接交往中国银行。在场采访的记者，感动之余都说：这次巡回义演所捐的数目虽然不多，但以中艺的精神和各社团学校合作，将来一定会有更美满的成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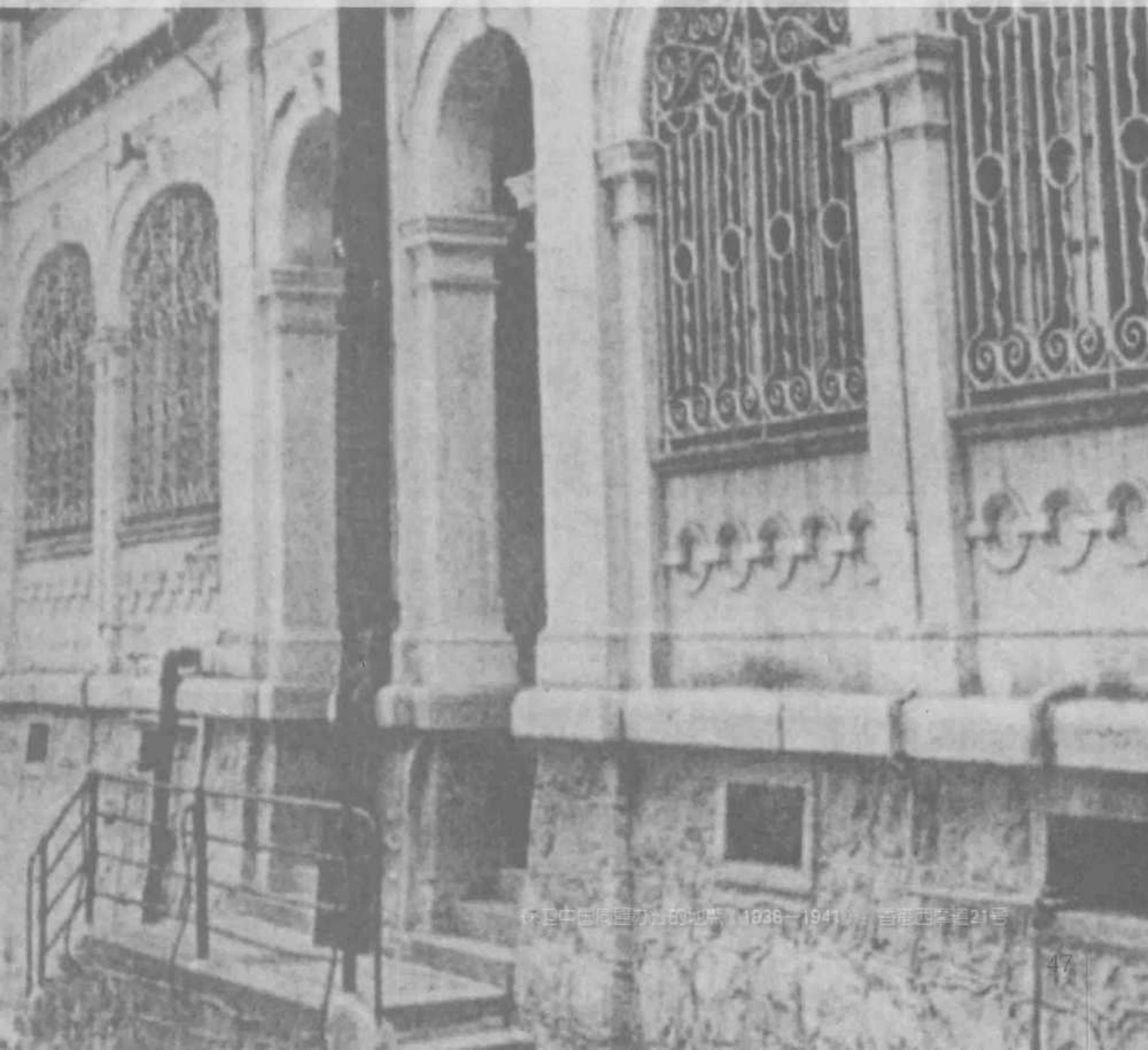
1937年上海沦陷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上海撤到香港。不久，她的姐姐宋霭龄也到了香港。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由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担任保盟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受宋庆龄的邀请，香港医务总监夫人希尔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香港。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达·沙尔文-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Hilda Selwyn-Clarke）出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法朗斯（Norman H. France）出任名誉司库，廖梦醒、邹韬奋、许乃波等人均参加了保盟的工作。

在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有财政委员会、运送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会和促进委员会等。保盟在成立宣言中，庄严宣告：“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将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



保卫中国同盟办公室的地點（1938—1941），香港西營盤21號

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为实现这个既定目标，保盟不懈努力，甚至一些不为人们重视的细节，也都悉心考虑到。比如宋庆龄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人以得到她的签名为荣，于是，保盟和八办给每一位捐献者的感谢函，都由宋庆龄亲笔签署。在保盟负责宣传工作的联合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他撰写的宋庆龄传记中说：

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伊娃医生（何翊姿），在保盟做基层工作，非常勤苦。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助码放和分发供应品，劳动也十分辛苦。在这样的劳作中，宋庆龄自己总是带头。看到高个子、脸色白暂的胡木兰同小个子、黑皮肤的廖梦醒和宋庆龄在一起干活，真是有意思，因为胡汉民和廖仲恺（她们两位的父亲）曾经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敌。为了抗战中的民族而实现这样广泛的团结，全由于宋庆龄创造了必要的气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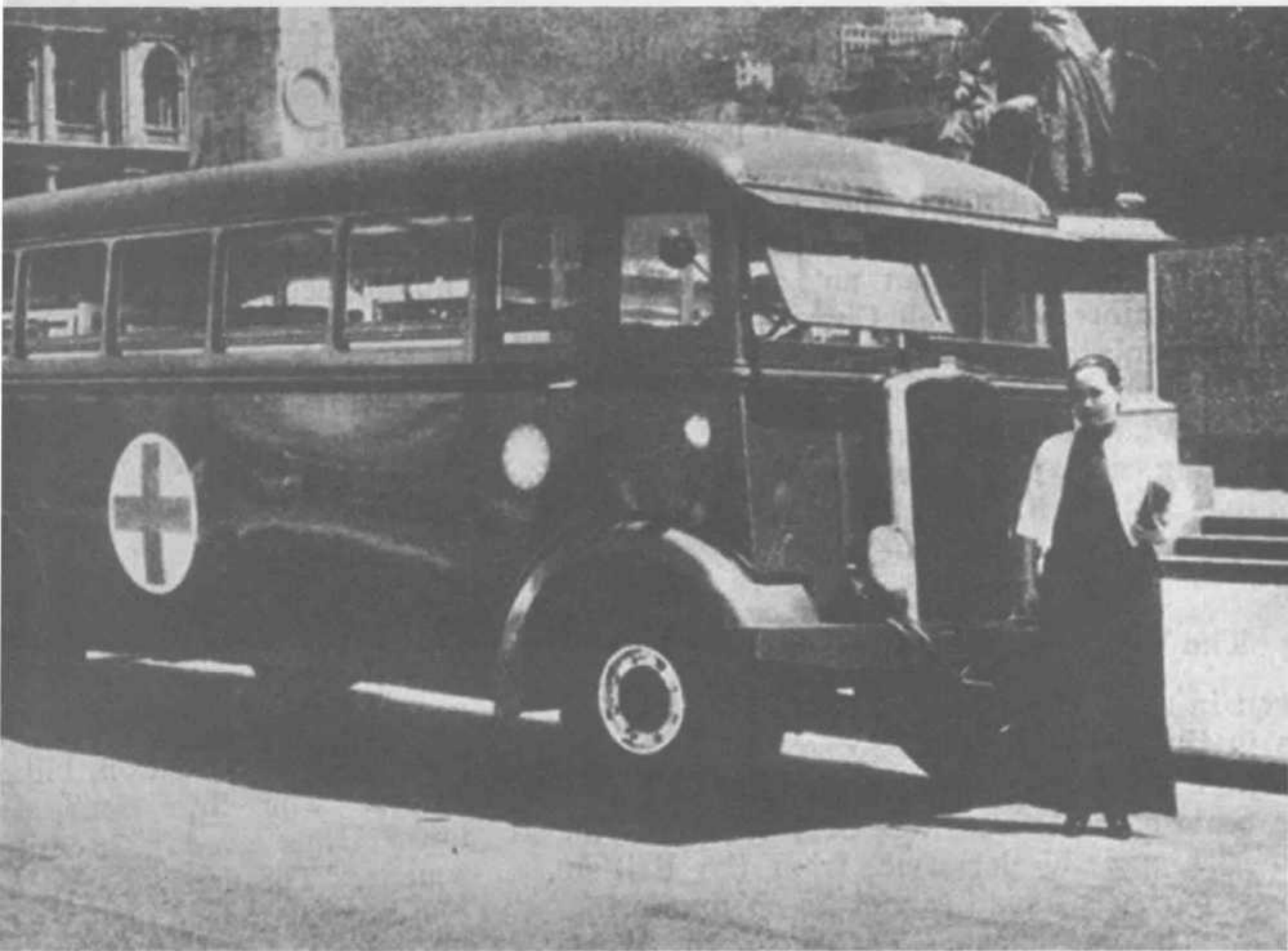
当时宋庆龄在香港的生活，也相当拮据。她在给国际友人的信中说：“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四元钱才能换一元港币，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境况多惨……”^②以她的身份和地位，连拥有一部收音机，都成了奢侈的梦想，似乎令人难以想象，但当时的条件，确实如此困难。

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保盟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收到了各界的捐款总额达到：国币810 879.93元，港币185 640.11元，美元54 437.65元，英镑3417镑8先令9便士，加拿大币3059.15元，1032.32

^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同上。





宋庆龄与一部获捐赠的救护车在中环

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荷兰盾：7盾。还有大量物资，包括X光机、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材、医疗设备、医学教科书、各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他命、罐头食品等。^①

1939年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五个卡车底

^①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吴景平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



九龙工人专程给八路军送来他们捐赠的救护车

盘，宋庆龄开心极了，汽车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之一。她马上批准拨款，在香港安装成五辆汽车，但不能把车空着开回内地，总得顺道带点东西回去。当时纽约中国民间救济协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等援华机构捐献的药品、食品、毛毯等物资，只够装两卡车。经宋庆龄奔走呼吁，动员各界人士，很快就募集到五万元，用于购买各种物资，装满了五卡车。保盟派专人押送，经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千里，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

在港府的默许之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香港进行着半公开的活动。它不仅向内地运送了大批的物资，而且还协助华侨及港澳同胞组织起各种回乡服务团，诸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会宁团）、香港学赈会回乡服务团（港学团）等。这些回乡服务团其实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廖承

志、潘汉年、连贯等中共领导人和各团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的训练，经常在一起商讨救国计划。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有六百多人经八办输送回国，包括新四军和八路军亟需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如司机、医生、护士等。

3月8日，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在妇女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她向所有为支持内地抗战而奋斗的香港妇女说：“我谨代表英勇保卫正义和民主的中国战士向你们致意，这些在中国前线的男女们曾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忘我的精神赢得了世界上一切正义人士的敬仰和支持。他们和我都感到欢欣，因为在这个纪念反暴力反压迫的国际妇女运动的伟大节日，香港各种族的妇女们首次聚集在一起，表示了你们和我们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致，并且把我们的事业认作你们的事业——这事业无疑是属于每一位爱好民主的人士——不论他是何种国籍。”她动情地说：

我极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我们将法西斯侵略者驱逐出大陆，解放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为止。我们将守住世界和平民主斗争的战线上的我们这一环。^①

1939年5月，宋庆龄、陈翰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任主席，委员有斯诺（Edgar Snow）、路易·艾黎（Louis Eli）、普律德（Ida Pruitt）等人，陈翰笙任秘书。在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的推动下，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均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这些捐款，一部分转送到内地抗日根据地，另一部分则由中

^① 宋庆龄：《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载《为新中国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940年元旦，香港九龙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全体职员合照。前排右三为该会副会长杜月笙，曾捐款给宋庆龄支持香港抗战

国工业合作协会用之于指定的工合业务和训练工作。先后募集到的款项约 500 万美元。

1940年2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到了香港，她是因为在内地劳军时遭遇车祸，身体一直不适，到香港治疗和休养。三姐妹都住在九龙沙孙道大姐宋霭龄的寓所。美国作者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写道：“香港是宋氏家族的会聚之地……很明显，国民政府在汉口无法栖身，不得不再撤退到遥远的和难以深入的内地城市重庆。当一位或者更多的宋家成员出现在香港时，日本宣传人员就大做文章。他们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发布消息，要点是：自命不凡的宋氏家族，正在抛弃国家的沉船，带着装满成箱成袋的金银细软和国宝潜逃。当宋家成员，特别是宋氏姐妹访问香港时，他们通常是避开人们的耳目，悄悄进行同战争有关的活动。”^①

对海内外的华人来说，香港是为内地筹募抗战资金、物资的枢纽站。在内地抗

^① [美] 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战最艰苦的时刻，宋家三姐妹在香港同时亮相，让人深感香港地位的重要，而更加发愤努力。3月，宋家三姐妹一起从香港飞赴战时首都重庆。宋庆龄在重庆的现身，打破了一直以来关于宋庆龄与重庆不和的传言，对建立和巩固内地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正面的宣传作用。5月，宋庆龄、宋霭龄离渝同机返回香港。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伪蒙古国。苏联立即停止对华援助，调走苏联志愿航空队。中国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经济受到重创，加上日本在华南实行“封锁战”，物资本来就十分匮乏，战场上每天的军费至少500万元，一年需要18亿元，而国家的实际收入，只



1938年在香港从事抗战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右起：欧阳予倩、廖梦醒、洪遵、何香凝、丁聪、夏衍、翟白音、陈歌辛



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讲话



香港报纸对“一碗饭运动”的报道

有三分之一，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苏联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刻，做出此举，不啻在中国伤痕累累的身上，再捅一刀。这时，香港作为中国抗战物资集散、中转基地的地位，便愈显重要了。

保盟主动肩负民族救亡的重任，在香港发起“两万条毛毯运动”和“一碗饭运动”，天下风从，应者如云，这与宋庆龄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是分不开的。1941年7月1日，“一碗饭运动”在香港举行了开幕式，市民通过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救济华北的难民。

烈日当空，溽暑煎人，但市民仍热情地走上街头，为“一碗饭运动”呐喊助威，他们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走过上环、中环、铜锣湾、湾仔等闹

市区，高呼“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市区巴士和双层有轨电车上，也贴满了“大家来吃爱国饭”“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的标语。剧作家于伶向全港呼吁：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饭的人，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无力购买“一碗饭运动券”，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有一家酒楼在门口张贴广告，承诺在运动中捐款达100元以上者，该店用镇店之宝的大红古碗盛饭款待，酒楼还推出巨型爱国饭：碗内有白米一斤，鲜虾肉四两、鸡肉四两、叉烧四两、鸡蛋六个，售价港币100元。许多人争先恐后，踊跃购买，有的家庭还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来吃“爱国饭”“救灾饭”。其场面之热烈，令人感动。

9月1日，“一碗饭运动”圆满落幕，有15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这次活动，原计划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港元，共计2万港元。最后纯收入达22 144港元，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款项凑足2.5万港元，全部捐赠给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

英赈华分会募捐



第20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一碗饭运动”的赞助人

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款项1000万港元。香港人捐献的飞机、汽车、医疗用品等物资，部分由宋庆龄或廖承志转交，部分则由一些忠驱义感的香港人自行组织，冒险犯难，突破日军封锁线，源源不绝地运送到内地。

香港人的慷慨捐输，不仅用于支持内地的抗战，而且亦对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有所援助。例如《南华早报》发起的“轰炸机基金”筹得267.1076万港元，英国战争协会筹得70万港元，英国救济中国基金筹得17.28万港元，立法局亦两次向英国捐赠160万港元。据不

香港商铺高悬爱国标语举行义卖，将所得款项捐助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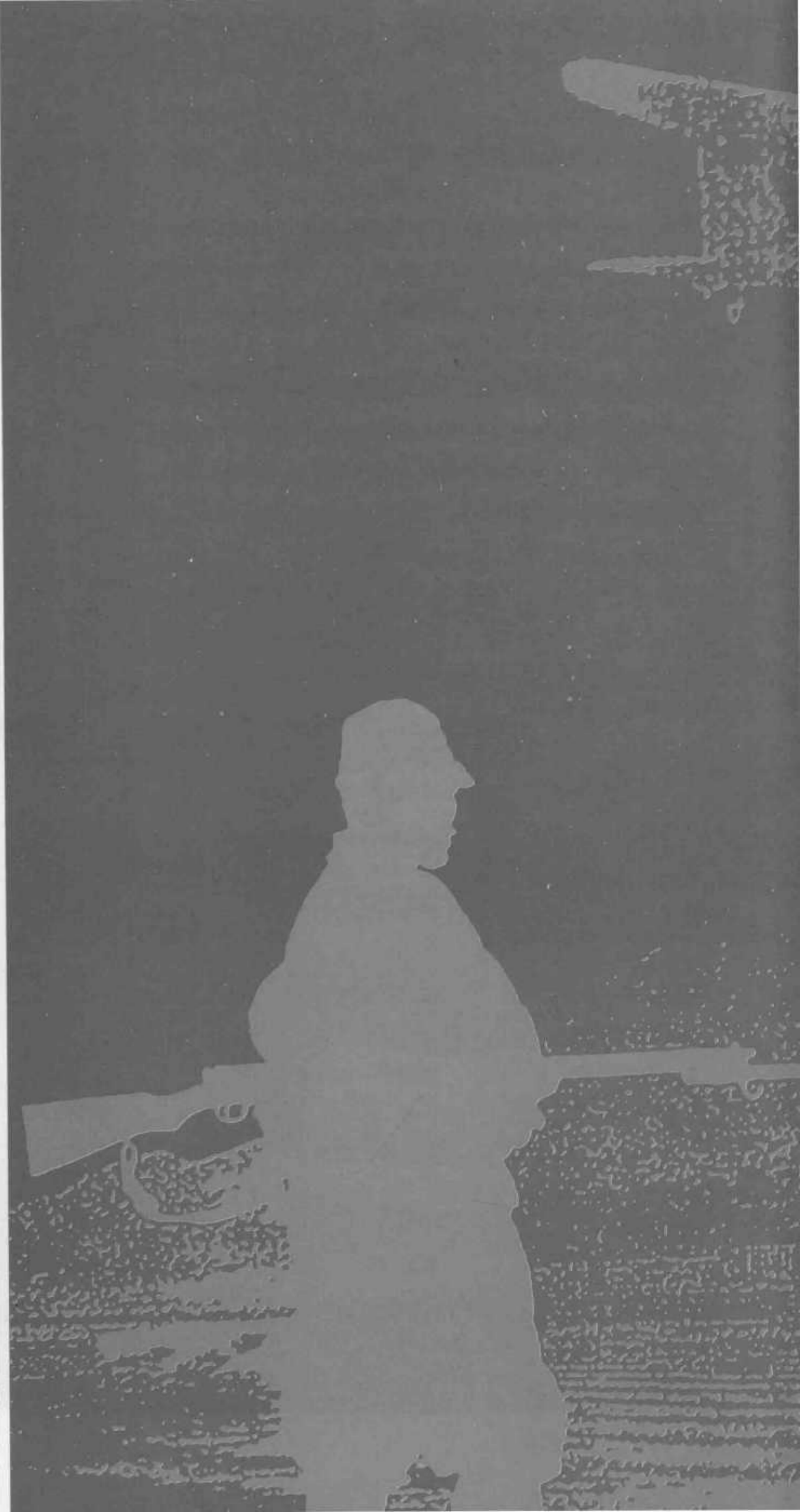
完全统计，香港在战前共捐出1000万港元给中、英两国，支援战争。

局势虽然险象环生，但香港人依然是每天都在忙碌，早出晚归，为口奔忙。收音机每天播报着“湘北战局并无变动”“鄂西华军攻入宜昌”“郑州外围展开激战”“英大使馆发文告，劝英侨撤离”一类新闻；报纸上依然是连篇累牍的“黄金再起空前涨风”“洋粉狂升”“面粉投机勃发”“糖价奔腾”“棉布气焰顿高”“米蠹又来抬米”“生豆油如醉如狂”等坏消息，看得人胆战心惊。事实上，香港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然亦唯其如此，他们对内地抗战的无私奉献，才更显得难能可贵，更值得青史留名。

除保盟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等，亦纷纷成立或扩大服务，为抗战作出贡献。不仅殷商富户慷慨捐输，就连不少贫苦的低下层市民亦节衣缩食，踊跃参加各类支持抗战的活动。一些本地居民，更组成慰劳会、回乡服务团等，前赴还未给日军占领的地区为抗战出力。人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职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构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全民抗战图。

日子繁忙而紧张，如白驹过隙，夏天去了，秋天来了；秋天去了，冬天来了。气温一天一天往下跌。直到报纸上开始出现“一年一度冬至讯大减价”“圣诞新年礼品大会”的广告时，许多香港人才蓦然惊觉，1941年的圣诞节，已挟着一片寒风冰雨，临近了。

蘇
公
文
集



第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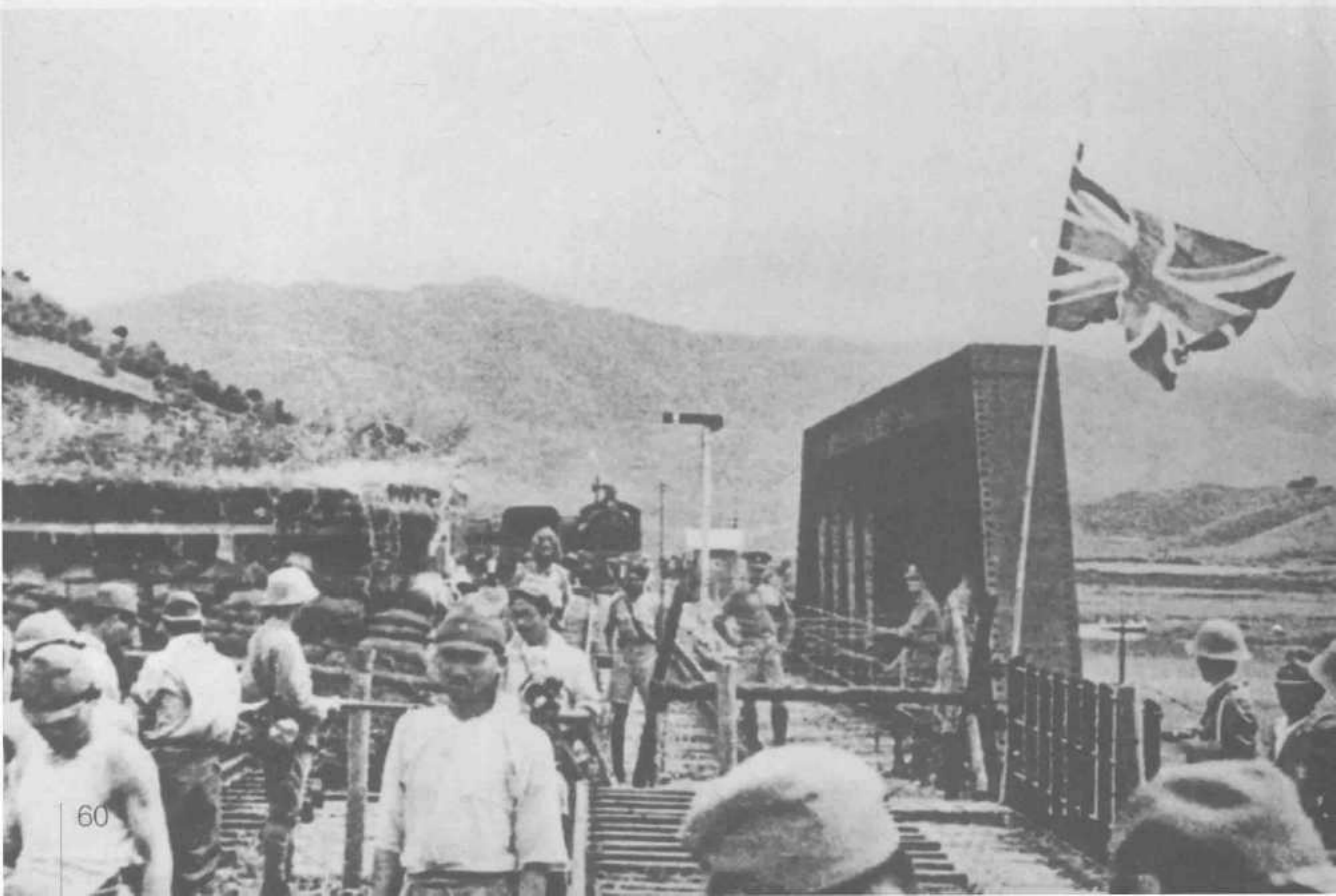
蒙尘之珠



1938年年末，日军与香港军队于罗湖桥对峙

世界处于历史的黑暗时期。1940年4月，纳粹德国向北欧、西欧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占领比利时布鲁塞尔；6月，占领法国巴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5月就任英国首相时誓言：“尽我们的全力，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作战，对人类黑暗、可悲的罪恶史上空前凶残的暴政作战。”但话音未落，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已拉开帷幕，不列颠空战爆发了。

亚洲方面，1940年8月，日本首度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把日本、中华民国、朝鲜、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属香港、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沙捞越、文莱）及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等大



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全部划入大东亚的范围。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够打消日本吞并东南亚的野心了。

香港，注定在劫难逃。

和平已到绝望时

早在1937年年底，刚上任的第20任港督罗富国（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便曾提议，宣布香港为不设防城市，以杜绝日本军事攻击的借口。但英国认为，从香港撤军会有损日不落帝国的威名，也会影响中国的抗战决心，故不可行，香港虽不能坚守，但一定要保卫。事实上，即使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也不能阻止日军的攻击，马尼拉便被盟军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照样受到日本的猛烈空袭。

不过，要守住香港也不容易，因为它是一座孤岛，援兵到达香港得花上90天时间。几经斟酌，最后把香港的战略位置，定位为“要尽力久守的一个虽非至关重要（Vital），但也重要（Important）的前哨”。

1940年7月，枣宜会战结束后，日军突然陈兵香港边境。危疑震惧的空气，顿时弥漫港九。为了减少一旦开战后大量平民的伤亡，港府匆忙实行人口疏散政策。外籍妇孺除有紧急任务者，一律疏散到菲律宾和澳洲等地，而对中国人则鼓励他们回内地谋生，凡在香港居留五年以上或有香港出世纸的居民，只要有商行或学校的证明，港府可为其开具回港证。于是，先后有十几万港人走着与难民来港相反的路线，回内地去了。

但很多外籍妇女却不愿意撤离，香港太平无事，为什么要丢下这种朝歌暮弦的生活，跑到澳洲看袋鼠呢？她们的丈夫也组成“独立丈夫团”一类团体，抗议港府有“拆散家庭”之嫌。为了不用离开香港，妇女们纷纷加入救护队、防空护卫队，或报名从事文件检



1940年修顿球场的防空壕

查员、密码翻译员、护士等工作，这样就有借口留下了。

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经理萨空了，一位蒙古族的新闻记者，在日记中写道：“连日香港本在紧张的神经战空气中，不断的防空演习，一道道的紧急疏散命令，但在传统在大英不可侵犯的傲气氛围中，香港居民几乎没有人肯信日本真会侵袭香港。”^①正是香港人真实心态的反映。

然而，如果香港人知道，日本天皇在1941年1月，已批准了日军进攻香港。日军华南派遣军六万大军，也已厉兵秣马，蓄势待发，对香港是志在必得，他们还会如此淡定吗？对英国来说，它在亚洲的重心是新加坡，香港只属于次等重要的地区。防守香港的意义，无非是为分散日军兵力，减轻新加坡的防守压力而已。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香港的防务一向稀松。在昂船洲只有三座炮

^①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台，西环有两座，防守香港西翼；鲤鱼门有两座炮台，红磡也有两座，防守香港东翼。除此之外，其他工事大都不值一提。直到广州沦陷后，香港才构筑起两条防线，一条东起沙头角，经罗湖至后海湾，是摆摆样子的，几乎没有什么正规军队，唯一功能，就是当战事开始后，尽力破坏道路，拖慢日军前进步伐而已。另一条“醉酒湾防线”，从新界西部醉酒湾至东部西贡牛尾海，连接城门水库、城门河、沙田海、狮子山、大埔山，全长约18千米，布置了5000兵力驻守，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最后是在维港东西入口，布置皇家炮兵，负责封锁海面。山上修筑炮台、机枪碉堡、避弹所，海岸架设铁丝网。

香港驻军总司令格拉塞特少将（A. E. Grasett）是一位乐观的加拿大人，他更认为粤北是国民党的地盘，与香港的守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在粤东一带，还活跃着有两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

1938年，随着日军向北和向西推进，东江成为敌后地区。10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中共广东东南特别委员会，由梁广任书记，领导香港区委、九龙区委、海委和澳门、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等地中共组织活动。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曾生，带了几十名中共党员、学生，从香港分批进入惠阳，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和国民党谈判组织抗日游击队。

12月2日，一百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由国民党军队第一五一师颁给番号。另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是10月11日在东莞成立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这两支游击队成立后，曾向港英当局表示，愿意配合守卫香港。但港府最初出于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也因为看不上这些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民间武装”，故予婉拒。

对保卫香港的全盘计划，港府更倚重英军，但可供调

曾生





香港义勇军在湾仔修顿球场外步操，这是战前的最后一次出操

遣的军队与备战资源，实在太过匮乏。他们考虑过派军队从越南入境，配合中国政府的游击队，打击华南日军。但格于现实条件，难以施行。从1939年开始，港府征召外籍青壮年加入皇家香港军团（义勇军），发给枪支弹药，每周三、周六下午进行操练和射击训练，以期在战事开始后，协同英军作战。

1939年，港府成立了防空署，负责防空疏散、扑灭大火、抢救设施、维持治安、救死扶伤、消除毒气等工作。1940年，又陆续成立劳工咨询委员会、战时税务署、粮食管制署等机构，防范在战时发生工业行动，以及管理战时税收、粮价、粮食储备等问题。大量兴建防空工事，扩充警队，成立独立消防局、移民局、军用物资委员会等。5月，下令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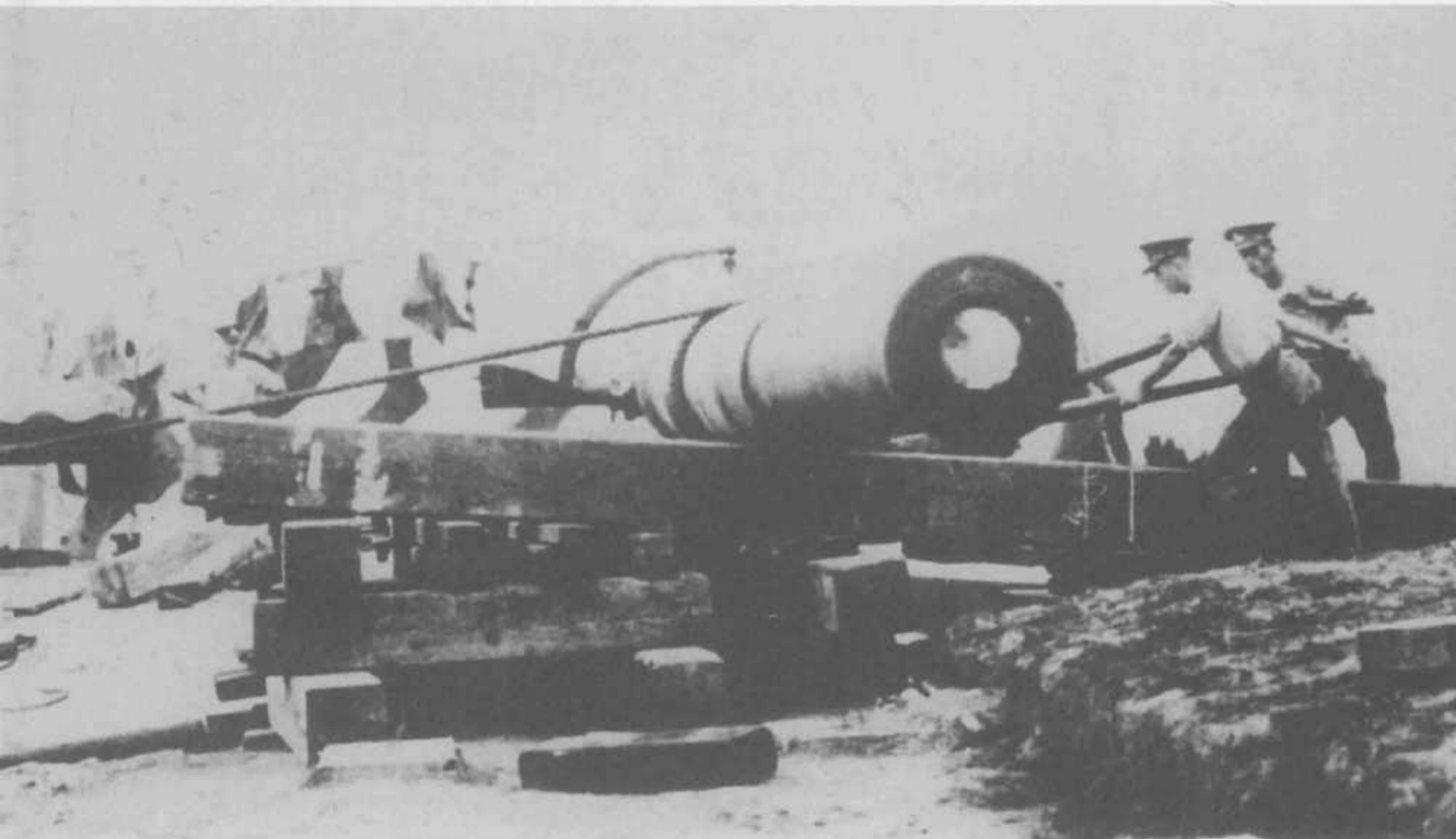
召超过55岁的外籍人士组成休斯兵团。

为了加强香港防务，英国派马尔比（Major General Maltby）少将接替格拉塞特，担任驻港英军总司令。格拉塞特回国后，不断向英国陈言，只要再多派两个营的兵力，香港就可以永久地固若金汤。英国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两个营加拿大兵到香港增强防卫，同时，加紧构筑香港的各处防线，准备应付日军入侵。



英军苏格兰营军官正在观察城门水塘

英军在新界架设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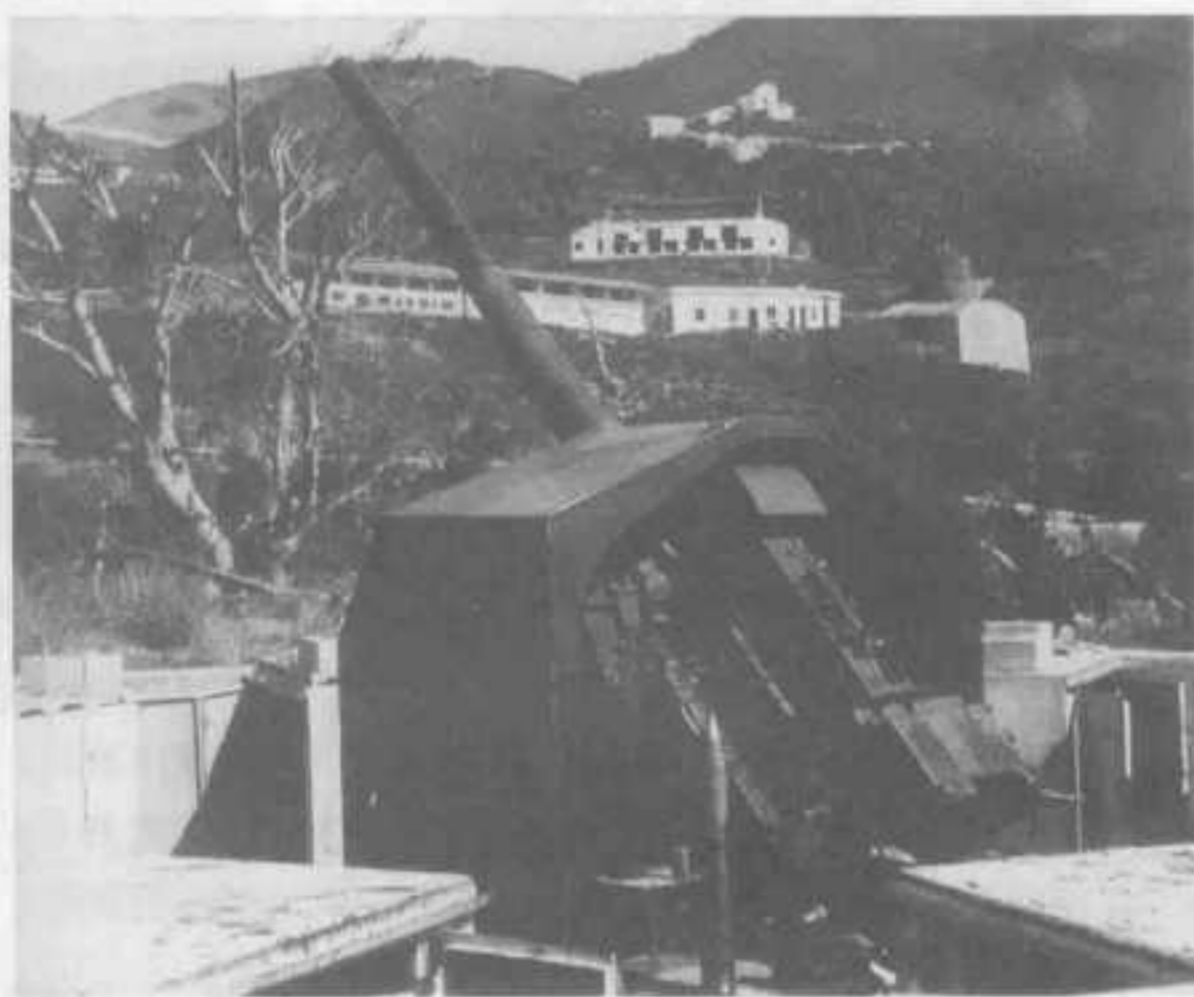


英军在新界的炮兵阵地



1941年4月14日，日本允许省、港、澳轮船部分复航，每周由日本轮船“白银丸”和悬挂英国旗的“佛山”号轮船，定期往返于省港之间，难民潮卷土重来，人们扶老携幼，投奔这座危在旦夕的孤岛。每当轮船缓缓泊岸，从烟囱吐出的黑烟，在海面上升腾、扩散。钟声一响，好像开闸放水一样，顺着跳板泻下一波一波的难民，个个满面风尘，步履踉跄，肩上扛着行李，手里拖着小孩，在东张西望的目光里，充满着希望。而那些正焦急候船撤离香港的人，默默伫立码头，看着这些下船的难民，内心不禁百端交集，真不知该替他们喜，还是该替他们忧。

英军的高射炮





第21任香港总督杨慕琦

9月，第21任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到港上任。这位55岁的殖民地官员，1909年至1928年间在锡兰任职，官至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来在塞拉利昂及巴勒斯坦托管地服务。他在1933年至1938年任巴巴多斯总督和1938年至1941年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期间，推行改革，颇获英国政府的赞许。

入秋以后，香港局势进一步紧张。港府鼓励市民参与消防、医疗辅助队等组织，大批学生、公务员及银行职员响应号召，加入到这些组织，接受训练。由商界资助、拥有逾千成员的“街坊自卫团”，亦因应局势发展，转变为“特务警察”。在市内已建立超过800个防空救护站，每个站派驻六名防空救护员，计划建立1600个这样的救护站。

战前香港市区内经常举行
防空救火演习





湾仔大佛口山旁防空洞，白色建筑是机关枪堡

港府开始实行灯火管制。每隔几天举行防空演习、消防演习。要求在遇到敌军夜袭时，香港要在两三分钟内熄灭所有灯火。政府又以征召公务员中的青壮年组成后备警察，每人发给钢盔、警笛和一束麻绳，上街巡逻，协助警察维持治安；所有在英文书院读书的高年级学生，都接到通知，参加圣约翰救伤队的训练，准备担任战地救护。政府要求没有固定职业的居民，尽早疏散外地。酒楼食肆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夜间10时；茶楼、酒店、戏院、舞厅，到处张贴着“军事秘密，切勿妄谈；敌人有耳，必须提防”的警告标语。居民非有特别事项，不得在夜间10时以后外出。在防空演习期间，如有遮蔽不严，灯光外泄，一旦发现，就要重罚1000港元。许多人跑到市区，买张电影票来消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漫漫长夜。

满街都是用蓝布蒙着灯泡的手电筒，晃来晃去，闪闪烁烁，就像繁星一样。这是香港和平时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后印象。

凉风渐起，秋意渐浓。

当象征着盛夏的“大火星”已渐西沉之际，宋庆龄在香港的寓所中，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文章，她的内心，仿佛也有一颗大火星，贯注于笔端，迸发于笺纸，赋予字字句句，有惊涛裂岸的力量：“对于中国大多数阶层人民来说，他们绝对不能忍受奴隶的生活，像他们亲友在沦陷区内所遭遇的那样。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做奴隶，任何内政外交的措施，只要为继续抗战所必需，都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士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而且以后它也要存在下去，因为建设的工作也与抗战一样需要长期的团结。我们希望在战后实现一个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的中国，在这个中国里，工人、农民、工商业家、学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将享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她呼吁所有热爱民主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的民主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①

10月27日，两营加拿大军团（近两千人）启航赴香港，在11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抵达香港。随军的加拿大军医肯·凯姆本（Kenneth Cambon）在回忆录中写道：“香港方面为我们举行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的船穿过狭窄的水道，驶入宏伟的港口，形形色色的帆船和舢板尾随着‘艾瓦提’号云集港湾。迎接我们的鱼雷快艇‘嘟嘟嘟’地叫着，像海豚一样簇拥着我们的船。几架老掉牙的水陆飞机从船上掠过，显



^① 宋庆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载《为新中国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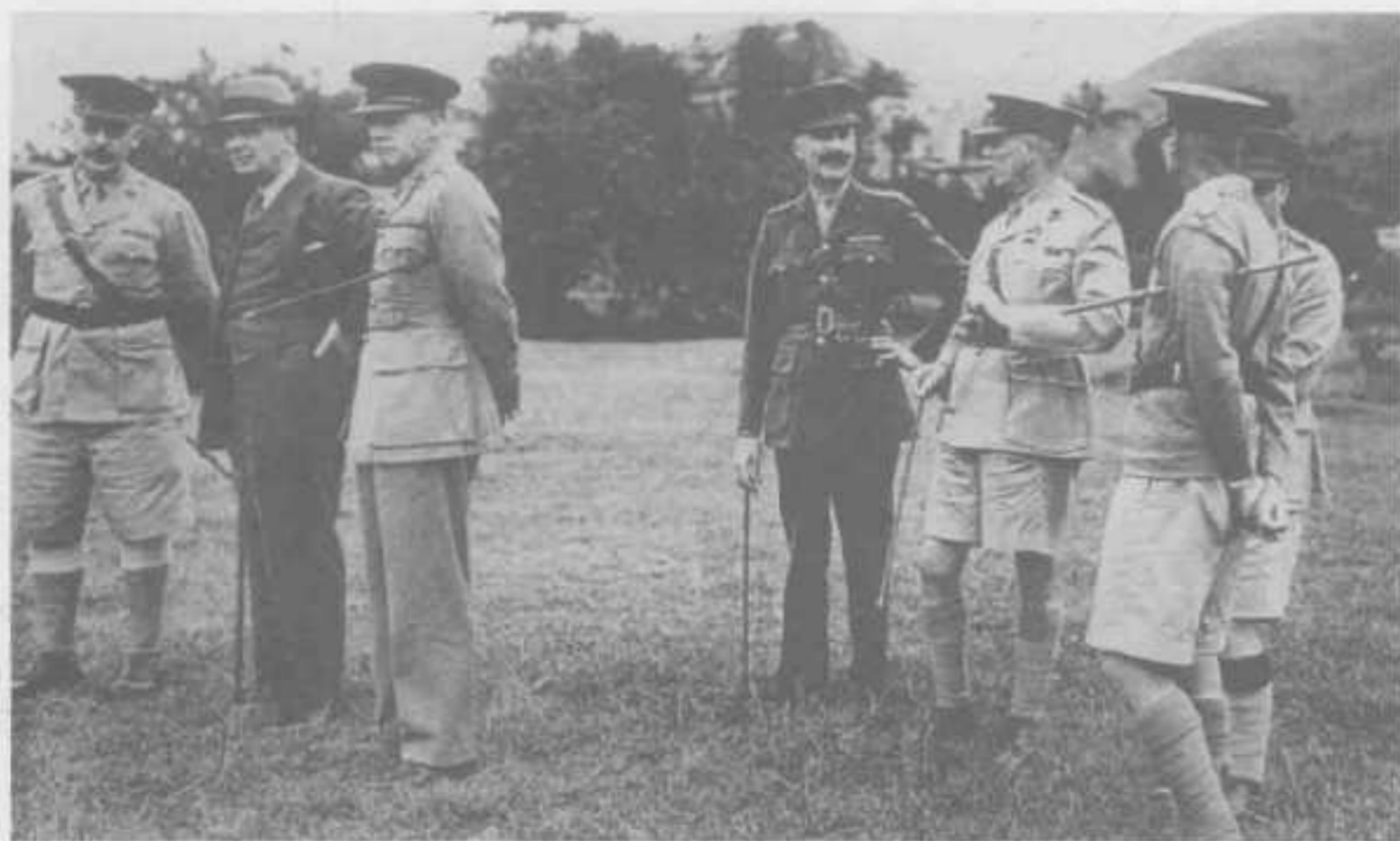
来港支援的加拿大援军



- 1 / 加拿大兵在战前抵达，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中殉职
- 2 / 加拿大援军，图中左边的三位军官皆阵亡

然，喷气式战斗机和飓风式驱逐机还没有投入使用。可悲的是，这种陈旧过时的飞机只有区区五架——两架水陆两用战斗机，三架‘野蜂’号鱼雷轰炸机，组成了香港全部的空军力量。”^①加拿大兵上岸以后，在军乐队的伴奏下，神气活现地列队穿过弥敦道，进入深水埗的军营，沿途受到香港市民的夹道欢迎。

^① [加]肯·凯姆本：《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役》，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港督杨慕琦爵士在抵港后不久巡视防卫工作

一般的国际视听，都把香港的情况，视作对太平洋危机反响的气压计。香港镇静如常，就没什么值得慌乱的。但杨慕琦上任后，香港表面虽然平静，但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加紧布防。当时英军在香港几乎没有空军，防空力量也极为薄弱，而日军的轰炸机从广州、海南起飞，可以轻易地威胁到香港。这时英军想起了共产党的游击队。10月下旬，英军通过私人关系，与廖承志秘密接触，请冯白驹领导的海南岛中共武装，帮助他们炸毁日军在海南岛的机场。他们希望冯白驹派人到香港学习使用这种炸药，以接济冯部军火和无线电器材为交换条件。

廖承志向他们提出条件：一、对日作战绝不愿以炸一次飞机场为限。而当长期发展海南游击战争，应以此为合作的先决条件。二、假如决定合作应由英远东军负责人与我们详商具体办法。三、为便利冯部发展游击战及保持与英方联络，应允许冯部在港设办事处及电台，英方应保证其合法性及人身安全，并须有一团人的机枪、步枪装备运往海南交冯部。他向中央请示后，毛泽东复电：“同意我方与英方合作，并同意在可能条件下轰炸飞机场，条件如你所提在港设



香港防卫军的华人传令兵

联络机关，彼方供给枪械、弹药、经费，帮我训练轰炸干部。”^①

到11月中旬，太平洋风声愈紧，英军的态度也愈急，答应廖承志对中共琼崖、东江的游击队尽量帮助，甚至可以把存放在香港的500挺机关枪和大批破坏性炸药交给中共。但廖承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他急我不急慢慢来。”乃向英方提出新的条件：一、要英方的钱，绝对不要英方的人。二、英方对中共琼崖、东江甚至新四军武装进行接济。三、最低条件是英方为东江、琼崖的武装提供三个团的武器装备、医药和经费，以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电台。四、中共派十余人在港受训练，使用新武器。毛泽东在11月21日的复电中提醒他说：“开口不要太大，条件不要太苛，融将来难于兑现，反为不好。”^②

然而，局势的发展，已如悬瀑急泻，和平的最后日子，开始倒计时了。即使身在香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不太多。

12月份，是一个石破天惊、改变世界的月份。

^① 载《深圳档案文献演译》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同上。



高等法院外的沙包掩体



湾仔庄士敦道油站口机枪堡

踏入12月的第一个晚上，港府宣布，香港驻军一部已进入作战岗位。并通过华人代表罗旭和爵士，在ZEK电台发出紧急呼吁，敦促不必要的居民尽快撤离该地。辅政司也发出相同的呼吁，声称入境事务局将从速签发离境证件。

人们面带忧色，交头接耳：这回是真的要开战了吗？但翌日有消息说，英国新成立的东方舰队已开抵新加坡，其中有巨型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巡洋舰反击号。英国在太平洋的防卫力量，大大增强。人们顿时松了一口气，继续上茶楼一盅两件饮茶去。因此，尽管战云渐浓，响应政府呼吁离港的居民，却寥寥无几。怡和洋行本来拨了一条轮船，专供疏散居民之用，但因为人数太少，最后取消了这个计划。各大华文报馆如《大公报》《国民日报》《星岛日报》等，均派人通知政府，万一战事爆发，各报仍将照常出版。

醉酒湾

12月5日，香港取消警察休假，宣布实行粮食统制。荷兰驻港领事馆劝告非必要留港荷侨一律撤退，荷侨纷纷迁往澳门。当天，香港警务处处长俞允时（John Pennefather-Evans）偕同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廖承志匆匆见面。英方同意中共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但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不进行群众运动。而英方则拨给琼崖纵队驳壳枪1000支，或轻机枪250架；另拨给东江纵队驳壳枪500支，或轻机枪50架。他们负责运到广州湾，余下路程由中共方面负责。廖承志认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但可惜已没有时间去兑现了。

路透社12月6日从伦敦发电称：“太平洋局势诚为严重，时事趋向，颇有惨剧垂有，随时可揭之象，然和平维持现尚在一线希望。”但仅在24小时之后，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便发出警告：“太平洋时局，已届极度紧张关头！”国际社也声称：“日本侵略新攻势，随时可以爆发！”7日午后，港府颁布两项通告，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动员所有志愿队、陆军部队布防，护士队和救护车队亦奉通知，六小时内出动。

但早已习惯于没完没了演习的市民，都没把这当一回事，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是战前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天。若干年后，战争已经结束了，许多历尽苦难的香港人都尝试回忆，12月7日那天晚上，他们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老作家黄秋耘回忆说：“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整个香港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加路连山上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嘉年华会’正在表演着各种各式的游艺，露天舞池的管弦乐队演奏着华尔兹圆舞曲，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空中不间断地旋转着电动风车降椅和轮座机，在五色缤纷的彩灯的点缀下和小型探照灯的光照下辉煌夺目，连夜空中的云块也被映得通红。像泉水般源源不绝而来的香槟酒和各类美酒充分供应给绅士、淑女们尽情享受。”^①

一位名叫陈谦的香港人说，那晚他和朋友在高升茶楼饮夜茶，一直到10时打烊才付账下楼。“我在高升门口买晚报，”他后来追述，“报贩忽对我说：‘这次是最后一次交易了。’我愕然问故，他隐约其词，大概是说：‘明天自有分晓。’我回家后，尚不以为意。”^②

是啊，明天与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吗？

① 黄秋耘：《风雨年华》，载《羊城晚报》1983年10月30日。

② 陈谦：《香港沦陷前后港德见闻杂记》，载《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五辑。

12月8日那一天

12月8日，星期一。

这一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已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也有无数亲历者一遍遍的讲述，一篇篇的回忆文章，为历史留下了巨细无遗的记录。即使要以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为单位，或者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格一格去还原它的过程，也不是太困难。

从半山区俯瞰维多利亚港





霍英东



今天的皇仁书院



这天清晨，寒风凛冽，气温从半夜骤然下降，香港海面笼罩着薄雾，十分平静。8时以后，马路上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湾仔谢菲道有一位少年夹着书包，匆匆而行，他的名字叫霍英东，皇仁书院的学生，今天要赶回位于鸭巴甸街的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出身贫寒的霍英东，平时省吃俭用，上学都是靠两条腿，今天因为要赶考，决定奢侈一回，坐电车回学校。

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一个水上人家的家庭，父亲在他7岁那年去世，他一直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1936年，霍英东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皇仁书院。直到1914年香港大学开办之前，皇仁书院都是香港的最高学府。1912年前后，有大约两千多名学生。许多校友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巍巍，如雷贯耳，皇仁校史的“荣誉榜”上，可以看到孙中山、廖仲恺、唐绍仪、伍廷芳等政治家的大名，还有何启、何东、利希慎、邓肇坚、何鸿燊等一大批后来在港澳政商界叱咤风云的名字。

8时许，霍英东顶着刺骨寒风，还在电车站等车。蔚蓝的天空突然传来隆隆的引擎咆哮声，压过了北风的啸声。数十架涂着鲜红太阳标志的日本九八式轻轰炸机，由九七式战斗机护航，排成“V”型队列，像鸦群一样出现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出凶神恶煞的嚎叫。他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脚下的大地也在颤动，从西边升腾起大股大股的黑烟，感觉距离非常接近。接着，从太古船坞、启德机场方向，相继传来连串爆炸声。凄厉的警报声，瞬间响彻全城。霍英东后来描述：

1941年12月8日早上，因为学校考试，这天没有走路，要花三分钱坐电车，希望争取多些温习时间。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九龙方面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接着响警报，不久知道日本进攻香港，不用上课了。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

重，考试带来更大的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为了这一阵开心，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这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学校……^①

霍英东拔腿就跑，穿过混乱的人群，一口气跑回皇仁书院。学校大门紧闭，贴出了一纸紧急通知：全体学生暂停上课和考试。但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恢复上课。由于暂时不用应付繁重的考试和功课，霍英东怀着略感轻松的心情，掉头往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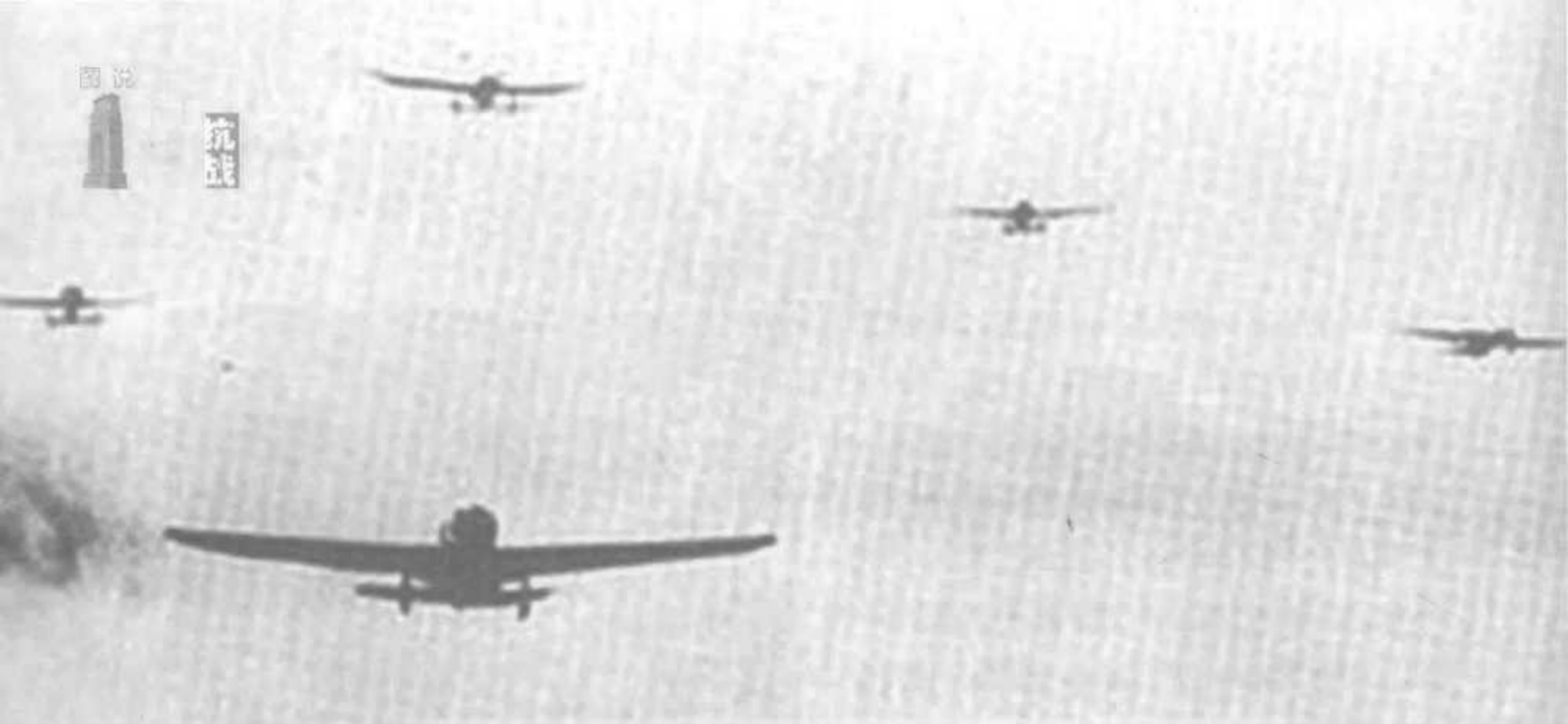
① 霍英东：《我与体育运动》，载《我的参与》，霍英东基金会，2003年版。



维多利亚港中部

日军战机轰炸香港





马路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似乎不太在乎轰炸，一个个踮足仰头，看着从头顶掠过的飞机。最初他们以为只是防空演习，记者唐海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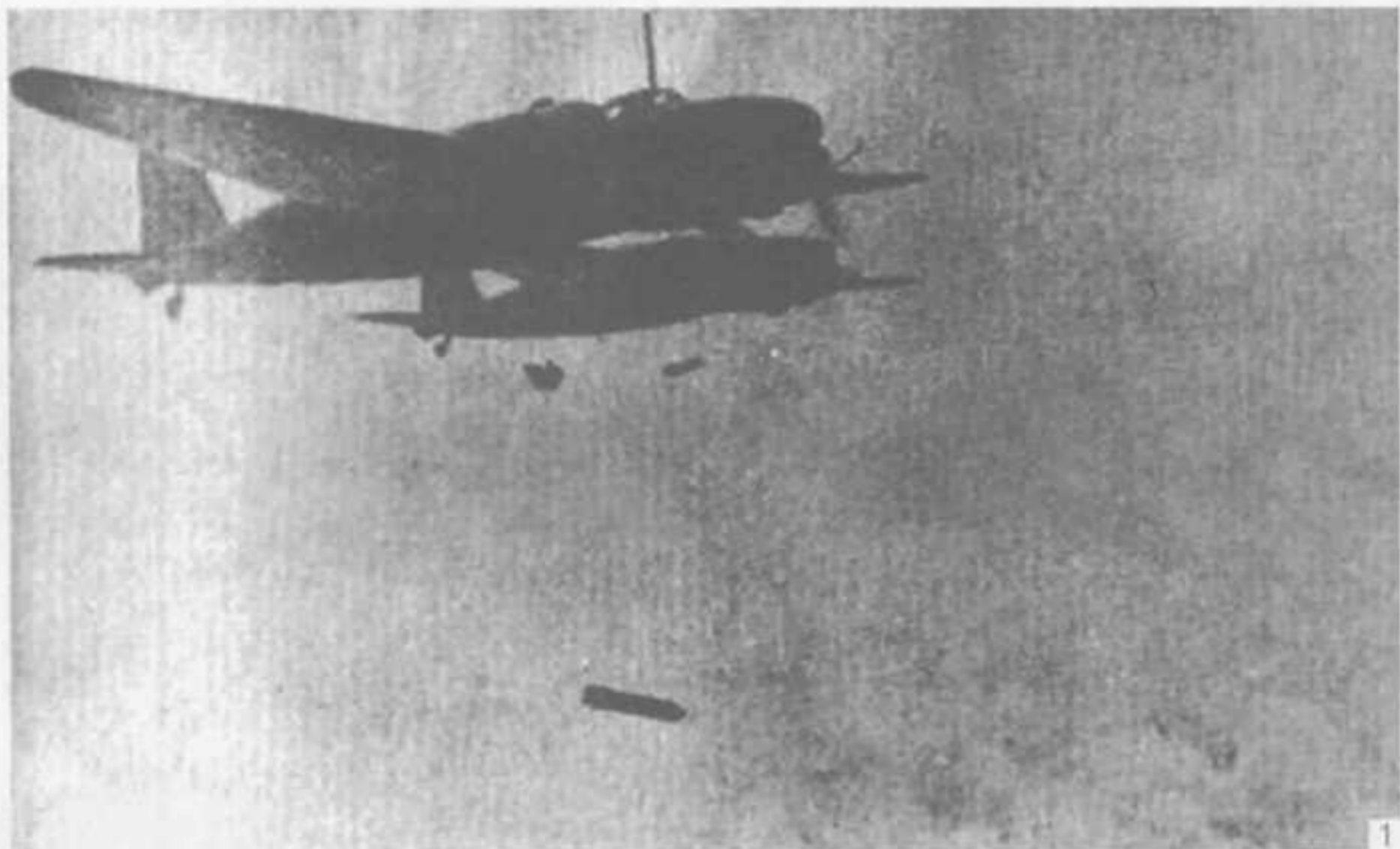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8日清晨7点钟，我起了床。九龙弥敦道上是和平时一样的宁静：公共汽车已经有了，但来回的次数很少；小汽车偶然地掠过，并不足以妨碍弥敦道上的安静；几家食品店铺已经陆续地卸下店门，穿着干净的白色工作衣的伙计，还是倚着店门，闲着瞧住过往稀少的行人。

沿着海边的儿童公园、草地上，我缓缓地踱着。刚吃过早点，拿着早上才送来的报纸，坐下椅子打开来，第一条大标题还是罗斯福呼吁日皇停止战争的消息。才一刻，忽然听到隆隆的飞机声，一阵猛烈的炸弹爆炸声跟着响起来，高射炮亦随着发出声音了，炸弹与高射炮声连成一片，割破了早上宁静的空气。

几个散坐草地椅子上的人，立即站起来向着落弹方向看过去，那面已经冒着黑烟起火了。不一刻，一辆疾驶的救火车掠过我们的前面，异样的喇叭声，怪刺人耳朵，我正犹豫着想回去，旁边一位穿西装的青年朋友像感叹一样地说：“好逼真的防空演习啊！”

① 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上海，上海新新书局，1946年版。





1 / 日军轰炸机
2 / 日军九七式战斗机

然而，当四面传来爆炸声，空气中也能闻到浓烈的硝烟时，他们才突然明白，战争真的来了，和平的日子结束了。

香港大学也停课了，本地学生纷纷赶回家，外地学生只能留在校内，等候消息。香港大学二年级学生何鸿燊，正在学校准备考试。听到停课通知后，匆忙收拾书本，飞奔离校。何鸿燊小时候不太喜欢读书，1931年，他入读皇仁书院，是D班学生，即入学时成绩最差的一班。还没毕业时，父亲和几个兄弟一起炒股失败，倾家荡产，几兄弟一个吞枪自杀，另一个服安眠药自杀，他的父亲也逃往越南。这时，面临退学威胁的何鸿燊，才开始发愤读书，靠奖学金读完了全部课程，1939年考入香港大学。局势紧张时，外籍青年奉召加入义勇军，何鸿燊有着英国、波斯、犹太和中国四个种族的血统，自然义不容辞。停课



后，他向义勇军报到，被分派往一个防空报警室当接线生。

那天，与何鸿燊一起工作的接线生，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隆隆的轰炸声中，开始了人生中最忙碌的一天。尽管九龙、港岛受到空袭，但港九之间的电话线并没有中断，各种消息洪水般涌来，造成线路大塞车。一天下来，人人都忙得唇焦舌干，头晕力竭。她们并没有想到，这个与她们坐在一起，接听各方面电话，不停地拔插线路插头的英俊小生，日后会成为对澳门社会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物。

后来在文坛负有盛名的作家张爱玲，这时也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同样地，在同学中也没有谁认为她今后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亮的星星。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最初考取的是伦敦大学，但因为欧洲战争无法入读，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以优异成绩获颁何福奖学金及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她和何鸿燊是同一年考入香港大学的，张爱玲读文科，何鸿燊读理科。他们都算是名门之后，但并不相识，唯一的交集，也许就是张爱玲所获得的何福奖学金，是以何鸿燊祖父的名字命名的。

张爱玲并不是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青年，她与动荡的时代似乎刻意保持着一种距离，兵荒马乱的涂炭之苦，与她的生活似乎也不太相干。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这种心情，和霍英东听到战争时的第一反应，颇为相似。年轻人怕考试，更甚于怕战争。张爱玲描述同学们对战争来临的反映：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



张爱玲



香港防空救护员，张爱玲在空袭后曾担任的工作

一座刚建成的防空洞

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①

这天早上，寄读于香港铜锣湾圣保禄女中的陈香梅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了。她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修女们紧张地冲进宿舍，指挥她们躲到地下室去。地

^① 张爱玲：《烬余录》，载《天地》月刊，1944年2月第5期。



陈香梅与丈夫陈纳德

下室寒冷霉湿，空气混浊，令人窒息。陈香梅在回忆录《春秋岁月》里写道：“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①

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人们开始了解到，日军在当地时间12月7日清晨8时左右（香港时间12月8日凌晨2时20分左右），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海军在瓦胡岛上的机场。这一天，不仅香港受到日军轰炸，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地，也同样受到袭击。日本向美国、英国宣战，美国、英国随即也对日本宣战。中国政府在第二天发布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正式对日本宣战。中国内地各大报馆都发出号外：“我国政府正式布告，对日德意三国宣

① 陈香梅：《春秋岁月》，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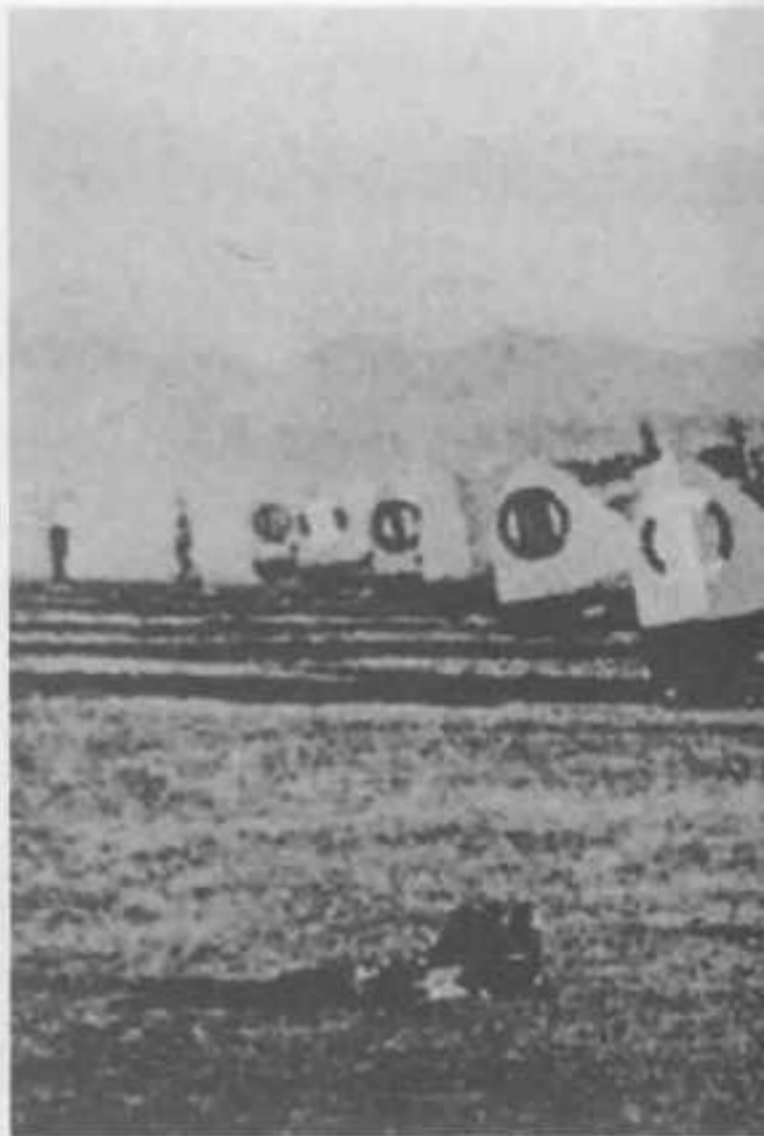
战，蒋委员长与英揆互勉努力。”人们欣喜若狂。一位美国人描述他在中国看到的情景：“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中国就好像是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这一天，也是记者们职业生涯中最忙碌的一天。清晨，萨空了从寓所匆匆出来，准备从九龙过海到香港岛打探消息。但他听说港府宣布了新规定，从香港可以自由过九龙，但从九龙过港岛则要到亚士厘道西人青年会领取通行证。他走到西人青年会时，那里已经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香港人对战争的态度，似乎很镇静而乐观，甚至觉得打仗归打仗，不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很多人冒着空袭的危险，和往日一样按时出门上班，他们更担心的不是挨炸弹，而是迟到。

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正是早9时，住在九龙的香港各机关职员都应在这时上班，大家全过不得海，可是都希冀或者可以通融，不肯折回，于是尖沙咀似乎成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场面。九龙公共汽车照常行驶，由九龙城深水埗来的车，带来了启德机场、深水埗英兵营及其附近被炸的消息，更增加了这些群众的骚动。汉口道的几家面包店，因为香港政府已经下令统制粮食，黄油面包已须排队候买，不到一小时，各店完全宣布售罄。向隅的大有人在。”^①

《华商报》记者华嘉追述那天的经历：“8日的清晨，约莫8时光景，空袭警报非常突然的凄厉叫了起来。告罗士打行三楼的‘远东情报部’正式公布了日本向英美宣战的消息。我从告罗士打行出来，碰见一个在新闻界的朋友，他告诉我：‘刚才日本飞机炸启德机场和深水埗兵房，听说宋皇台附近的民房也炸了不少。’我回到写字室看路透社的电报，知道日本在7日的清晨已经突袭珍珠港。太平洋的战争便是这样突然地全面爆发。”

美国和英国终于参战了！这个消息令他兴奋莫名。华嘉说：“其实就是全个香港的一百六十多万中国侨胞，除了少数汪记走



萨空了



^①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日军飞机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空袭香港



金钟兵房

卒和另一些幸灾乐祸的寄生虫，谁又不为这划时代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兴奋呢？”^①

日军对香港的攻击，从清晨4时——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约两小时以后——正式展开，行动代号为“花开，花开”。

12月8日凌晨3时51分，日军第二十三军酒井隆中将终于等来了大本营参谋本部在11分钟前发出的“花开，花开”特急电报。酒井隆随即下达了对香港实施轰炸的命令。清晨7时，12架日本轰炸机，在3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直扑九龙、港岛。香港拉响了空袭警报，第一颗炸弹落在金钟兵房，地动山摇，开出了一朵燃烧着的恐怖之花，霍英东在电车站听见的，就是这颗炸弹的爆炸声，金钟兵房离湾仔只一箭之地。

夏衍也听见了这一声爆炸。对他来说，这声音太熟悉了。当初，日军在进攻广州前，也从空中进行了反复的轰炸。夏衍在广州主编《救亡日

^① 华嘉：《香港之战》，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



战前的启德机场

报》，他曾经形容说，当炸弹落下来时，与空气摩擦发出“哗哗哗哗”的声音，“这凄厉的声音以一种可怕的力量，深压到每个被威胁者的灵魂深底，在这一瞬间使你失去思考的余裕，闭着眼睛等着，也许下一瞬间你的生命就会这样的消去。接着，是震聋耳膜一般的轰响，窗格的震动，玻璃裂响，一两秒钟之后是一阵黄灰色的烟，冲鼻子的是一种泥土和火药气混在一起的使人喷嚏的臭气……当然，在这几秒钟间，几十几百也许是近千的生命是像蝼蚁一样的消失了！”^①现在，他不得不重温这种可怕的感觉。

爆炸声也传到了宋庆龄在九龙嘉林边道她弟弟宋子文的寓所里，窗玻璃被震得哗哗作响。空袭启德机场的日军飞机，不断从九龙塘一带的天空掠过，飞往启德机场方向，带来沉雷般的嘶吼。站在寓所的院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日军飞机投下的阴影，从地面、墙壁、屋顶一掠而过，如同成群的秃鹫飞过一般。宋庆龄在保姆的协助下，翻墙到邻居的防空洞暂避。当第一

^① 夏衍：《广州在轰炸中》，载《夏衍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波的空袭过后，她到街上察看，只见四处断壁残垣，烟火缭绕，死难者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路边，覆盖着厚厚的尘土，连鲜血也已被这尘土吸干了。宋庆龄悲愤莫名，立即用电话向英文《南华早报》口授了一份声明：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同你们大家一样，发现战争已经降临香港。我看见炸弹落在九龙街道上。我看见十几个男人和妇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吗？

现在，在中国内地已发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想先征服中国，现在又在尝试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

这一战争，如同在它之前业已失去的和平一样，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分开。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经以为分开是可能的，那么日本的炸弹已经来告诉他们，大伙面临的共同危险将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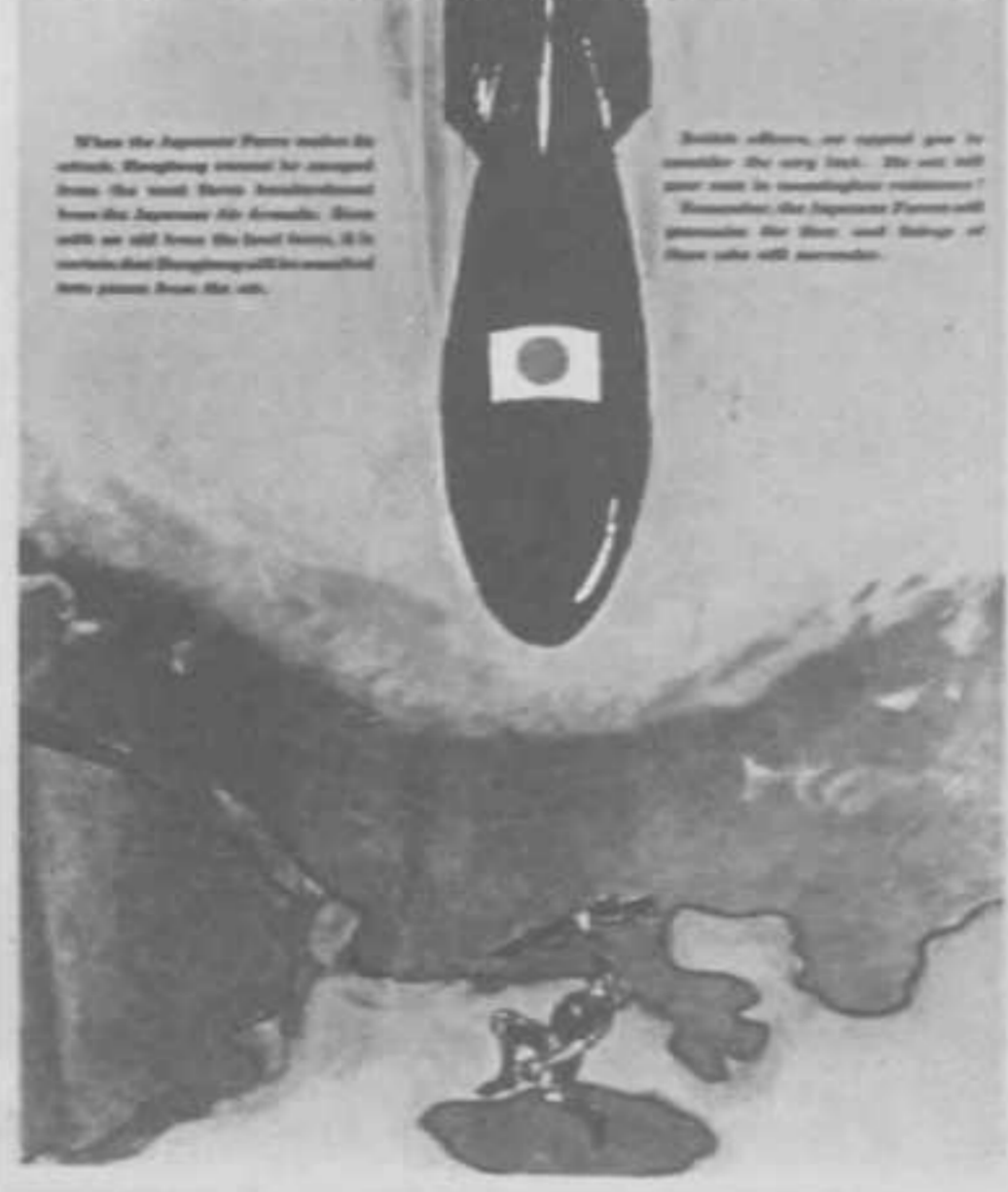
那就让我们明白地说出来，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必需的是什么——炸弹已经千真万确地掉下来了！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我们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联盟，使反法西斯国家的所有资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战场上。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全世界的民主阵线，它将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庆的人民在所有严酷考验的日子里从不动摇。现在是香港人民表现出同样精神的时候了。这种精神在过去那些战争的年月里曾为他们英雄的同胞们赢得了名誉。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大海，回到他们原来的岛屿上去。^①

声明措辞之激昂，感情之充沛，反映出日军暴行对宋庆龄精神刺激之深。她似乎不是对着电话说话，而是直接面对站在被告席上的日本军阀，发出她的怒叫。她深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艰巨，但她对正义充满信心，对人的良知、对历史的抉择，充满信心。如果像日本法西斯这样的魔鬼最

^① 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STOP USELESS RESISTANCE.



日军向守军投下的劝降传单

后竟能取得胜利，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足以维系后世呢？

启德机场上仅有的五架英军老式飞机，很快被日军摧毁了。制空权完全在日军手里。英军只能靠地面的高射机关枪和几门高射炮拦截轰炸机，但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华嘉描述：

“日本在香港的空袭是非常狡猾的，是一架东一架西，企图避免在那么一点小的天空上，遭密集的对空防空射击的炮火。”引擎的吼声与机枪的嘎嘎声响成一片，喧嚣不已。高射机枪的子弹，在燃烧的空气中，划出纵横交错的火网，炮弹不断开花，在天空

被日机炸毁的英军飞机



绽放出朵朵烟云，蔚为壮观。

据一位在湾仔船厂打工的女工回忆，那些日本轰炸机排成品字形的队列，轰炸鹅颈桥。那里有很多人在买东西，炸弹一颗颗丢下来，尸横遍地，捡了一个星期还没捡完。另一位湾仔居民回忆，一响警报人们就各自找地方躲藏，日本人目标是炸船坞的，但他们把全湾仔都炸了，是地毯式的轰炸，一路扫过去。警报过后，人们出来一看，整个湾仔都炸平了。

就在九龙遭到空袭的同时，日军正从新界北部边界分三路大举入侵，一路沿广九铁路挺进上水、粉岭，直趋大埔、沙田；另一路从宝安渡河，沿青山道向西南前进；还有一路从新田向新界纵深挺进。第一飞行集团和第二遣华舰队则提供空中和海上的支援。一场决定香港命运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

被轰炸的沿岸地带仍在冒烟



九龙陷落

12月9日，星期二。

波浪式的空袭还在持续，从早上7时到中午12时，空袭警报一共拉响了五次，港府开放了所有防空洞，供市民躲避。人们不停地往避难室和防空洞奔跑，被反反复复的警报，解除，警报，解除，警报……搞得精疲力竭。

港府发布命令，要求登记所有私人汽车，随时征用。呼吁所有船家，自行把船只凿沉在鲤鱼门和汲水门的航道上，阻止日本军舰入侵。停泊在港口内的泰山、龙山、东安、大利、安利等轮船，都被凿穿船底，先后在汹涌的波涛中，缓缓沉没。围观的人群默默无言。汇丰银行储蓄部每天只开放两小时，每位市民只能提取两百元现金。青洲、昂船洲、灯笼洲、东龙岛等地，均列为防卫区域，禁止任何人登陆。





摩星岭炮台



从九龙半岛远眺港岛，约摄于1930年



攻击守军阵地的日军炮兵

由于英军无意防守新界，守军的爆破阻延部队在对道路略作破坏后，便撤入了醉酒湾防线。所以开战第二天，日军已推进至大帽山及马尿水一带。第一批日军骑着战马，沿新界公路，得以长驱直入，直驰九龙，醉酒湾防线上的守军，几乎可以看到马队扬起的尘土了。

本来，英军已把新界各地的主要道路、铁路切断，日军原定计划，至少要一周后，各部才能推进到作战位置，向醉酒湾防线展开攻势，但其中一部日军抵达城门水库附近时发现，号称没有外援也可以固守两个星期的城门碉堡，现在居然只有三十七名英军守卫，不禁喜出望外，不等请示上级，便擅自发

在新界推进的日军



起进攻。于是，地面的攻防战，便在城门水库以南的孖指径首先打响了。

晚上，日军偷偷渡过城门河，沿着黑暗笼罩的山坡，一直匍匐爬到离英军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在山谷中隆隆作响的北风，成了日军最好的掩护。直到一名到树林里解手的英军哨兵，忽然听见在密密麻麻的树丛里，传出“叽里咕噜”的日语交谈声时，才发觉大事不妙，掉头狂奔，一口气跑回阵地，操起机关枪就往树丛里扫射。战斗猝然间爆发了。尽管英军士兵英勇抵抗，最后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但力量太过悬殊，日军很快就把他们消灭掉，攻占了城门碉堡。

城门碉堡失守，防线被撕开缺口。第二天早上，驻守九龙塘的英军要求昂船洲炮台向城门碉堡炮击，掩护他们反攻。不料，昂船洲炮台都是毫无经验的义勇军，手忙脚乱，竟对准英军的金山防线开火。英军在敌我双方的夹击下，狼狈不堪。金山防线迅速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守卫在这里的皇家苏格兰营，坚守到最后一刻，几乎全军覆没。大股日军疯狂地高喊着“万岁，万岁”，踏着英军血肉模糊的尸体，潮



金山，城门碉堡遗址的通道

日军攻入市区





水般越过了防线。

中国裔澳洲籍的阮布鲁士（Bruce Yuen）战前加入了义勇军，分配在第五高射炮队，他回忆说：“我的战斗单位，是第五高射炮队，驻守柴湾山顶，面对鲤鱼门，居高临下，控制海口，原来香港军事当局判断，认为敌人来犯，必从水路，是以一切防御工事和炮位都指向东方海面。而此次日本突袭，却来自香港九龙，由北而南，避重就轻。”^①他认为香港的防御设计，与新加坡如出一辙。日本对新加坡也是弃海就陆，先由马来西亚进攻，得手后用闪电式行军，突破新加坡后门，长驱直入占领全半岛。在香港采取的也是同一战略。

金山防线一失，整个九龙就一览无遗，全部暴露在炮火之下了。长沙湾汽油仓库中弹，油库爆炸，引起火灾，烈焰冲天，昼夜不熄。马尔比将军下令新界的英军、印度兵和义勇军，撤往港岛。撤退前，把九龙船坞、电灯厂、青洲水泥厂等工厂设备，尽量炸毁。西段的苏格兰部队即撤回港岛，中、东段的印籍部队且战且退，终于在13日凌晨自魔鬼山横渡鲤鱼门海峡撤回港岛。九龙总警司宣布，九龙警察也全部随军队撤往港岛。

这意味着，九龙即将成为沦陷区。当地居民像疯了一样东奔西跑，想尽办法过海到香港避难。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香港当局下令

^①（澳籍华裔香港义勇军逃出战俘营），载《中山文史》第二十四辑。



日军步兵联队经过新界地区

切断港九交通，根据半天来我在九龙所见到的是，九龙居民就像被斩了头的苍蝇一样盲目的四处乱撞，希望找出来一个过港的机会。过港一定好么？谁也没有工夫考虑这个问题了。”^①

九龙的天空，不断回响着警报的声音。一大早，南社诗人柳亚子就从他在柯士甸道的居所匆匆赶到码头，登船渡海。行色倥偬之间，仍意兴不减，作《十二月九日日寇突袭香港，晨从九龙渡海而作》一诗纪其事：

芦中亡士气犹嗥，一叶扁舟逐浪花。
匝岁羁魂宋台石，连宵乡梦洞庭茶。
轰轰炮火恁倭寇，落落乾坤复汉家。
孀妇将雏宁失计，红妆季布更清华。

下午，阴沉沉的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更增添了几分“凄风苦雨”的离乱之感。人们过海的心情，愈发迫切，纷纷冒雨到避风塘找船渡海。萨空了追述：“下午3时许，天下着小雨，途遇大公报文艺版编辑杨刚，还有乔冠华和四五个其他的人正叫好了人力车带着简单的行李要去公共四方街旁的避风塘，那里是香港舢板平日集中的地方，据说他们已叫好了一条舢板，如果我能即刻赶来，可以带我一家过港。”但由于时间仓促，萨空了没办法和他们一起走，只好另找了一条船，约好明天过港，但第二天，海关的巡船已经守住了避风塘的出口，不允许船家擅自带人过海。萨空了无奈，又退回尖沙咀另想办法，折腾到下午才找到一条船，把一家人载到了铜锣湾。

宋庆龄被安排乘坐飞机离开九龙，返回内地。她在这里已经工作、奋斗了四年，有她倾尽心血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现在统统都要撤回内地。尽管她不愿意走，但局势逼着她不得不走。她的姐姐宋霭龄与她同行。启德机场被炸得千疮百孔，但还有一段幸存的跑道，可供飞机勉强起飞。宋家姐妹登上了最后一班的飞机，只听引擎轰鸣，大地颤动，飞机开始缓缓滑行，小心地绕开弹坑，在跑道上加速疾

^①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1



2



3

- 1 / 1941年12月，进入大埔北盛街的日军
- 2 / 日军山炮兵联队在大埔
- 3 / 日军山炮兵联队横渡大埔广福桥



日军占领启德机场

驰，然后腾空而起，向着北方飞去。宋庆龄透过舷窗，俯瞰着这片疮痍满目的土地，默默告别。就在宋氏姐妹的飞机离港六小时后，一支日军部队便开进启德机场了。

守军从10日开始撤出九龙，到11日已基本撤完。香港警察也撤走后，九龙出现了一个管治的真空期，成了无法无天的人间地狱。亲日的黑社会分子趁火打劫，四面出动，均以左臂缠白布为标志，乘坐大巴士，沿街狂呼“胜利”口号。从深水埗到油尖旺，再到九龙城，处处群魔乱舞，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居民把这些黑社会分子叫作“胜利友”。他们在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一带

日军进攻尖沙咀



打劫金铺、商店，砸开九龙货仓大闸，将里面的存货劫掠一空。不同堂口的黑社会之间，也不断爆发火并，互相砍人、殴斗。

“胜利友”还入屋抢掠市民的钱物、粮食，甚至强奸、杀人，无恶不作。红磡、土瓜湾一带，大部分是贫民区，亦不能幸免，帮会分子点起火堆，把居民驱赶到街上，排列成行，勒令交出财物，谁敢反抗，或拿不出财物，就被推入火中烧死。这批“胜利友”刚刚洗劫完，又有另一批“胜利友”杀到。洪水猛兽，不足以喻其惨状。市民一闻“胜利”之声，无不关门闭户，鸡飞狗走。“胜利友”所到之处，哭声动地。

日军直到12日才完全占据了九龙半岛及魔鬼山，以尖沙咀半岛酒店为宪兵司令部。“胜利友”带着抢来的财物，或四散潜逃，或干脆投靠日军，充当向导，助纣为虐，继续残害自己的同胞。不少居民被日军以“重庆分子”的罪名，关押到半岛酒店，受到严刑拷打。每天晚上，从宪兵司令部里传出的惨叫声，令人汗毛倒竖，脊梁骨阵阵发冷。不时见有被打死的尸体，从酒店内抬出。

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庚白，福建闽侯县人，与柳亚子齐名的南社诗人，号称善命理之学，曾著《人鉴·命理存验》一书，时人评曰“皆言之确凿如

日军在尖沙咀



响斯应”。九龙沦陷前夕由重庆来香港，准备到《华侨日报》工作，暂住在赈委顾问黄慕兰在九龙的家里。12月12日，九龙陷落，黄慕兰逃到港岛，林庚白不幸滞留在九龙。12月19日，林庚白在尖沙咀被日军开枪射杀。这时距他到港，恰好10天。

据九龙居民回忆，当年在油麻地宝庆戏院旁边那个山坡，就是日军的一个屠场。每天都有许多被抓的“危险分子”，一车一车押送到这里枪毙。附近居民一看见日军押犯的卡车驶近，便个个面如土色，仓皇避入屋里，关紧门窗，不敢窥望。马路上顿时空无一人，如同死城。但杀人的枪声，却是关不住的，一声声传遍街巷，传入每一间屋内，传入每个人的耳鼓里，震得人肝胆欲碎。

即使事过境迁多年之后，九龙居民在追忆这段经历时，仍难免悲愤交集、痛彻心扉：“当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兽兵，到达每个地方，见人便开枪扫射，而市区人民晨早出外谋生的，一被日军见到，便遭杀害。当时深水埗至油麻地这段马路，被杀害的居民不可胜计。直至晚上，住户还不见家人回来，都觉得忧心忡忡。有些找到家人尸体，只得暗中移至附近土丘安葬；也有找不到家人尸体的，整天在街头哀

被日军从防空洞中赶出来的市民





遭到日军炮击的铜锣湾，中间高塔为虎豹别墅

哀嚎，真是见者伤心，闻者流泪。”^①

日军在九龙实行戒严，大街上布满了宪兵、警备队，所有路口都设立岗卡。居民经过岗卡，必须对哨兵鞠躬，否则就被拳打脚踢，肆意凌辱，被迫跪在地上，头上顶着沉重的石头、杂物等，有年迈体弱者，被折磨至死。任何时候，只要日军一声喝令，所有路上行走的人，都要立即蹲下，不得走动。在深水埗元洲街发生了一件惨事：一位妇人背负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遇上戒严，已经到家门口的对面了，却不能过马路，只能蹲在路边。她有一个儿子，年约七八

^① 黄海云：《日本占领香港后的悲惨世界》，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一辑。



- 1 / 日军炮兵阵地
- 2 / 中弹冒烟的港岛松林炮台
- 3 / 被炸毁的松林碉堡





岁，不知危险，在对面看见母亲，便跑出马路迎接。妇人急忙起身摇手，示意他赶紧回去。但日军看见，竟开枪射击，母子三人当场毙命，横尸街头。

在九龙城界限街口，有一个日军岗卡，因为经常随意杀人取乐，九龙城居民一说起来，无不谈虎色变，战战栗栗。这个岗卡的日军士兵，大约是因为站岗无聊，想出些法子来消遣，常在路上撒上一些小面额纸币，然后躲在岗卡上监视。一见有人弯腰捡拾，马上开枪射杀。这些路人莫名其妙，便做了日军的活靶，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负伤倒地，但因无人敢上前施救，最后亦血尽而死。这个岗



- 1 / 被炸毁的西环卑路乍炮台
- 2 / 维多利亚港西部，在西环和昂船洲对开海面可见沉船残骸

卡的恶名，在当地无人不知，许多居民宁愿绕远道而行，也要躲开这个岗卡。古人说“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九龙居民，现在对这句话有痛切的感受了。

日军占领九龙后，在何文田道设置炮兵阵地，隔海向港岛实行猛烈的炮击。成百上千颗炮弹落在港岛——这个被杨慕琦称之为“巩固而完备的堡垒”头上，到处浓烟滚滚，弹片横飞。楼房纷纷倒塌，陷入火海。英军虽然以牙还牙，对九龙实施炮击，但日军飞机可以不分昼夜地轰炸，而英军却没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香港危在旦夕。

中弹燃烧的民房



黑色圣诞节

九龙失陷后，省、港、澳水路交通中断，各国往来于香港的航线，也一律停航；甚至连市区巴士、山顶缆车也停止服务。由于交通断绝、停水停电，香港出现沦陷前的大混乱了。米铺的米价，呈野马脱缰状态，暴涨150%，仍被抢购一空；市面上的梅菜、咸蛋、咸鱼、饼干、面条、粉丝，凡是可食之物，均被沽空抢尽。惊恐万状的市民在政府粮站外面大排长龙，从早到晚，人潮汹涌，甚至连空袭也不能让他们散开。港岛所有戏院都被征用做战时粮食平糶站，头戴钢盔，腰间悬着一束麻绳的后备警察，在场维持秩序。

马尔比将军对港岛的防务，进行了重新调整。把从新界、九龙撤回的军队，分为东部旅和西部旅，东部旅负责防守铜锣湾、北角至西湾、大潭至赤柱及浅水湾等地；西部旅负责防守西环、中环海军船坞、薄扶林至香港仔、寿臣山等地。坚决防止日军在港岛登陆，建立滩头阵地。

丘吉尔曾多次致电杨慕琦，命令他死守到底，口口声声说“全世界都在看你，我们期望你能抵抗到底，帝国的荣誉在你手”，但英军在香港仅有的五架军用飞机被日军炸毁后，维多利亚港内的三艘驱逐舰，其中一艘被炸沉，其余两艘则负责将英军家眷撤往新加坡。留下保卫香港的军舰，只有几艘炮艇。他们有什么本钱抵抗日军呢？

人们开始还指望在新加坡海面的东方舰队能够赶来增援，但12月10日传来的消息却是：威名赫赫的英国皇家海军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已被日本空军击沉，而日军只付出了损失一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27架飞机受损和21名机组人员阵亡的轻微代价。消息对香港守军的士气是沉重的打击。英军既失制空权，再失制海权，剩下只有陆地上一万多英军、加拿大军、印度兵和义勇军，而 they 要面对的，是由酒井隆所指挥的五万精锐日军，从海、陆、空三方面对香港进行全面的、立体的进攻。

这时，马尔比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兼国民政府驻港军事代表陈策。如果国民党军队能够从广东方面打击日军后路，对香港之战，将起极大的帮助作用。陈策是广东琼山人，曾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及海军学校校长等职。1936年出任虎门要塞司令。由于他的左腿

陈策将军



有疾，无暇医治，日益严重，1938年赴香港就医，在法国医院锯掉了左腿。

马尔比匆匆约见这位独脚将军，同时把广州沦陷后，败退到香港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编入了义勇军，并送来左轮手枪75支、手榴弹20箱，交由陈策指挥，与英军一起守卫维多利亚城。

这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是广州沦陷后失散的国民党部队，来自中央炮兵连、第一五一师九〇四连和虎门卫士队等部队，一度退到沙头角，合编成几个营，继续节节抵抗，人称“沙头角孤军”。他们英勇无畏的行动，并不比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有丝毫逊色，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仅苦守阵地，还组织过对横岗日军的夜袭。最后因寡不敌众，伤员过多，被迫退入香港新界，被港府解除武装，先后软禁在九龙马头涌难民营和亚皆老街“孤军营”，人称“香港中国孤军”或“香港孤军”。

陈策告诉马尔比，有两个师的中国军队正兼程南下，驰援香港。马尔比大为振奋。消息也在市民中传开了。萨空了12月15日的日记写道：“今日报载中日军队已在淡水接战，华军为了配合英军作战自日军背后进攻。如果这种进攻

香港孤军营内的中国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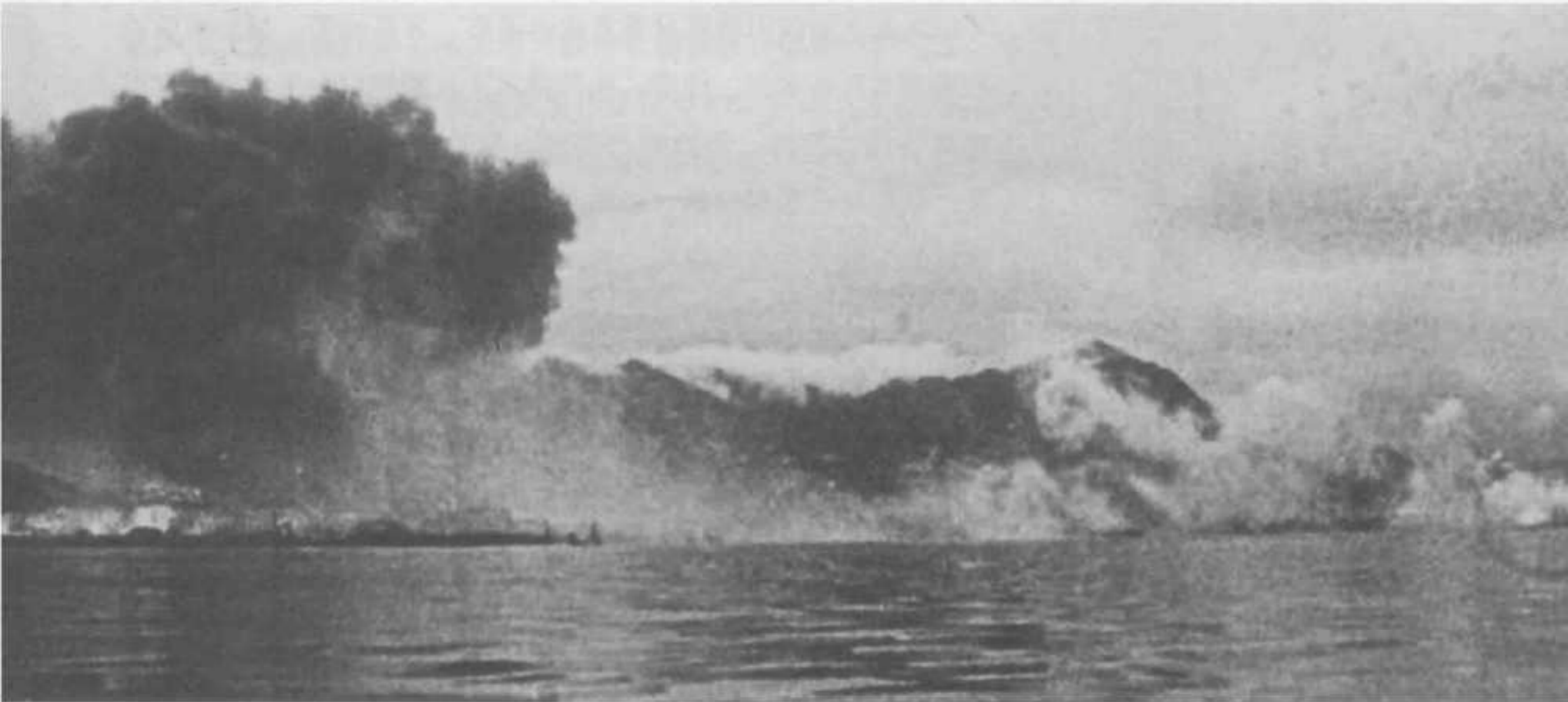
力量较大，敌军自会感觉威胁，目前香港中国人的希望渐渐转向中国军队的反攻，而不再希望英军的增援了！”然而，事后证明这个情报并不正确，陈策所说的援军没有开往香港，而是转道参加长沙会战去了。

日军在12月13日第一次派人向杨慕琦总督劝降，被其拒绝。总督下令把油麻地小轮公司的12艘轮船，全部凿沉，以阻滞日军登陆，并向全港军民发出通告，誓言抵抗到底。华人社会名流罗旭和、罗文锦、谭雅士等人，在电台联名发表讲话，呼吁民众支持当局坚守港岛，“直至蒋委员长精兵到达”。陈策亦以“中国政府驻港中委”身份发表谈话，响应港督保卫香港的广播，呼吁侨胞“共起保卫香港”。整个港岛的舆论空气，弥漫着一种共筑血肉长城的悲壮感。

这天日本同盟通讯社发出电稿：

太平洋开战5天来，敌方大根据地最先有被日军占据之虞者，厥为香港。日军于开战80小时后进占九龙，现已开始猛攻香港，而该地陷落在即。盖日军于星期三晚占据九龙，即完成对香港之包围也。日军大本营今晨简略宣布日陆军已开

日军占领九龙后即以大炮攻击港岛，令港岛北岸烽烟弥漫





一名日军在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

始攻击香港。而过去数日来，香港区已遭受日机之不断袭击，香港英守军昨因九龙被日军占领，已至第一道防线后撤。^①

九龙一带的山地被日军完全占领后，居高临下，维多利亚城和港岛的所有机关、住宅，全部裸呈于日军炮口之下，距离日军炮兵阵地的距离，不过六七千米。尽管守军战意高昂，沉着抵抗，但败局已彰彰明甚，恐怖在香港蔓延开了，市面秩序大乱，逃难的人群疯狂扑向码头。三年前，蒋介石曾预言日本不敢与英国开战，广州沦陷时，大批难民逃到香港。现在，香港也成为战场了，人们又寄望于日本不会与中立国葡萄牙开战，于是纷纷逃向最后的“诺亚方舟”——人称“咸虾埠”的澳门。

何鸿燊也离开那间狭窄昏暗的报警室了。经叔公何甘棠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商人，邀请他去澳门的公司工作。何鸿燊预

何鸿燊



^① 《申报》1941年12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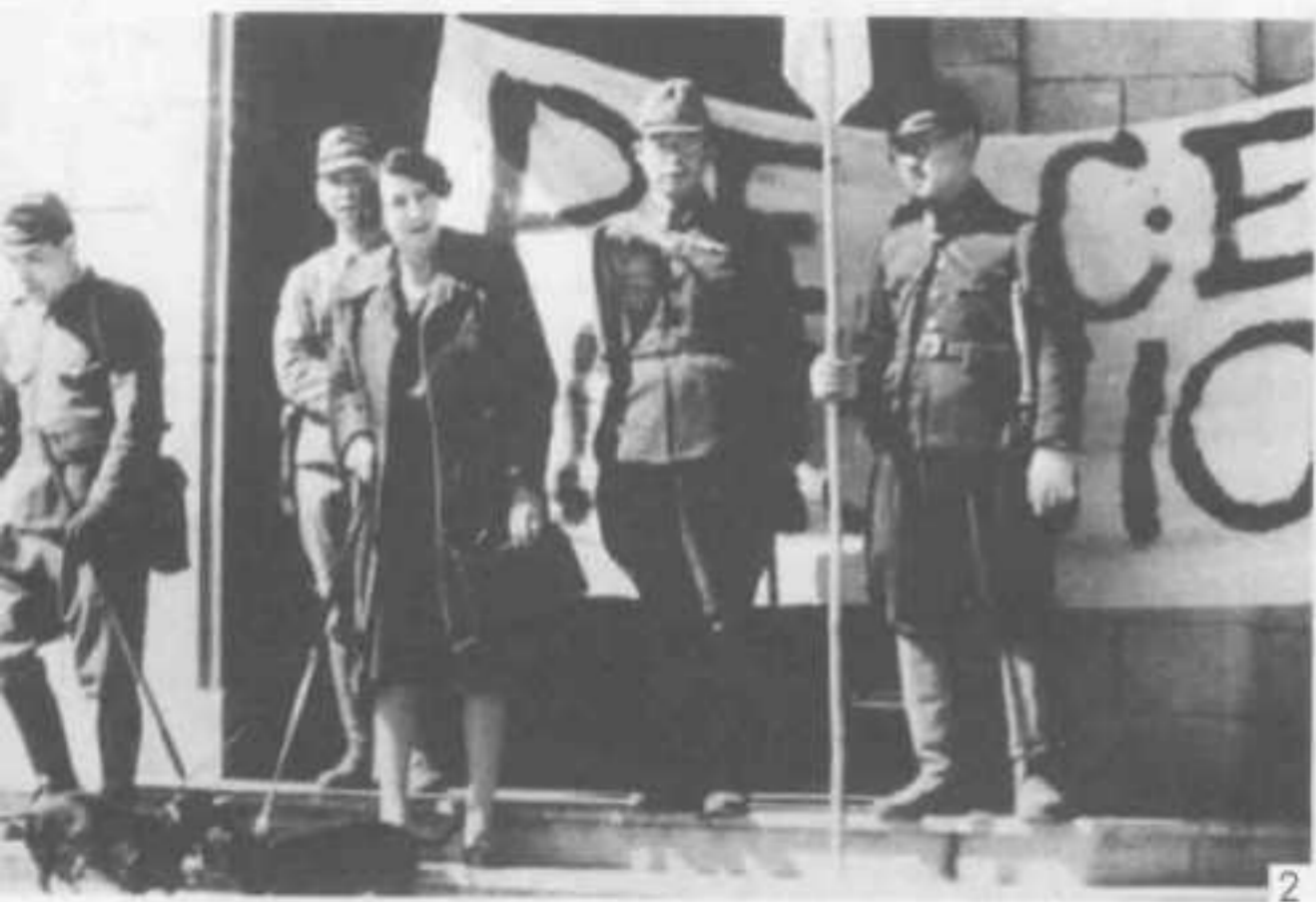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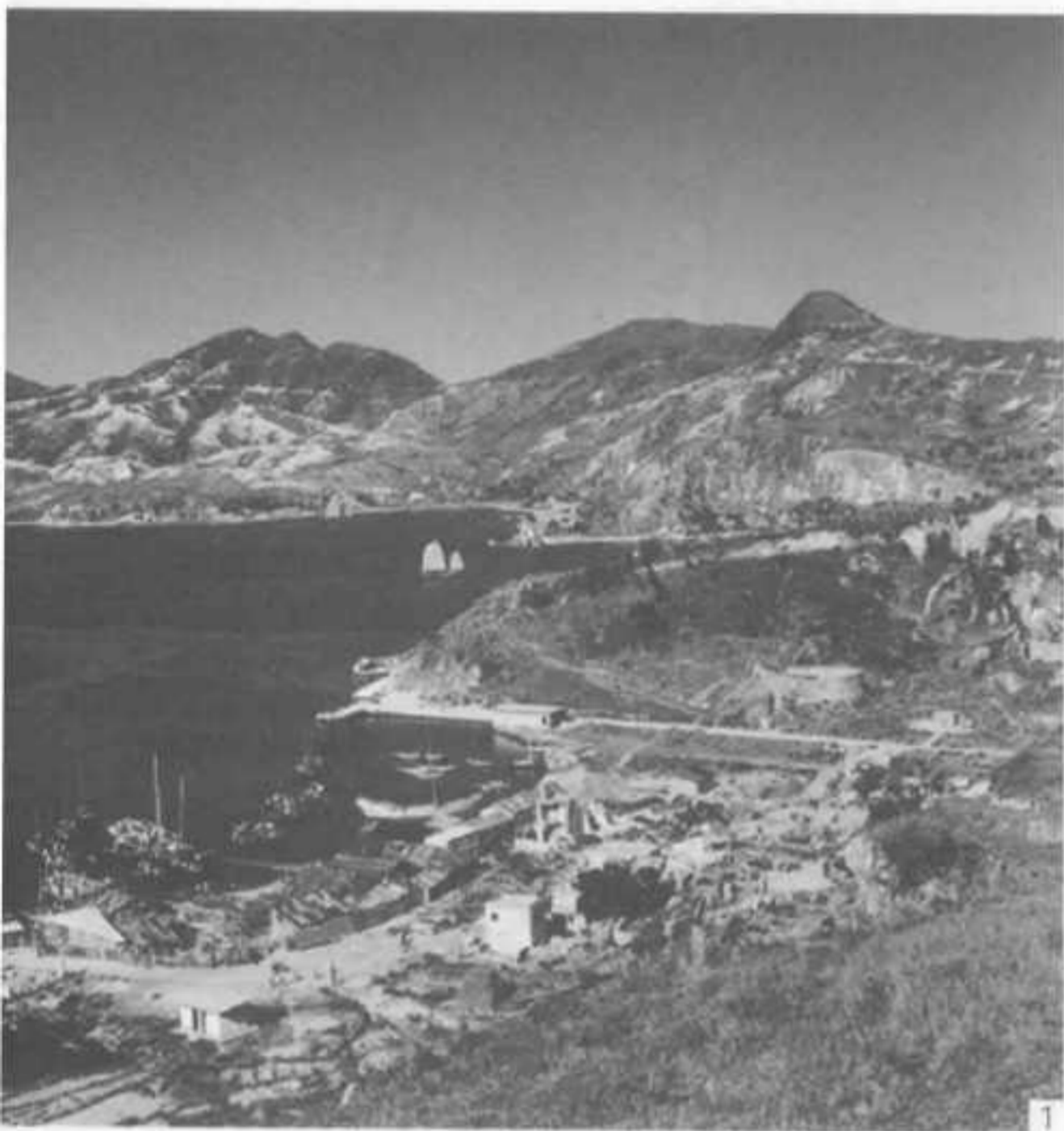
感到香港的沦陷，已属旦夕间事。陆危之域，了无可恋，不如到澳门碰碰运气，于是一口答应下来。

他怀揣着在报警室工作八天领到的10元津贴，跳上了一条前往澳门的小船。当小船摇摇晃晃地离开码头，向着澳门驶去时，何鸿燊回首眺望渐行渐远的港岛，此刻正笼罩在巨大的烟云之下，那里的人还像蚁群一样，忽东忽西地奔走着、哭喊着，躲避着从天而降的炮弹，寻找和抢购着最后的粮食，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苦难日子。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想远走高飞，愿意留在香港继续奋斗的，还是大有人在。曾经做过孙中山秘书的立法委员陈剑如，这时也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炮声一响，他就和陈策一起站出来，号召在港的侨胞协助英军作战。陈策负责军事上的工作，而陈剑如负责民运工作，激励人心，坚守孤岛，维持社会秩序。

不少人响应号召，坚守岗位，但整部机器的运转，已处于半失灵状态。张爱玲在《烬余录》里，以一种冷静得近乎悲凉的笔调，描写她在防空员岗位上的情形：“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颗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华商报》在12月13日停刊了。多份中文报纸都停刊了。有些是因为员工疏散了，有些是报社挨炸了，有些是缺乏纸张，无法开机印刷。那些坚守香港的报人们，想方设法让它们复活。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香港当局未屈服前，我们是决定能尽一分力量，便尽一分力量的，不必有什么人要求。”他去湾仔找梁漱溟商量办报的事，梁漱溟很支持，然后他又去跑马地串联其他报人。大家都很有热心，一呼众应，商议把已



1 / 筲箕湾

2 / 日军以港督私人秘书的夫人为人质向守军招降

停各报的人凑集起来，办一份联合报。大家分头想办法解决办公场地、工人、纸张等问题。但局势变化之快、之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已没有多少时间容他们去想办法了。

12月15日，日军陆军出动了80架次的飞机，对香港仔一带进行了六次空袭，海军也出动了8架次轰炸香港仔。

12月16日，星期二。凌晨。

一小股日军乘坐快艇和摩托艇，从九头码头出发，悄悄地接近港岛东北角，试探性地登陆。被英军发现，用猛烈的火力把他们赶了回去。日军空袭了爱秩序湾南侧的英军阵地。

第二天，两军继续隔海炮战，沿岸浓烟弥漫，大火冲天。萨空了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炮战：“昨夜彻夜炮声震天，听说是日军偷渡未果，今天早9时半起大炮战。今天的炮声比过去近，显然是敌人的炮位已移至九龙，过去炮弹多以山上要塞炮台为目标，今日的炮弹已时时落在民众聚居的区域。这样连续不断的炮声赓持了两小时。到11时半，才逐渐疏落。”

日军派人过海劝降，被杨慕琦总督再次严拒。两度劝降无果，日军决定对港九实行强攻。

12月18日，星期四。

日军从土瓜湾、茶果岭、荃湾、官哈仔等多个地方出发，乘坐木筏、汽艇、橡皮艇等，展开大规模渡海，主攻方向是东

北部的北角。不计其数的炮弹在海上、岸上爆炸，港岛北面的整个海岸线，几乎全部陷于炮火和烟雾之中。尽管英军的探照灯已经被日军破坏，但北角油库中弹起火，熊熊大火把维多利亚港海面映照得通红透亮。皇家海军的炮艇在维多利亚港海面拦截日军，却被密集的炮火打得支离破碎，纷纷沉没。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面上浮满了船只的残骸和油污。



日军沿英皇道进发，背景可见北角油库燃烧时产生的浓烟

日军炮击香港英国皇家海军，图为中弹的北角油库



加拿大军医肯·凯姆本，以无比沉痛的笔触记述：“沿海修建的地堡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迅速崩溃瓦解。从地堡的破裂处和洞孔中可以看出，它们根本没有用钢筋加固，其质量之差是一目了然的。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到晚上10时左右，已有八千多日军在北角、太古、西环、筲箕湾、七姐妹山等处，狂呼着“万岁，万岁”，成功登陆，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

日军炮兵联队在宝马山攻击守军据点，前方为北角发电厂的烟囱





日军装甲车在港岛街道上行驶



12月19日，星期五。

日本帝国大本营海陆军部在早上6时55分宣布：“日本海陆军昨夜10时已在香港东北部三处地方登陆，正向军事地带进攻中。”德国的海通社对日军登陆之战，有详细的报道：

帝国大本营证实日军在香港登陆成功后不久，此间又获悉香港之要点一部分已落入日军之手。星期五清晨日军在香港登陆后，立即占领香港外围之区域，包括设有英军高射炮阵地之维多利亚峰。据另一消息，英军高射炮火虽属猛烈，但日机于星期五继续轰炸香港之军事目标，炸弹落山崖上总督官署及营房之附近，英军司令部及其他重要建筑皆被轰炸。自飞机上俯视，香港街市寂然无人，香港之居民皆已躲入室内。营房及炮台四周之兵士清晰可见。日军之在香港登陆之前，经有12小时之炮轰；日军登陆时，英军以机关枪扫射，俄而展开白刃战。日军步步向前，卒夺



日军在市区推进



香港岛激战

获英军之堡垒。至晚9时50分，日军施放信号，香港登陆之役已告成功。^①

日军的劲悍之师直插向黄泥涌峡，像一把钢刀楔入，从中间把港岛切为两半，令其东西不能相顾，而更让人担心的是，这里是香港最大的水库，一旦落入敌手，淡水供应将会断流。没了淡水，百万港岛居民将成为涸辙之鲋。

但在守军内部，英军与加拿大军团合作，却常龃龉不合，马尔比指责加拿大军团犯下种种失职之咎，严词批评他们在浅水湾不积极抵抗，官兵在阵前喝酒，一名指挥官甚至以醉酒的罪名，被马尔比罢免。在马尔比向上司呈交的报告书中，列举了一大串英勇官兵的名单，竟无一加拿大军人，这令加拿大军团非常不满，认为马尔比心存歧视，报告有失公允。大敌当前，将帅不和，是一大忌，幸得加拿大军团的官兵，忍辱负重，以更顽强、更勇猛的气势，投入战场，以证明自己并不是无能之师。

在保卫黄泥涌峡的战斗中，加拿大军团的指挥官约翰·罗逊（John Lawson）少将和他的参谋团队，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日军展开短兵肉搏，最后全体牺牲。罗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阵亡的最高官阶将领，如今在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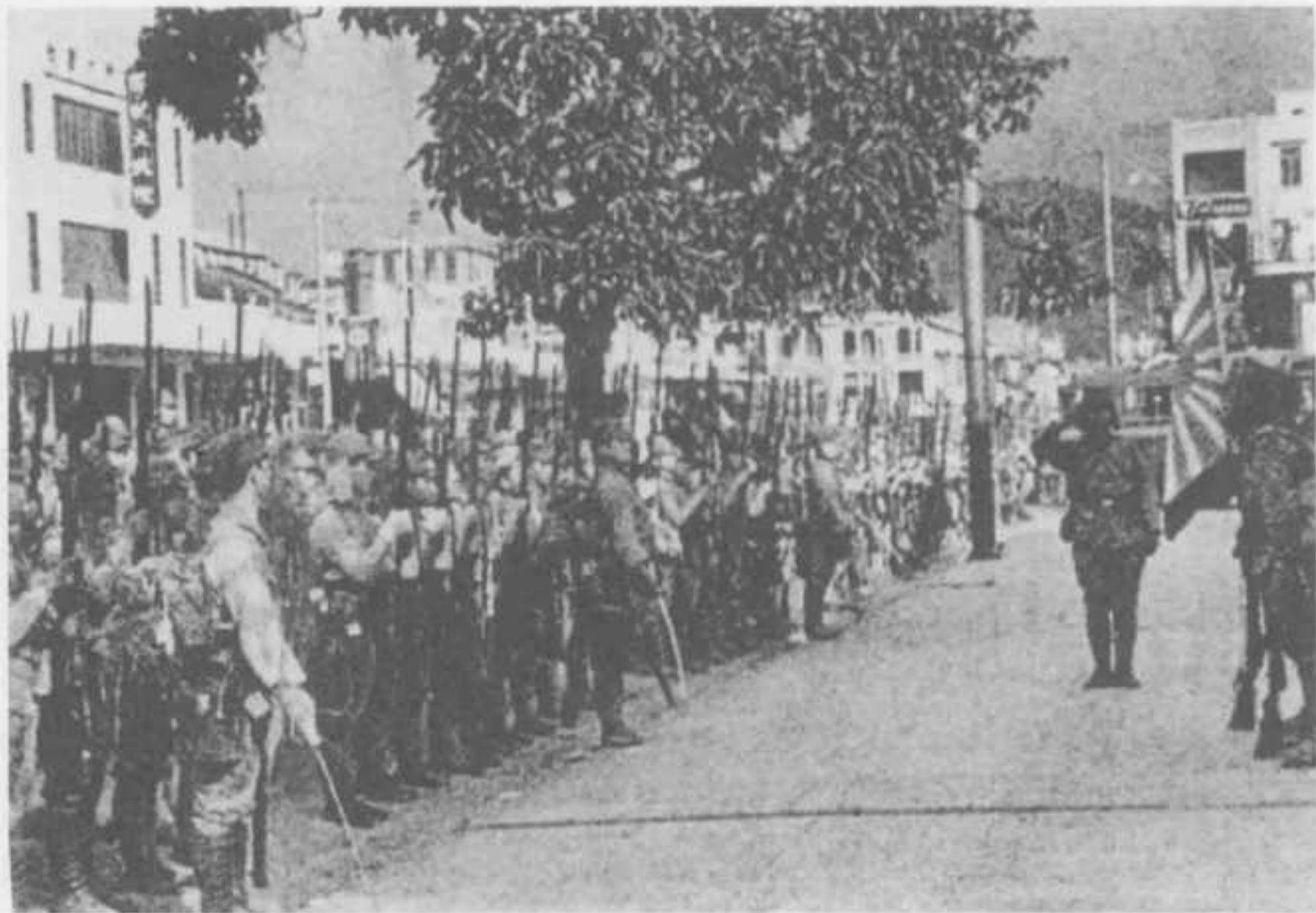
^① 《申报》1941年12月20日。

有一个会议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港岛东边，日军向柏架山发起攻击，遭遇山上的加拿大步兵顽强阻击。在这场香港保卫战中，加拿大军团一共牺牲了290名官兵。

12月20日，苦守阳明山庄一带已11天之久的加拿大军团，在失去总指挥，粮弹告罄的险恶形势下，坚守在碉堡内，寸步不退，决心战至最后一兵一弹。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支日军则扑向金督驰马径，遇到一个排的英军和加拿大小队的顽强阻击，在一片迫击炮、机枪和步枪的喧嚣声中，日军发起一轮轮的猛烈冲锋，守军沉着应战，能多守一分钟算一分钟，直到最后全部变成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员。

由于守军殊死抵抗，日军无法轻而易举地拿下港岛。这天，港府在太古、大坑、赫顿道、香港仔、布力菲尔山和中湾等地，开设了几个疏散营，以供市民避难，营中有粮食供应。许多家庭进入营中暂避，浓黑的烟云盘结在人们的头顶，仿佛笼罩着一片死亡的阴影。营中的老弱妇孺，无不精疲力竭，一个个神色茫然、满心惊恐。

占领香港后日军向军旗敬礼



12月21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在中午时分对外宣布，日军已占领香港，同时亦控制了周围的海面。日海军与陆军密切合作，正扫荡岛中之其余守军堡垒。然而，这时北角和黄泥涌峡，仍陷于激战。在四面八方传来的噩耗声中，港督杨慕琦接到英国驻华使馆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称中国军队最快也要10天后才能到达。换言之，香港是不必指望援军了。

尽管22日这天，中国空军三架轰炸机在六架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了九龙的日军据点，隆隆的爆炸声，为仍然进行着零星抵抗的九龙军民，制造了一点兴奋，但对扭转港岛战场的形势，却毫无裨助。日军从南面向浅水湾和赤柱发起攻击。一波一波的日军从不同地点登岸，投入进攻，战场上这里一群士兵，那里一群士兵，混乱不堪，数以千计的炮弹不断爆炸，滚滚硝烟弥漫整条海岸线。守卫赤柱炮台的东部旅弹尽粮绝，对外联络中断，眼看覆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由英军和加拿大军团驻守的浅水湾酒店，也在中午时分被日军攻陷，45名英军被俘，600名英军和平民被杀。从赤柱到中环市区的唯一通道，被日军切断。同盟社当天有一篇关于战俘的报道：

日军登陆北角





- 1 / 浅水湾酒店
- 2 / 一名英军俘虏被日军搜身
- 3 / 身穿夏装的英军俘虏

日军昨将首批俘虏，自香港护送至九龙，收容于英人学校中。俘虏数全部为七百十二名，内有印度人四百七十一名，英国人、加拿大人、英籍中国人二百四十一名。22日午后，移至九龙病院之孤军营中。俘虏中有香港义勇军少校琼斯顿贝德迈氏，该人为香港怡和轮船公司经理，兼任香港汇丰银行董事，在实业界颇有声望，今次应召任义勇军队长，担任香港电力公司之守卫，系在铜锣湾被俘获者。俘虏之大半，服装不整齐，留有苦战恶斗之痕迹。^①

23日，经过惨烈的攻防争夺战，由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部队把守的黄泥涌峡，最后被日军强攻拿下，维系全港生死安危的黄泥涌水库，卒告易手。守卫水库的义勇军第三连全部阵亡。马尔比率领印军旁遮普营和皇家苏格兰营反击，试图夺回水库，但他们在日军密集的火力压制下，简直寸步难行。尽管直到平安夜，英军的残部仍在死守金马伦山，誓与阵地共存亡，但战局发展到今天，死守一两个孤立的据点，除了具有象征意义之外，对战局的走向，已无多大的实质作用了。

香港开埠以来的第101个平安夜。路透社发表振奋人心的消息：“24日晚为香港历史上最至关重要之圣诞节前夕，际兹佳节，守军作战尤勇，决心不顾一切牺牲，坚守不屈，香港全岛居民即在隆隆炮声中以欢欣而坚定之态度迎此佳节。日军虽已于日前登陆，但岛上防线仍在坚守之中。日军迭次进攻俱经击退，徒受重创而已。英王、英相及英帝国各地不断有电报来港，激励军民之士气，故各界情绪极为高涨，中国国民闻华军已在深圳一带英勇抗战，莫不引以为荣。盖中国已贡献其力量协助保卫此ABCD之前哨。”^②

星期四。圣诞节到来了。清晨，日军释放了两名俘虏，给马尔比将军捎去一封信，日军将停火三小时，让英国人决定是否放弃无用的抵抗。但性格倔强的杨慕琦，在圣诞节告军民书中，仍以坚定的语气，激励“凡英勇作战以保护香港、力斗日军之攻击者，应继续奋勇发扬崇高之精神”，坚决抵抗到底。他寄望于英军可以重夺黄泥涌水库。

① 《申报》1941年12月24日。

② 《申报》1941年12月26日。“ABCD”指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与荷兰（Dutch）四国。二战时由此四国在东亚形成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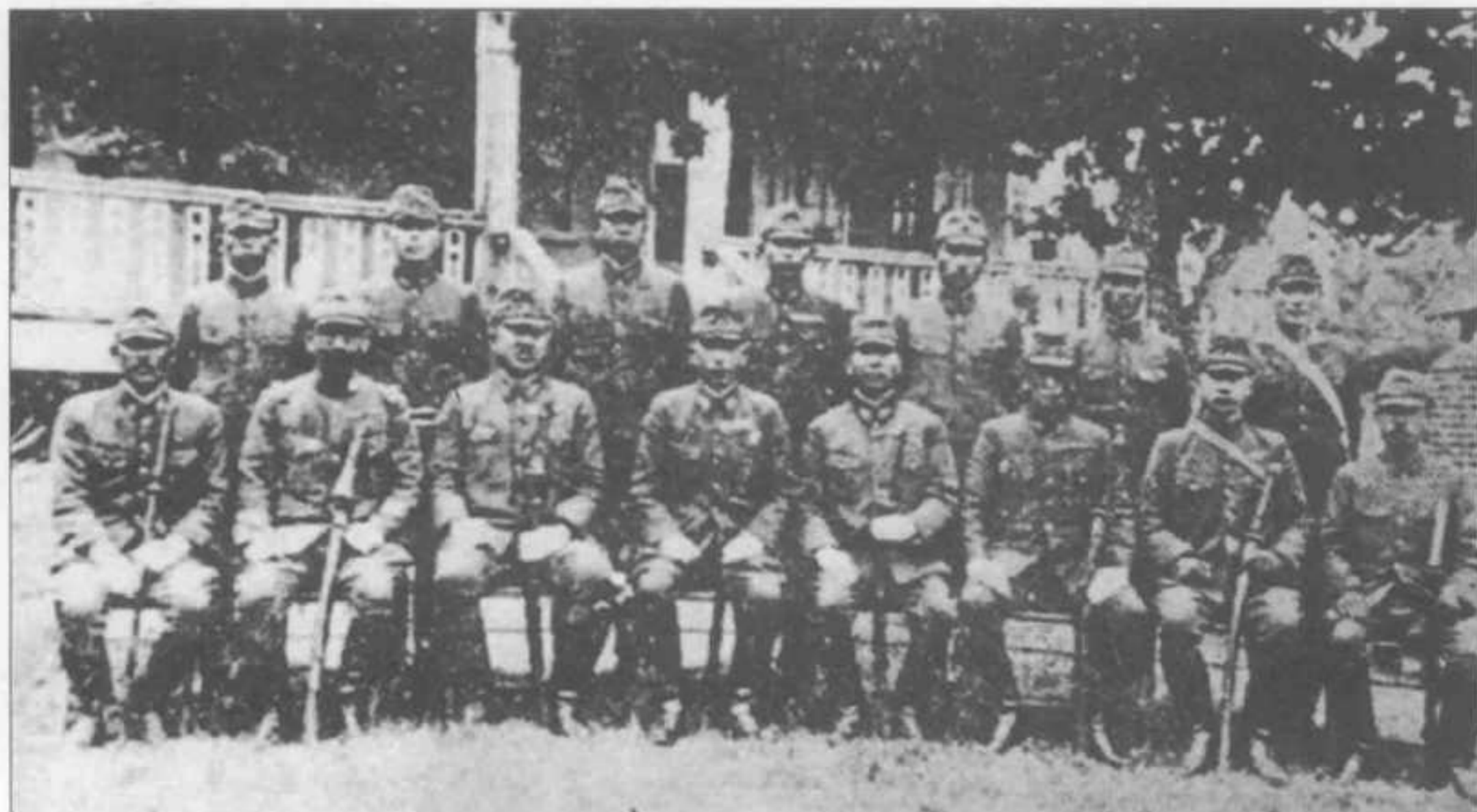
中午，日军攻占巴厘士山，英军在湾仔街市、柯布连道、湾仔峡、马己仙峡等地节节抵抗，有些地方爆发了残酷的巷战。日军飞机和炮兵，用最密集的炸弹，对仓库山峡、湾仔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等处的英军阵地，进行无间歇的狂轰滥炸，几乎把每一寸土地都翻了一遍，尘烟如同黏稠的泥浆一般在天空翻滚搅动。

守军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抵抗，直到力殫弹竭。下午3时，寿臣山英军首先打出了投降的白旗。3时15分，黄泥涌的枪声也停止了，宣告马尔比的反攻失败，日军已牢牢控制住了水库。港岛淡



日军攻取黄泥涌高射炮阵地（绘画）

攻占香港的日军第一炮兵队高级军官于深圳留影



水水源，遂告断绝。加拿大榴弹兵营阵地亦告失守。不少英军军官命令华人士兵换上平民服装离开，以免做日军的战俘。

战争开始后，位于赤柱的圣士提反书院大楼被改作战地医院。这天，150名日军闯进医院，把当时在里面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伤兵和部分医护人员、书院职员杀死，剩余的伤兵和护士，分别被囚在两个房间。有人亲眼看见日军军官用刀把两名加拿大人劈开，护士则被日军轮奸。

杨慕琦总督面临的问题是：水库已经丢失，城区水源存量只够一天之用，存粮也已见底；煤气、电力都告中断；市区内大量的尸体、垃圾未及处理，开始有疫病流行。英军在南朗山的最后一个弹药库业已失守，弹尽援绝，再无继续抵抗的本钱。在大势已去、百般无奈的情形之下，杨慕琦只得下达向日军投降的命令。

下午5时许，杨慕琦通知日军司令部投降。随后，率领一众殖民地官员，渡海前往九龙半岛酒店。晚上7时，杨慕琦在酒店336房日军总司令部的摇曳烛光下，屈辱地签署了降书。酒井隆随即暂代香

英军投降（绘画）





从太古船坞登上港岛的日军司令酒井隆（左），其旁为海军司令新见政一

港总督职务，直到矶谷廉介接任为止。解除武装的英军，被押到九龙钦州街的集中营和九龙仔喇沙集中营，港督杨慕琦和其他高级官员，则被关进赤柱集中营。

晚上9时45分，日本海陆军联合发表文告，宣布香港的投降。略谓：困守香港之敌军，不复能抵抗日军之继续袭击，已于1941年12月25日下午5时50分投降日军，并于晚上7时30分下令停战。

英军司令与日军在半岛酒店谈判有关投降事宜



港督杨慕琦于半岛酒店内签署降书



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时此分开始计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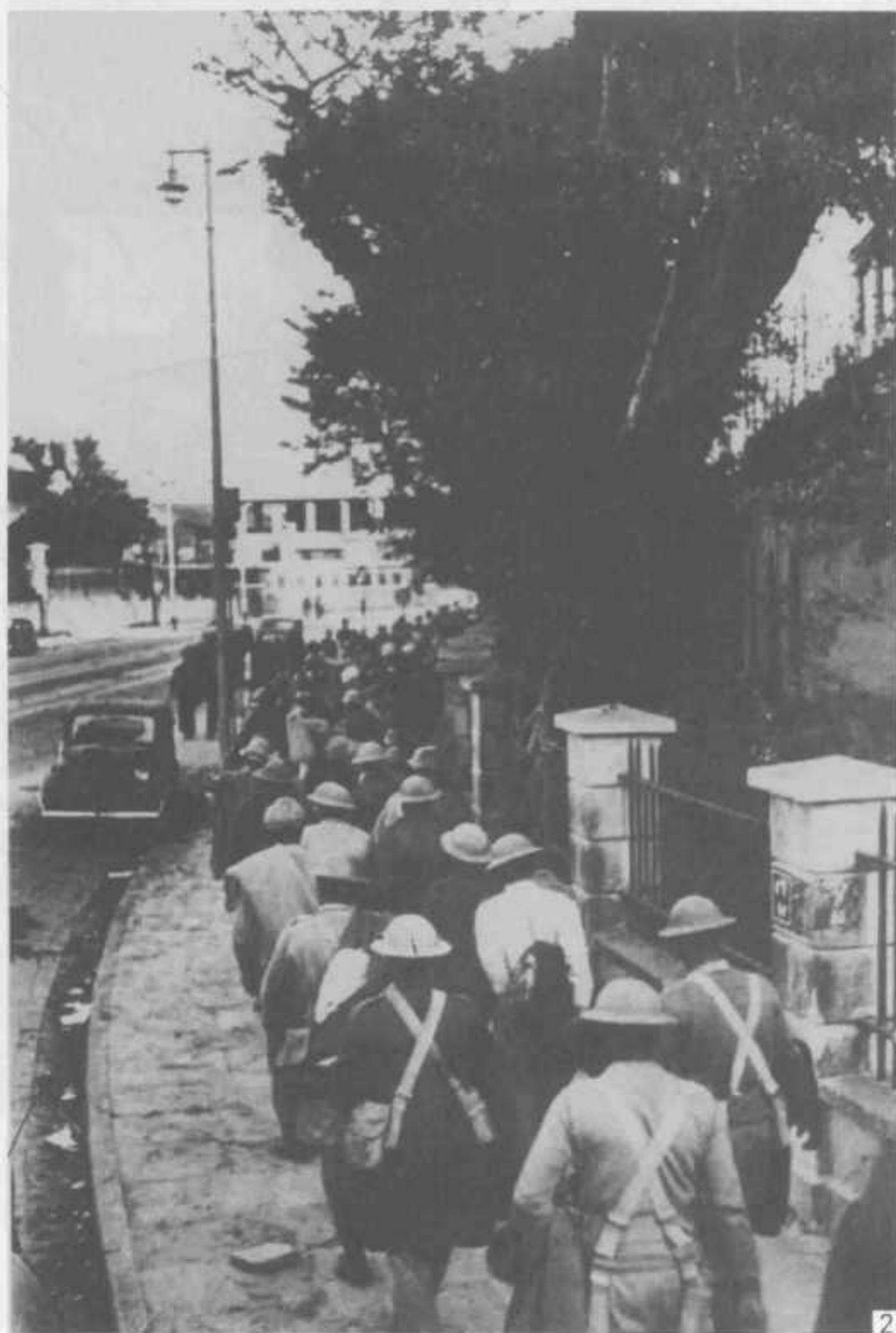
日本国内举国狂欢，所有电台都中断正常节目，宣布攻克香港的捷报，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播放军歌。但在香港，却陷于一片悲愤低凝的气氛之中。赤柱的英军一度不相信投降令，继续抵抗日军，直到12月26日确认投降令后，才放下武器，步出他们的阵地，向日军投降。

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历时18天，盟军（包括英军、印军、加拿大军和义勇军）2113人阵亡，2300人负伤，8500人被俘。日军706人阵亡，1534人负伤。平民伤亡，难以统计。海通社的一篇报道写道：

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之第十八日，日军占领香港。该岛之失陷，英国不但丧失其在中国领土最后之根据地，抑且丧失帝国最重要之贸易中心。1841年1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将香港割让英国，并由1842年8月之南京条约证实之。第二次鸦片战后，九龙半岛复被迫让与英国，1898年英获得租借深圳河以北，及香港周围各岛之九十九年租借权。香港现有居民约一百万人，设防坚固，与新加坡、达尔文港，互成三角防御中心。香港为英在华舰队大本营。香港不但为军事重地、海军头等军港，亦为世界贸易中心，1937年之贸易达五千万英镑。该岛位于珠江口，控制南华之全部商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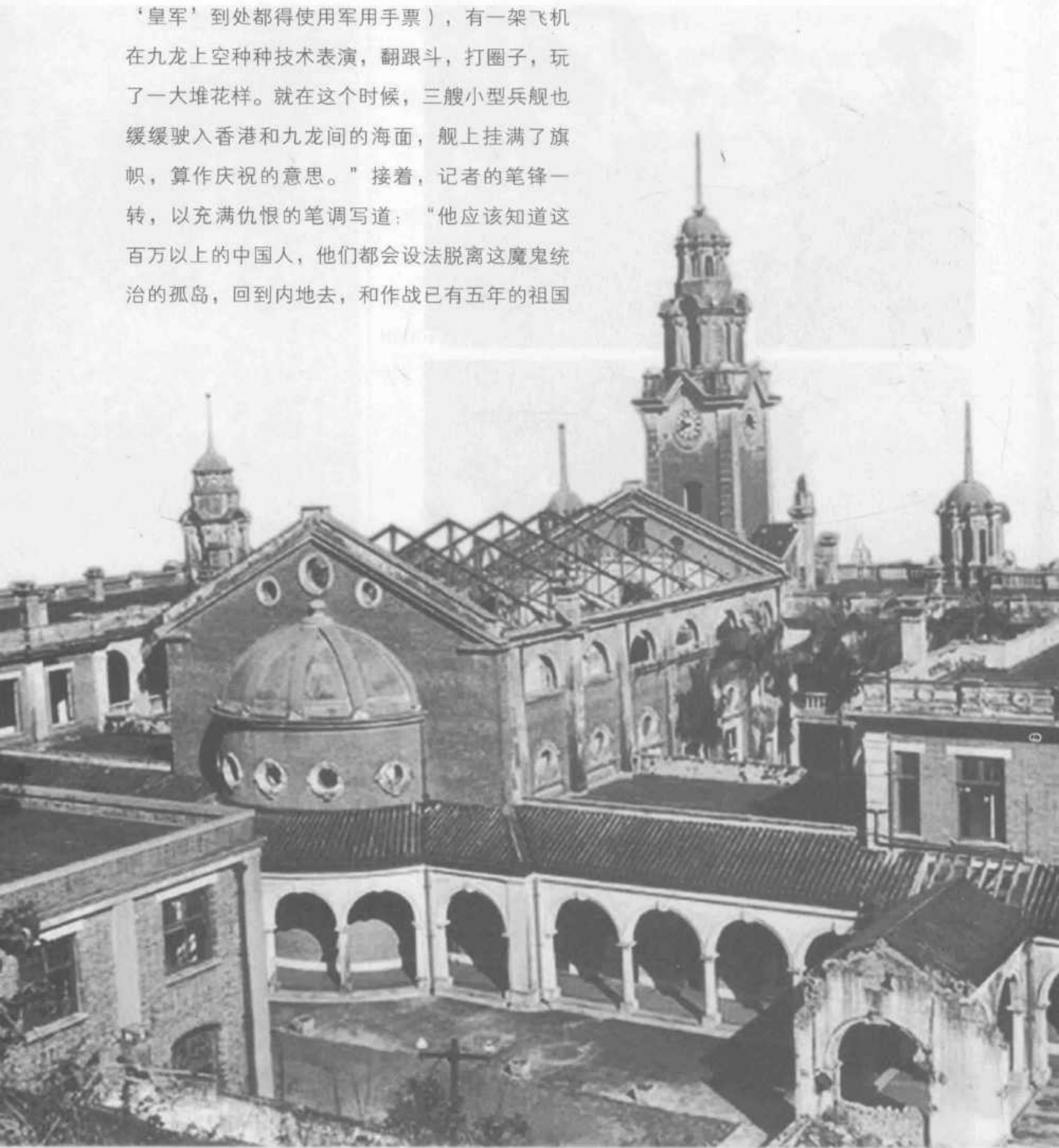
12月28日，日军举行了入城式。从跑马地到上环的马路两边，聚集着一群群被驱赶来“欢迎”皇军的市民和主动前来献媚的“胜利友”。记者唐海描述这个场面：“队伍排列过无数条马路，包括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一起，受指挥官的检阅；军乐队的喇叭吹得特别的响，铜鼓也敲得特别的有劲。头上，三四十架飞机，排成队形，在低空飞过，丢下了大批传单（那还是说明

^① 《申报》1941年12月27日。



1 / 英军和加军俘虏
2 / 1942年年初，经过美利军营（金钟道）的英军俘虏

‘皇军’到处都得使用军用手票)，有一架飞机在九龙上空种种技术表演，翻跟斗，打圈子，玩了一大堆花样。就在这个时候，三艘小型兵舰也缓缓驶入香港和九龙间的海面，舰上挂满了旗帜，算作庆祝的意思。”接着，记者的笔锋一转，以充满仇恨的笔调写道：“他应该知道这百万以上的中国人，他们都会设法脱离这魔鬼统治的孤岛，回到内地去，和作战已有五年的祖国



香港大学主礼堂在战火中损毁



被炸成废墟的街道

兄弟，一齐向着今天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敌人作一个致命的攻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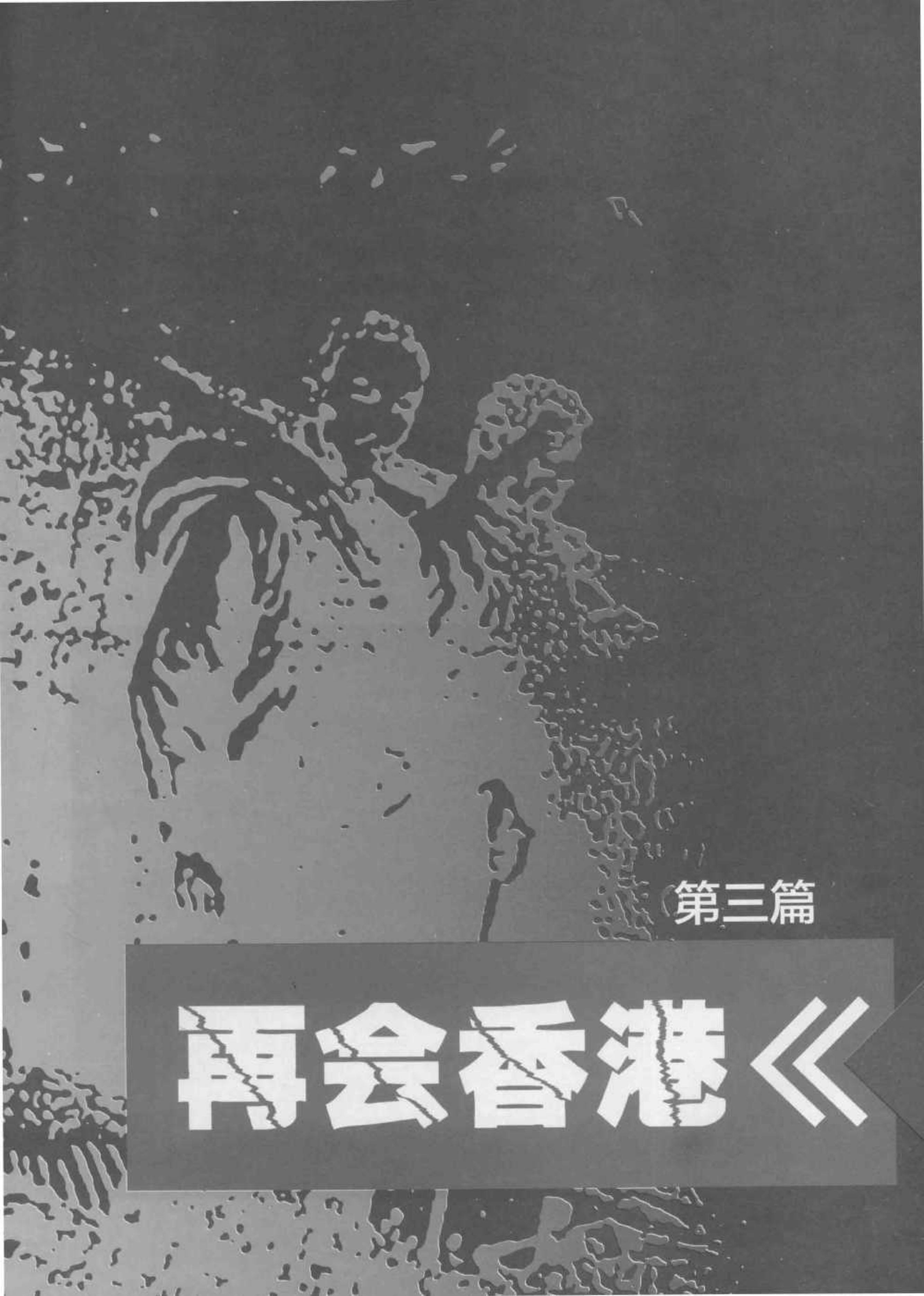
日本人宣称他们把亚洲人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然而，欢迎仪式刚刚结束，挨家挨户的搜查和抢掠行动，就全面铺开了。有中国漫画奠基人之称的叶浅予，画了一幅题为“快逃出香港”的漫画，文字说明是：“日本军队的暴行连母猪和猪崽都难以忍受，他们不得不逃出香港。”华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香港已变成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死市，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人是不能作为一个奴隶而苟且偷生的，于是，千万中国侨民都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活了。”^②

① 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上海，上海新新书局，1946年版。

② 华嘉：《香港之战》，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

世界 生命 呼吸 生态





第三篇

再会香港《《

号称可以固守一年以上的香港，仅18天就陷落了。许多人猝不及防，最初人们以为日军一定是从海上入侵，一旦香港沦陷，可以撤回九龙；九龙陷落，可以撤回内地，没想到日军从陆路杀来，先攻下九龙，把通往内地的交通完全切断。大批内地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全陷在孤岛上了。

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足以牵动社会视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走向。即使日军在占领香港后，也把搜寻这些人物，利用他们来组建傀儡政府，实行“以华制华”，列为首要之务。

被困在孤岛的人，急着想逃出魔掌。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就听过思烟台上介子推抱树而死；首阳山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入了学堂，就要学会背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

香港仔



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的《正气歌》。他们不求扬名后世，但求对得起祖宗。

对中国内地的抗日力量来说，把这些人迅速救出来，为国家保存精华，以免被敌人利用，也就成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投奔怒海

杨慕琦在下达投降命令之前，曾与当时在亚细亚行的陈策通过电话，把决定通报给他，陈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向日本鬼投降！本人决计突围，贵方如有人愿意相从，请即到亚细亚行来！”

杨慕琦闻言，感喟不已。他和马比尔由于身份原因，是不会撤离的，必须留下完成投降手续。但他同意其他英军高级军官，如果愿意，可以追随陈策突围。最后，有75名不愿做日军战俘的英军军官和情报官员，集合到独腿将军陈策的身边。

陈策（中）

独腿将军陈策



陈策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国海军军服，嘴里咬着一根雪茄，镇静如常，自有一种军人献身沙场的雍容气度。他的这种神态，感染了所有追随他的英军人员。在他们前去香港仔途中，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情，当他们的车队沿着布满弹坑的公路，颠颠簸簸地朝码头开去时，遇上了日军的一支巡逻队。英军人员吓得毛发倒竖。这时，被陈策安排坐在第一辆车上的副官徐亨，从容站起来，用日语对日军扬手高喊：“万岁！”日军以为他们是己方的谍报队，也报以“万岁！万岁”的欢呼，让他们的车队顺利通过。

徐亨亦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毕业于黄埔海军学校航海科，加入中国海军，追随陈策在虎门、香港工作，担任过永宁舰舰长。他不仅是海军精英，而且是一位运动健将，在1934年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他是中国足球、排球队的“双料队员”，后来又在香港水球队当过前锋，有“水球准星”的美誉。在各类国际体育赛事中，徐亨共荣获八枚金牌。香港沦陷前，他以海军少校的官衔，在陈策将军身边担任副官。因为他曾驻日本，熟习日语和日军的习惯，所以能够从容应付。

下午4时许，车队到达香港仔码头，当时码头还在英军手里，他们并不知道港督已决定投降。为了避开日军攻击，五艘鱼雷艇已驶往鸭脷洲隐蔽，现在码头只剩下一艘炮艇和一艘汽艇。陈策觉得让鱼雷艇来接运，目标太大，风险过高，于是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乘炮艇和汽艇，赶去鸭脷洲和鱼雷艇会合。

他们的船刚驶出海面就被日军发现了，密集的子弹向他们的船倾泼而来。这两艘船都是没有武装的，在宽阔的海面上，成了挨打的活靶子。詹菊似，陈策、徐亨在海军的战友、曾任国民革命军广东海军司令部秘书长，香港沦陷时，也被困在了孤岛，直到1942年1月才冒险步行从香港逃回韶关。其哲嗣詹德能在《广州文史》上，曾发表一篇记述陈策突围经过的文章《陈策和徐亨香港突围记》，他写道：

一天天气晴朗，海面一览无遗。船驶离香港仔不及半里，便被浅水湾西角上的日军发觉，首以机枪密集扫射，快艇四周，弹如雨下，浪花飞溅。看来早先驶离的几艘快艇，早已引起日军警觉。紧接着几门小钢炮加入轰击，任驾驶的英国海军人员，尚能从容镇定，操艇机智灵敏，使快



突围团队的小艇曾在香港仔海面被日军炮火击中，图中数人均均为幸存者（前排左三为陈策）。

艇冲过弹雨再向前疾驶一段路程。不幸舵手中弹身亡，艇长及两个水兵也受伤倒在船舱。同时，麦道高背部受伤，陈策头上钢盔“当！”的一声，把子弹挡飞。船舱中弹损坏，快艇只能海面不停转旋，成为岸上日军枪炮的死靶。接着快艇主机亦中弹损毁，艇上顿时一片混乱，陈策临危不惧，大声喝令“弃船”！命令艇上人员跳水向鸭脷洲洒去登滩集合，众人纷纷散开跳水。陈策在徐亨的帮助下脱去鞋袜外衣裤，卸下他早先截去左腿后装上的假肢，连同贮在假肢中的4万港币也一并弃去，并吩咐徐协助自己把手枪和护照系在身上。在徐的扶持下，正欲登梯出舱下水时，一个胖胖的英军官，突抢步登梯，一阵机枪扫来，那英军官当即倒地身亡。陈策亦同时被子弹射穿左手腕，徐不顾一切地用手帕为陈策裹伤口，鲜血仍涔涔渗出。^①

^① 詹德能：《陈策和徐亨香港突围记》，载《广州文史》第四十五辑。



副官杨全因不习水性，不敢下海，劝陈策折返香港，陈策厉声说：“返香港就是投降，你知道吗？我们是有进无退，义无反顾！”他把全船唯一的一个救生圈塞给杨全，命令他随自己泅到鸭脷洲。在场的人无不惊讶，陈策自己只有一条腿，手腕还受了伤，不仅不要救生衣，还要别人跟着他泅到鸭脷洲，真是越危险越镇静，益显大将风度。

在徐亨的协助下，陈策率领众人奋力游到岸边。在鸭脷洲分别登上了隶属皇家海军中国派遣舰队第二鱼雷中队的五艘鱼雷艇，乘风破浪，直插南澳附近的东平洲岛，准备突破日军的封锁，返回内地。

当鱼雷艇乘夜驶近东平洲时，一艘日军的驱逐舰，忽然出现在前方，而且已经发现了他们。当时五艘艇只有三枚鱼雷，根本不足以对抗。大家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因失血过多，正躺在舱里休息的陈策，喝令五艘鱼雷艇一字排开，开足马力朝日舰冲去。日

鸭脷洲，陈策突围之处

舰见五艘鱼雷艇快速逼近，以为它们要发射鱼雷，匆匆掉头远遁。这一场虚张声势的“空艇计”，竟然侥幸成功，大家惊出一额冷汗。

陈策等人在南澳登陆后，得到村民的热心帮助，昼伏夜行，避开日军耳目，经过五天跋山涉水，终于抵达日军尚未占领的惠州。陈策率领72名中英官兵，从香港浴血突围成功，轰动了全世界，英国报纸把陈策誉为“东方纳尔逊”（英国帆船时代的独臂海军将领）。英国政府以英皇名义特颁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K.B.E.），颁予徐亨“大英帝国荣誉军官勋衔”最高勋章（O.B.E.）。中国政府晋升徐亨为海军中校，调海军总部任参谋。英国政府还在英伦制义肢的工厂挑选一名最优技师来中国为陈策度量残足的尺寸，回伦敦制造一只假腿赠给陈策。

香港投降后，原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战时担任驻港英军陆军野战救护队总指挥

陳中委策將軍率領香港陸海空軍官兵由港突圍抵達惠州留影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廿九日
29TH DEC. 1941

ADMIRAL CHEN CHAK WITH BRITISH OFFICERS AND MEN WHOM HIS EXCELLENCY LED THROUGH THE JAPANESE LINES AFTER THE FALL OF HONG KONG AND ARRIVED SAFELY AT WAICHOV



陈策将军率领香港陆海空官兵由港突围后抵达惠州留影

的林赛·赖特（L.T.Ride）上校，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深水埗战俘营。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将非常悲惨，不甘心忍受日本人的凌辱，于是，和另外两名英国军官——一名海军上尉和一名海军中尉，就在日军的刺刀底下，开始密谋出逃。

初期的战俘营看守并不太严密，给了赖特出逃的机会。1942年1月9日晚上，赖特和他的两个同伴——香港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香港大学工程学讲师摩利（D. W. Morley）和物理学讲师戴维斯（D. F. Davies），在浓厚的夜色掩护下，溜到了海边。海面漆黑如墨，只听见隆隆的涛声。他划了根火柴，用手遮了三次，这是约定的暗号，他的秘书李耀标已先行逃出战俘营，负责接应他们。不一会儿，黑沉沉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小船，驶到防波堤时搁浅了。李耀标从船上跳下来，向他们打了个手势：“快，快上船。”

赖特一声不吭地爬上了船，那两名海军上尉和中尉，也跟着爬上船。但是，船却一动不动，李耀标和船夫拼命把小船推回海中。船底和防波堤摩擦，发出“嘎嘎”巨响。后来，赖特的哲嗣在记述父亲此次逃亡的文章中形容：“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种摩擦声响似乎震耳欲聋，人们紧张得好像空气都凝固了。”^①这种惊

① [英]爱德文·赖特：《逃向自由中国》，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

悚之感，是不难想象的。船终于浮起来了，船夫小心翼翼地划动船桨，沿着防波堤悄悄转向北方。赖特看看手表：晚上9时10分。逃亡才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

这四名逃亡者在青山道附近上了岸。当他们的脚踏在沙滩上，发出轻微的声响时，也觉得惊心动魄，听起来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巨兽在走路似的。不远处有一名日本哨兵，大家像蛇一般伏地而行，爬过马路。

他们翻过一个山坡，一条坦荡荡的大道出现在眼前。赖特搜索了四周一番，没有发现日军。四个人迅速穿过寂静的大路，赖特走在最后，他听见有汽车的声音，赶紧窜下路基，趴到一个弹坑中。一辆载着十几名日军的汽车开了过来，手电筒的光柱在逃亡者的头上扫来扫去，日本兵“哇啦哇啦”的说话声近在咫尺。有那么一瞬间，赖特以为日军已经发现他们了，但引擎声终于渐渐远去。赖特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呼吸。

他们重新上路，跌跌撞撞地爬上山顶，前面是一大片黑暗无边的灌木丛和茅

战时日军的赤柱拘留营





一名日军在太平山站岗

草，后面是从远处的深水埗集中营发出的点点灯火。天亮之前，逃亡者们来到一个叫水泉澳的地方，吃了些巧克力和点心，稍事休息，恢复体力。雾愈来愈浓了，四周都沉没在一片白茫茫之中。他们继续摸索前进，可是很快就迷路了。在山上一直转到下午，仍然找不到出路。小赖特的文章这样记述：“1月11日凌晨3时，浓雾渐消，月露云端。赖特发现大家已经来到一条小河边。于是涉水过河，沿着小路爬上陡峭的山冈，而雾气又浓厚起来，于是只好停下来等天明。夜雾时浓时淡，山下的小河和远处摇曳的灯火也就时隐时现。此时此刻，只有天晓得他们身在何方！”

由于担心遇到日军，赖特只好耐着性子，等雾散了再走。不料浓雾经久不散，最后变成了瓢泼大雨。寒风愈刮愈紧，一连几天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转来转去，愈转愈搞不清东南西北。赖特的膝盖也摔伤了，行动十分困难，他们时而连水也喝不上，时而又要夹在乡民中仓皇逃避日伪军的搜捕，大家都精疲力竭了。然而，就在他们快要感到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已经知道他们逃了出来，正四处寻找他们。赖特不禁惊喜万分，仿佛在漆黑的隧道里，终于看见另一头透进来的光芒。

李耀标很快和这支游击队接上了头，晚上，带着他们下山，在一所乡村学

校里，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短枪队的蔡国梁队长见面。这支短枪队由虎门队和惠阳短枪队的精干分子组成，尾随日军之后，越过深圳河，在西贡、启德机场附近活动，逐渐延伸到狮子岭、慈云山、牛池湾一带。赖特后来感慨地写道：“脱离险境，奔向自由，在此一举，万万不可功亏一篑。仅仅是这个念头才使我坚持走下去。”

在短枪队的热情招待下，几个逃亡者饱饱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几个星期来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顿时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经历了将近十个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日夜，逃亡者们终于来到了大后方——自由中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地逃离魔窟，重新获得继续战斗和生存的权力”。

赖特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从这一刻起，已不再属于他个人的了，把战俘营的同胞救出来，是上天给他的责任。只要他活着一天，就要履行这个职责一天。在回到大后方后，赖特向英国国防部建议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团体。经批准，于1942年7月在惠州成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在东江游击队协助下，负责营救被俘英军。

港九独立大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营救了大批国际友人及盟军飞行员。图为1943年12月，港九独立大队成员和英军服务团成员营救美军飞行员后的合影





陈济棠

陈济棠与莫秀英夫妇



香港沦陷时，一大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被困在孤岛，除了海军少将陈策之外，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和前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都因启德机场突然被炸毁，水陆交通完全断绝，无法撤离而身陷险境。在中环一间小铺子里，还躲着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六年前在广东叱咤风云，有“南粤王”之称的陈济棠，尽管目前在政治上已经失势，但仍然保留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林部长的衔头。因为陪夫人莫秀英到香港治病，但香港保卫战骤然爆发，他来不及撤退，便身陷战区了。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夫人在病榻之上也劝他：“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陈济棠乃决意逃出香港。他在自传中写道：“余已决定于12月14日返渝，不料，日军于8日即进攻香港。余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因此，即电请中央，派机来接。已蒙中央复电派机，但因九龙机场已失守，飞机无法着陆。且当日军进入九龙攻至铜锣环（湾）时，情势已急迫万分，不得已用化装离家，遂与中央失去联络，余遂决意冒险逃出香港。”^①

陈济棠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给亲信江茂森，他安慰夫人：“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经与朋友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先躲在云咸街华侨中学，准备在“停战三天”期间，伺机出逃。那几天，他靠吃饼干、水果度日，后来找不到机会，又转移到朋友在中环开的铺子里。他不敢外出，每天睡在冰冷的床板上，缺少被褥，以致腰部受寒，剧痛不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① 《陈济棠自传稿》，载《传记文学》1974年9月第148期。

该号伙计，多日出夜归。至夜间，余恒询其日中所见所闻之事。具知日寇在港，每日不是残杀同胞，更是强奸妇女。若一一记之，诚恐罄竹难尽，兹略记一事，亦足以概其余矣。有某卖米店，店外以长绳拦阻行人，而有证购米者方许入绳内待购，有一少妇，携一年约三龄之小孩，越绳而入，日兵见之，乃即捕之，褫其衣。妇以为日兵之所欲者，在取其衣耳，欲行又不许，复褫其裳。妇拒之，日兵亲自强褫，致全身赤然露众目，妇羞极而泣，孩亦大啼，且时严寒战栗，抱孩遁入附近一店中，幸店主怜其遇，取旧衣裳与之。倭寇虽日日以中日日亲善欺人，但其所为，已令人痛恨入骨髓，永永不忘，行见其心劳日日绌，惨受苦报之补也。^①

更令他不安的是，日本人正在十万火急地找他，希望他出来组织维持政府。外间谣诼纷繁，有人说他被日本人抓了，有人说他已经去南京了，也有人说他在广州发表电台演讲了。这天，忽然有两个人摸上门来，劝陈济棠不要离开香港。陈济棠凛然回答：“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更不能作投机之想。我是三民主义信徒，岂能考虑个人利害？”

两人走后，陈济棠深感危机紧迫，无论如何要马上逃离香港。他连夜再转移到一家粥店隐藏，托朋友买了几钱鸦片，藏在身边。“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孟子不云乎！”他对朋友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今日余所处境遇，则其言不啻为余说法矣。”

替陈济棠安排出逃的盐商林绍荣，以前与陈济棠并不相识，只是受朋友之托，但对这件事却甘冒风险，不遗余力，令陈济棠大受感动。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商量出逃计划，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陈济棠不愿再等下去了，他准备冒险直接偷渡过九龙。林绍荣认为，以陈济棠的身份，偷渡九龙太过危险，日本人封锁极严，一看见偷渡的人就开枪。他建议，不如由西环坐小船先到大澳，再从大澳找船回内地。

^① 陈济棠：《香港脱险记》，载《传记文学》1969年3月第82期。

从陈济棠目前藏身的粥店步行到西环，有七公里左右的路程，坐小船到大澳则要六七个小时，以陈济棠的身体状况来说，这无疑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途。1月11日，清晨4时30分。林绍荣带着陈济棠离开粥店，向西环出发。陈济棠化装成林绍荣的随从。寒冬的黎明，天色晦暗，北风砭骨。陈济棠吃惊地发现，大街上竟到处人潮涌动，男女老幼，摩肩接踵，在寒风中瑟瑟鹄立，人龙蜿蜒数里，都是在排队买米，他们排一个通宵，也只能限买四两四钱米。沦陷后香港居民生活的惨况，可见一斑。

步行两个小时，来到西环。日军在码头设了岗哨，检查过往行人。哨兵打手势要他们过去，接受检查。那个哨兵模样如同大学生，年轻单纯，却千里迢迢跑来中国杀人，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哨兵认真搜了陈济棠的身，只搜出一小包鸦片，挥挥手让他过去了。林绍荣也通过了哨卡。

他们匆匆上了船，船夫拉足风帆，朝大澳急驶而去。在中途又被日军巡逻艇截停搜查一次，复遇海盗，但总算逢凶化吉，平安抵达大澳。陈济棠在林绍荣的盐公司里做了六天厨子，每天除了做饭炒菜，就是在室内环绕行走几千步，锻炼筋骨，等待出逃机会。

1月17日，机会来了，有三条船要去中山，林绍荣和船主说好了，他们跟船走。他们来到码头时，发觉船上有一对夫妇，还带着个初生婴儿。林绍荣觉得出门遇见产妇，倒霉透顶，一定要赶这对夫妇下船。陈济棠说：“都是逃难的同胞，能带上就带上吧！”

下午3时，三条船准备启航。日军上船进行例行检查。另外两条船既没有违禁品，也没有女眷，很快就放行了，陈济棠这条船上，因为有女人，被日军盯上了，非要扣留一个晚上不可，否则永远不准离开大澳。林绍荣只好硬着头皮和日本兵理论，这个女人生孩子才12天，污血未清，你们留下她也没用，“留之无异获石田，慎勿作耕耘想”。也许是婴儿的啼哭声令日本兵觉得扫兴，他们终于离开了船舱。

这时离前面那两条船的出港，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在强盛的西北风吹袭下，海浪汹涌澎湃，陈济棠呕得一塌糊涂。然而，船刚出口，风向就突然转了，东南风大作，就好像孔明借东风似的，隆冬季节居然刮起东南风！真是天意从来高难问。

由于一路顺风，当天深夜12时，陈济棠已到达中山民众埠了。这里是沦陷

区，他仍不敢露面，林绍荣为他找向导，准备从水路去广西。陈济棠躲藏了四天，他听到一个惊人消息，比他们先离开大澳的那两条船，在海上遇见海盗，被洗劫一空，两条船都未能驶抵中山，乘客大概都是凶多吉少了。陈济棠震撼之余，不禁感叹“一念之善，竟免于大祸，岂冥冥中，固有主宰耶”？

1月21日，林绍荣终于找到一条小船，带他们经顺德大良、新会猪头山，前去塘下，然后从塘下经鹤山、高明、白土，搭肇梧轮赴梧州。在途中，他分别致电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报告脱险经过。历时十几天的颠危之旅，总算告一段落。当陈济棠抵达重庆时，已经百病缠身，他在歌乐山斋写了一篇《香港脱险记》，记录着这十几天的所经所历。



日军在街道巡逻

胜利大营救

英军投降了。香港沦陷了。何香凝从罗便臣道住宅的窗口往外望，铜锣湾的油塔大火已经熄灭，昼夜不断的炮击也停止了。日军进攻九龙时，何香凝和儿媳妇抱着孙子，连鞋袜也没穿，便匆匆到了香港，住进淞沪抗日英雄蔡廷锴将军在罗便臣道的寓所，蔡廷锴一家已经撤离了。画家、粤剧撰曲人、电影导演及演员麦啸霞，也住在罗便臣道，一年多前，他为香港妇女新运会主办“中国闺秀青年戏剧慈善会”，义务撰写粤剧《虎胆莲心》，激励中国国民奋勇抗击入侵的日本侵略军，然而，在日军的大空袭中，一颗炸弹投中了他的住宅，被炸得尸骨无存。

日军攻陷香港以后，派人搜查蔡宅。何香凝走避不及，被日本兵抓往，她自称是看门人的亲戚。由于连日奔波劳累，面容憔悴，真有几分穷苦劳动妇女的模样。不过，在接受盘问时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当一名日本军官问翻译，蔡将军真的离开香港了吗？何香凝竟脱口用日语回答：“是真的。”日本军官立即走到她的跟前，怀疑地追问：“你到过日本？”何香凝马上镇定地回答：“年轻时在横滨当过佣工。”日本军官抓起何香凝的手查看了一番，皮肤确实粗糙如佣工，这才信以为真。日军离去以后，何香凝下定决心，即使冒最大的风险，也要逃出被日本人占领的香港。

与此同时，廖承志正和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从南方局来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开紧急会议。廖承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许多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这批民主人士当中有的是我国文化的精英，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安全地带。这任务千难万险，但刻不容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有两条通道可以逃离香港，一条是水路，从香港坐船到长洲岛，再换船驶往海丰汕尾港和马鬃港；另一条是陆路，先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翻越大帽山到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穿过皇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的据点——白石龙。但两条路都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所以必须要东江游击队配

合接应才行。

1942年元旦之夜。廖承志和另一位八办负责人连贯偷偷潜入九龙，在上海街一幢旧楼房里和林平碰头。林平介绍，日军进攻九龙时，东江游击队已经派出两支武装工作队，衔尾进入新界，因此，从九龙到宝安这一段，交给这两支武工队负责，应无问题。从香港到九龙之间，亦已在红磡准备了一条木船，并曾派人尝试偷渡成功。在行动之前，文化人不得上街公开露面，把他们的钢笔和本子收起来统一保管，免得暴露身份。一旦开始行动，所有撤退人员都要换上唐装，扮成小商人、店员、职员。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详列了要抢救的文化人名单：

文化界经过此间的人，及留此工作的人，全部名单如下：

第一批（2月半出发）茅盾夫妇、沫沙、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张友渔夫妇、沙蒙、葛一虹。第二批（2月底出发）黄洛峰、许幸

元朗大棠杨屋村曾接待过数百名文化界人士，是营救行动西线的重要交通站





部分文化人在东江游击区合影（前排右三为茅盾，三排右七为戈宝权）

之、张宗祜、姚建伯（均在港业余联谊会工作，交通银行职员）。第三批（所发路费多数只够到老隆，2月20日出发）徐伯昕、胡耐秋、程浩、浩飞、于洁如、曹吾、杨永祥（生活书店）、吉家甫（新知书店）、卢家儒、特伟、丁聪、李庚、蒋文燕、童常（新安旅行团）、张英、郭毅（均新文字学会）、赵树泰（大观电公司协理）、钟英（不明）。第四批（所发路费勉强可到韶关，2月底出发）舒强、凤子、兰馥心、奚蒙、金万华、王青安、戴浩、虞静子、金洫、林蜚、贺路、沈剑（均剧团）、李殊伦（电影工

作者)、黄远志(中国社)、邝远芳(桂新华分馆)、黄宝珣(韬公亲戚)。第五批(路费均发到桂林,2月23日出发)杨刚、吴在东与戈茅(芳)夫妇、台考、肖敏颂、曹国智、叶籁士、袁水拍、刘清扬、段国秀、高汾、戴英朗(苏北来)、胡廷钰(以上至桂林)、恽逸群与毛奚夫妇(以上至沪)。^①

实际上,最后营救的人士,远不止这份名单,时间也比电报上说的提前许多。可见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何香凝、柳亚子是这次营救行动的重点之一。因为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在广东境内,可以公开要求国民党协助转移,因此先由船运送至汕尾;而柳亚子因“先后在刊物及公开场合作种种违反国策之言论”,在本年3月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不便公开身份,便由他的女儿陪同,从香港乘船前往海丰。

廖承志派人通知母亲何香凝,让她在家里等候,随时会有人来接她走。1月5日,东江游击队派了一批精干的交通员,化装成商人,在九龙坳先把廖承志接出来,从海路送回内地,然后再到罗便臣道接何香凝。何香凝有四个大箱子,装的全是多年来收藏的珍贵字画,每一幅都是国宝,她执意要把它们带回祖国,决不留给日本人。

交通员们大伤脑筋。按照原定计划,何香凝将从水路返回内地,在未来几天里,他们要在海上换几次船,穿越几道封锁线,空手而行也相当艰难,怎么搬这四大箱字画呢?大家为此绞尽脑汁。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字画装在棺材里,从陆路运回宝安。但战乱期间,长生店有的关门,有的缺货,好的棺材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那些神通广大的交通员,总有办法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棺材买来了,字画都装了进去。他们还备齐了哭丧棒、三梁冠、魂幡、灵座、头牌、高灯、锣伞、旗牌等全套仪仗,请来了吹打的鼓乐手、念经的喃呒佬、挑伞灯的堂倌,由十几名男女武工队员扮成孝子,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肩挑魂幡,哭哭啼啼,组成了一支热热闹闹的送葬队伍,护送棺木

^①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致党中央的两份电报》,载《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从新界进入宝安。当他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时，喧闹震天的吹打声，吸引了哨兵们好奇的围观。什么大户人家出殡，搞得这么风光体面？

1月9日，游击队用一艘小船，把何香凝送到西贡。据当时负责护送他们的一位游击队员回忆：“何老太太心情很愉快，问长问短。那时我不会讲普通话，何老太太见我是客家人，就用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跟我交谈。她问：‘听说日本鬼子在海边放步哨，海上还有巡逻艇巡逻。’我答：‘日本鬼子立足未稳，还顾不了那么多，我们走这条路不会碰上日军。’她又问：‘听说这里有很多自称的绿林好汉，遇到他们怎么办？’我答：‘他们一般都知道我们是曾大哥（指曾司令）的人，不敢阻拦；一些过路的小股土匪我们是容易对付的。’何老太太高兴地说：‘坐船好，坐船好！到了汕尾就更安全了。’”^①在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绷紧，而何香凝却表现出一种穆如清风的气度，就像寒夜里的一团火焰，让人感到温暖，忘却忧惧。船到了西贡，马上又有另一队游击队接应，继续上路。

从九龙到汕尾，本来只需两天船程，但他们的船刚出海，天气就变坏了，大雾弥天，时降大雨，海浪汹涌。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艰辛的时刻。负责护送她的交通员急得嘴角都起了血泡，何香凝却镇静如常，还赋诗《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以记其事：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八个昼夜，终于抵达汕尾港。她一上岸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柳亚子在游击队的护送下，也顺利脱险，往兴宁小住旬朔，即一起前往韶关，再转赴桂林。途中，何香凝难抑兴奋之情，作诗《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

^① 江水：《护送何香凝、廖承志母子的经过》，载《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万里飘雪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
河山不复头宁断，逆水行舟勇向前。

柳亚子也咏诗《别谢一超、蓝训材、袁嘉猷、连贯》，向东江游击队致谢：

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
须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

就在何香凝到达西贡那天，第一批偷渡的文化人出发了。他们包括著名记者邹韬奋、作家茅盾夫妇、翻译家戈宝权、历史学家胡绳夫妇等人。邹韬奋躲在铜锣湾灯笼街贫民区里，由交通员领着他穿过错综复杂的横街窄巷，来到上船地点。交通员打了一个暗号，从黑暗之中钻出另一名交通员，两人唧唧咕咕说了几句话，送邹韬奋来的那人匆匆掉头离去。他戴着一顶压得低低的竹笠，从邹韬奋身边一闪而过，邹韬奋始终没有看清他的模样，也

游击队员护送被营救出的文化人转移



柳亚子



茅盾

没有和他说上话。啊，真是一个神秘刺激的夜晚。

人们鱼贯登上渔船。很多都是熟人朋友，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互相点头致意。船起航了，在黑沉沉的海上行驶了一段时间，便到达红磡。大家在交通员的指挥下，离开大船，乘小船划向岸边。人们迅速登岸，由交通员领着，分头进入九龙市区。当邹韬奋最后一次向海上眺望时，雾渐渐浓了，已看不见载他们离开香港的那几艘大船了。回过头来，九龙街道朦胧的路灯，一排一排近在眼前。他心里不由得激动万分。

据茅盾记述：“就当时情形说来，偷过港九的海面封锁线，似乎不太困难；到了九龙再从陆路回内地，也不见得有多大困难，因为敌人那时正在公开疏散九龙的居民，每天有万把人出去，并不经过检查，可是敌人指定的回内地的路线是从元朗到深圳，而在深圳方面据说有广州伪政府派出的‘招待员’等候在那里办‘欢迎’事宜。这种‘欢迎’，我们当然是不愿意领受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走另外的路线出九龙，这另外的路线上布满着一些‘绿林好汉’统治的区域，如果不先打好招呼，此路一定不通。而当时‘华洋各界’其威望足以说服这些‘绿林好汉’们的，只有东江游击队。”^①

第二天，1月10日清晨，雾气迷蒙。天刚蒙蒙亮，茅盾夫妇、胡绳夫妇、邹韬奋、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等人，装扮成难民，在指定地点等候交通员接应。一支日本巡逻队从街上经过，但没有查问这些人，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他们就过去了。负责带队的交通员走到街上，用草帽朝胸前扇了两下——这是信号，行动开始了——全体“难民”都不声不响地跟在他的后面，两个挑夫挑着行李殿后。队伍默默无声地向荃湾方向走去。

^① 茅盾：《脱险杂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天色大亮了，他们在荃湾的一个交通站吃过早饭，又继续赶路。大帽山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有人低声欢呼起来，翻过海拔958米的大帽山，就到元朗十八乡了，再走20多千米路，就到深圳河了。过了深圳河，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就到宝安游击区了。这段路程，大概还要走一天时间吧。

离开元朗以后，前面就是日军的封锁线。交通员帮每位文化人从元朗乡公所弄到一张“难民证”。邹韬奋的脚在爬山时扭伤了，走路一瘸一拐。交通员还为他雇了一顶轿子，可是谁也不肯坐，邹韬奋不肯坐，连小脚的茅盾夫人也不肯坐，最后轿子就丢在元朗了。

这批文化人夹杂在真正的难民人群里，向着深圳方向，缓缓而行。终于看见深圳河了。冬天的河水很浅，但冰冷刺骨。河对岸的日军哨兵紧盯着这群难民，大家蹚过河流，到达对岸。日本哨兵检查了他们的难民证，仔细地清点人数，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用枪刺指了指岸边的道

丁聪所绘逃离香港的漫画





路。交通员朝那条路走去，大家都跟着他。日本哨兵像押着一群俘虏似的。大家悄悄地把妇女围在中间，免得她们被日本兵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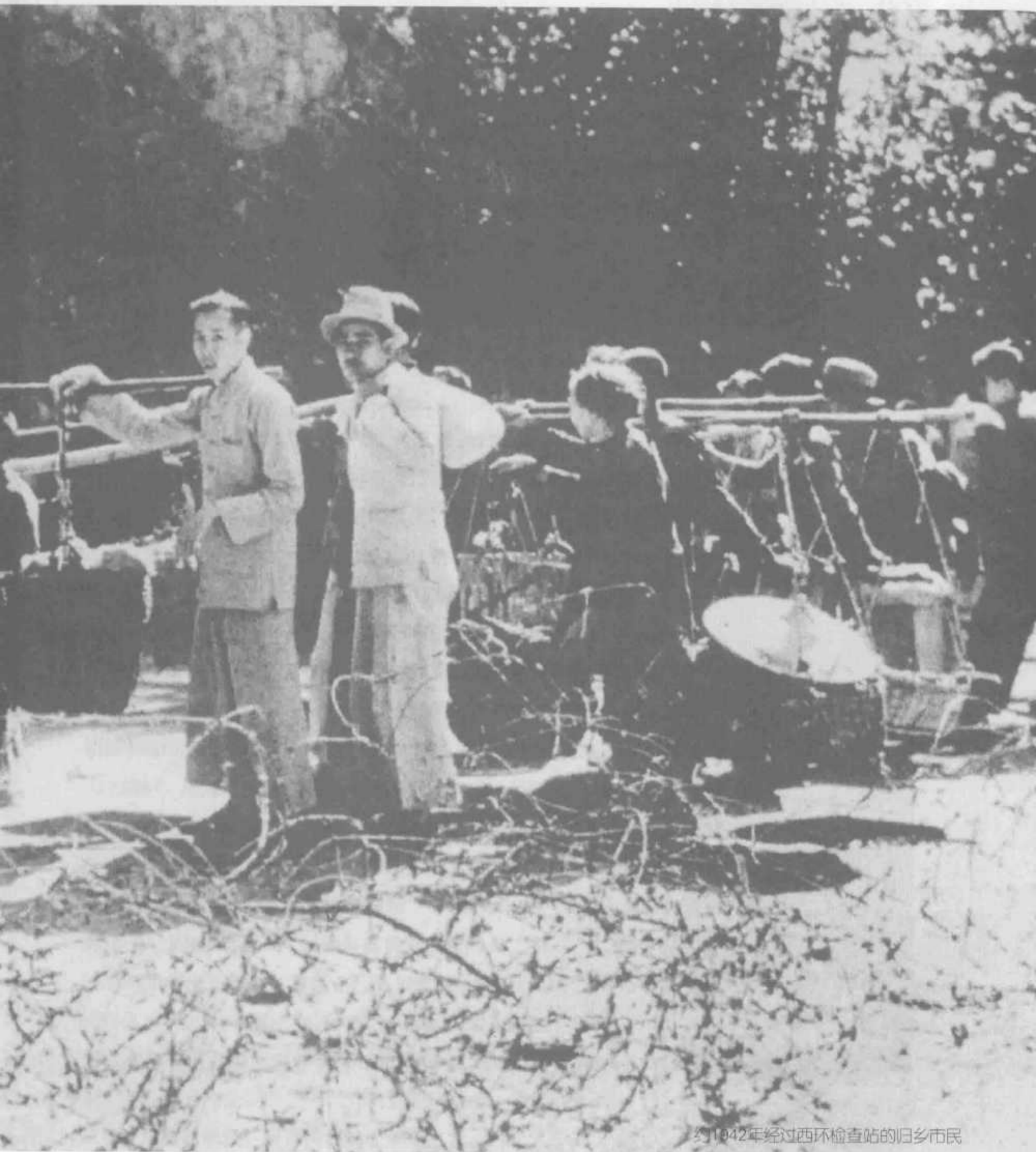
这支沉默的队伍走了一会，路边山坡上又出现了一名哨兵，哇啦哇啦地叫喊着。负责押送的哨兵也喊了几句，然后挥手叫大家继续往前走，而他自己则站下了，把枪背到肩上，显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难民队伍缓慢而杂乱地朝一个山谷走去。还有一些真正的难民朝别的方向走去。邹韬奋好几次回头，看见那个哨兵还站在路边，紧盯着他们。山坡上的哨兵也一直站在那儿。

当日本哨兵终于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以后，所有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走进了山谷。领队的交通员说：“大家就地休息。”邹韬奋问：“还要走多久才到？”那个交通员微笑着回答：“这里已经是游击区了。”大家静了一下，顿时欢呼起来。

廖沫沙后来追述这段艰苦历程：

经过两三天的翻山越岭，经过敌占区的多次惊险的场景，我们虽感觉到体力的疲劳，心力的紧张，但是并没有失去安全的信心。因为领着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走路的向导是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着我们，是那样机警而沉着地为我们





约1942年经过西环检查站的归乡市民



1



2

1 / 廖沫沙

2 / 胡绳

避开种种惊险的局面，这不但使我们坚定了安全的信心，而且也使我们在无言之中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①

胡绳在脱险后，作有《东江》一诗：

又是东江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
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

这批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在白石龙游击区逗留了一段时间，陆续获得安排，撤往惠州、韶关、桂林、重庆等地。邹韬奋在离开游击区前，为游击队司令曾生题词致谢：

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① 廖沫沙：《东江历险留念》，载《随笔》1984年第1期。

保祖為先 衛國民鋒

粵省人士流散，以香港為最後避難所，幸而得免。然此輩人，多係知識份子，其志氣不凡，其才力亦不凡。其在港時，多能發揮其才力，以救國為懷。其在逃時，多能發揮其才力，以救國為懷。其在逃時，多能發揮其才力，以救國為懷。

邹韬奋为东江游击队题词

另一批由范长江带领的一批新闻记者，1月10日，从德辅道西的码头乘舢板逃往澳门，再由澳门转乘小船前往台山的都斛港。在他们当中，有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他代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主办《光明报》，担任社长。萨空了虽然也急于离开香港，但他最后把东借西凑了120元港币才买到的位置让给了梁漱溟。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送走了一批人，心上有点轻松，但想着用一条舢板漂过大海，途中还说不定会遇见敌人、海盗，又着实有点担心。这些人不只是个人的朋友，还是中国的力量啊！”

随后，陆续有文化人循这条路线逃回内地。但不久内地哄传夏衍在逃往澳门途中，不幸殉难，有的报道还活灵活现地描写夏衍如何被抽筋剑劈，葬身鱼腹的情景。其实，这都是谣传。夏衍并没有遇难，他在香港隐蔽了一段时间以后，和一批文化界人士化装成难民，从西环乘船逃往澳门。

夏衍事后追述：“二十一个人，每人船费港币七十元，用一百五十元的‘大票子’支付须照面额七折，谁也不争持这些，离开香港，早一分钟也好，这是每个人头脑里唯一的问题。”他们有的化装成乞丐，有的化装成地痞，年轻的女人用锅底涂黑自己的脸，而夏衍则扮成一个商人。21个人挤上了一

夏衍



条长不满三丈，阔不满三尺的小渔船上。夏衍不胜惊诧地说：“我简直不相信这样的小船可以渡海，我们要渡过的还是有名的伶仃洋。”

本来从香港过大海到澳门，顺风只要六个小时，但这天偏偏没有风。他们的船在出口时，受到日军的盘查。夏衍因为懂日语，用日语和日本兵交谈。经过一番对话，巧妙地过了关，安全到达澳门。但他们发现澳门也不是久留之地。夏衍写道：“最初决定了走澳门，一是为着这儿可以得到一些香港所得不到的消息，其二是为着期待着也许可以有到广州湾的定期船只，可是一到澳门，这两个期待都失望了。澳门名义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实际上已等于被日寇征服了，警察、邮务、海上警备完全操纵在日寇手里了。”

事到如今，他们面临着两个去向，要么从歧关到石岐，经沦陷区走肇庆，这一路有日伪军的威胁；要么由澳门坐小船到北水，换船到台山都斛，这一路虽然没有日伪军，但有海盗威胁。最后，他们决定走都斛。

那天晚上，他们上了船，向北水驶去，但不久就遇到强盗拦路，被迫又掉头，走路湾出口。夏衍写道：“从澳门到都斛，通常航线必须经过路湾这个出口，但在那儿停着日本和葡萄牙的志为缉捕走私船的汽艇。现在，取巧的路不行，又绕回到走险的路了。算是侥幸，十点四十分，在日寇汽艇探照灯扫射下，我们躲在一只挂葡萄牙国旗的货船后面，居然偷渡过了路湾的海口……船从日寇占领了的横琴海和三灶岛的北面擦过，向西南直驶。”

第二天清晨，船到了北水，稍事休息，再次起航，傍晚便到达了都斛。他们一眼就看见，在码头上飘扬着一面中国国旗。夏衍以激动的笔触写道：

香港沦陷之后，第一次看到国旗，第一次遇见祖国的武装士兵。也再度踏上了祖国的土地……^①

农历新年前后，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从惠州到了老隆。然后，有的

^① 夏衍：《走险记》，载《夏衍杂文随笔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人经兴宁、梅县、大埔前去闽西南，有的辗转前往苏北中共游击区。大部分人则从老隆经韶关、衡阳，奔赴桂林。其情形，就如水银泻地一般，向全国各个游击区和大后方流去了。

夏衍等人历经艰险，安全回到桂林。留在桂林的文化人奔走相告。1942年2月5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人在桂林南站欢迎胜利逃亡的夏衍一行。洪深见到夏衍，奔上前与他拥抱，因太过激动用力，竟把夏衍别在胸前口袋里一支钢笔也压断了。

我归来了，祖国！再会了，香港！

那些从香港脱险归来的人，回顾这一个多月的经历，维港的炮火历历在目，依然扣人心弦；死难者的鲜血在记忆中依然汨汨流淌，殷红如初。逃亡的危险，一路上风餐露宿的艰辛，在无尽的冷风热血之中，唯存民族与家国之想，支撑着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趟过一条河流，又一条河流；穿越一道封锁，又一道封锁。许多人在向香港投上最后一瞥时，内心都在无声地唱着田汉作词的歌曲《再会吧，香港》：

再会吧，香港，
你是这样使我难忘，
你筲箕湾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阳，
皇后大道的灯火，香港仔的渔光。
浅水湾的碧波荡漾，大埔松林的猿声惨伤，
宋皇台的蔓草荒芜，青山禅院的晚钟悠扬，
西高岭的夏兰怒放，鲤鱼门的归帆饱涨。

……

再会吧，香港，

夏衍（右三）与田汉（左一）、王莹（右四）等合影





1943年被营救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左一）与东江游击队成员于惠州合影

《华商报》的报道



可听得海的那一方奔号着凶猛的豺狼？
它们践踏着我们的田野，伤害了我们的爹娘，

我们还等什么？莫只靠别人的帮忙，
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提起了行囊，穿上了戎装，
踏上了征途，顾不了风霜。

只有全民的团结，才能阻遏法西斯的疯狂！

只有青年的血花，才能推动反侵略的巨浪！

再会吧，香港！



1942年,《东江民报》的木刻画《护送》描绘了“省港大营救”的场景

在游击队协助下,成功逃离香港的,还有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和英军京(G.King)上校、谭臣(Thomson Supt)警察司等一批外籍人士,但也有营救失败的,国际友人爱浦斯廷便没有能够抢救出来,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总体而言,这次营救行动,是非常成功的,游击队先后把八百多位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属从香港救了出来,还迎送了两千多名回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

一场被称为“历史壮举”的大营救,胜利完成了。1942年2月,香港沦陷两个月后,中共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报捷:“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现韬奋、茅盾、乔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东江曾、王部,长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门,再分别前往苏北及内地,何香凝、柳亚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间,现在疏散工作已大体结束。”^①

^① 《少文致中央书记处电》,载《深圳档案文献选编》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国民党方面，也对陷于香港的知名人士展开积极的抢救。陈策突围前安排军统人员陈静涛等人潜伏下来，实施营救计划。先后救出了足球名将李惠堂及1300多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和国民党人士。为了配合行动，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曾率部扰袭香港北部，以策应营救工作。

生与死之间

香港的长夜，已经降临了。

很多逃不出去的人，身陷黑夜之中，痛苦着，等候着，失望着。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因患严重的心脏病，无法撤离，1942年1月7日，怀着一腔忧愤，在香港去世，享年76岁。

曾经担任广州《七十二商报》主笔，广东近代报人代表之一的李健儿，九一八事变后，他撰写了晚清抗法名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传》，激励人心。香港沦陷后，日军设宴邀请李健儿出任报社编辑。宴会中李健儿狂饮酩酊，操起酒瓶掷向日本人，痛斥日军侵华，然后从高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时年46岁。

当日军开始空袭九龙时，以小说《生死场》闻名的作家萧红正在九龙乐道的家中养病。她是1940年年初与丈夫作家端木蕻良一起从重庆来到香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短篇小说《后花园》《小城三月》等作品。

萧红很早就在文坛崭露头角，被鲁迅称之为“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1936年，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叶以群等67位作家联署发

萧红



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有感于日蹙国土百里，神州陆沉，民众流离，乃以手中之笔作为救亡武器，写下一系列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如《寄东北流亡者》《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她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

东北流亡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我们的沉着毅勇，正与敌人的急功切进相反，所以最后的一拳一定是谁最沉着的就是谁打得最有力。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的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①

在她的朋友和读者看来，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萧红在文坛的前景，该有多光多亮啊。然而，1941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把她击倒在香港了。4月，美国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国途经香港，到九龙看望萧红。其后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劝告，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几乎是绝症的代名词。

在这沉重的打击下，萧红并不悲观，她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包括要写十个短篇、两个长篇（反映哈尔滨女学生与生活抗争的《晚钟》和描写开垦北大荒的《泥河》）。可惜，她与病魔之战，才刚刚开始，香港又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一切美好的憧憬，都被战争击碎。12月8日，日军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开始了。这天，柳亚子冒着空袭的危险，到萧红寓所探望。萧红在病榻上，听着远处隆隆的爆炸声，而病榻之前，这位相识不久的长者的谆谆慰喻，在内心更添几分“天涯孤女”的悲凉凄切之感。柳亚子题诗一首相赠：

^① 萧红：《寄东北流亡者》，载汉口《大公报》1938年9月18日。

轻飏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青韶鬓未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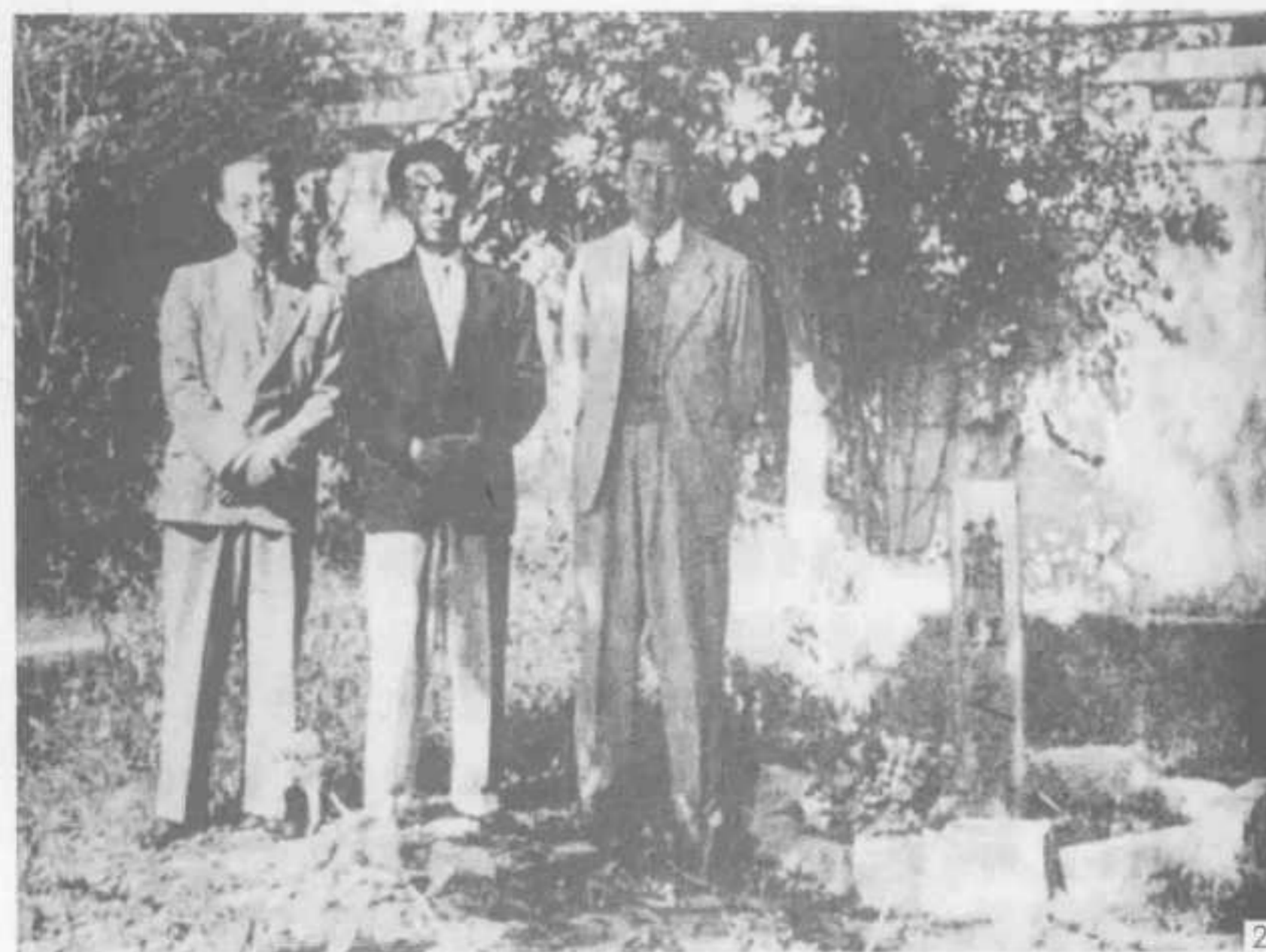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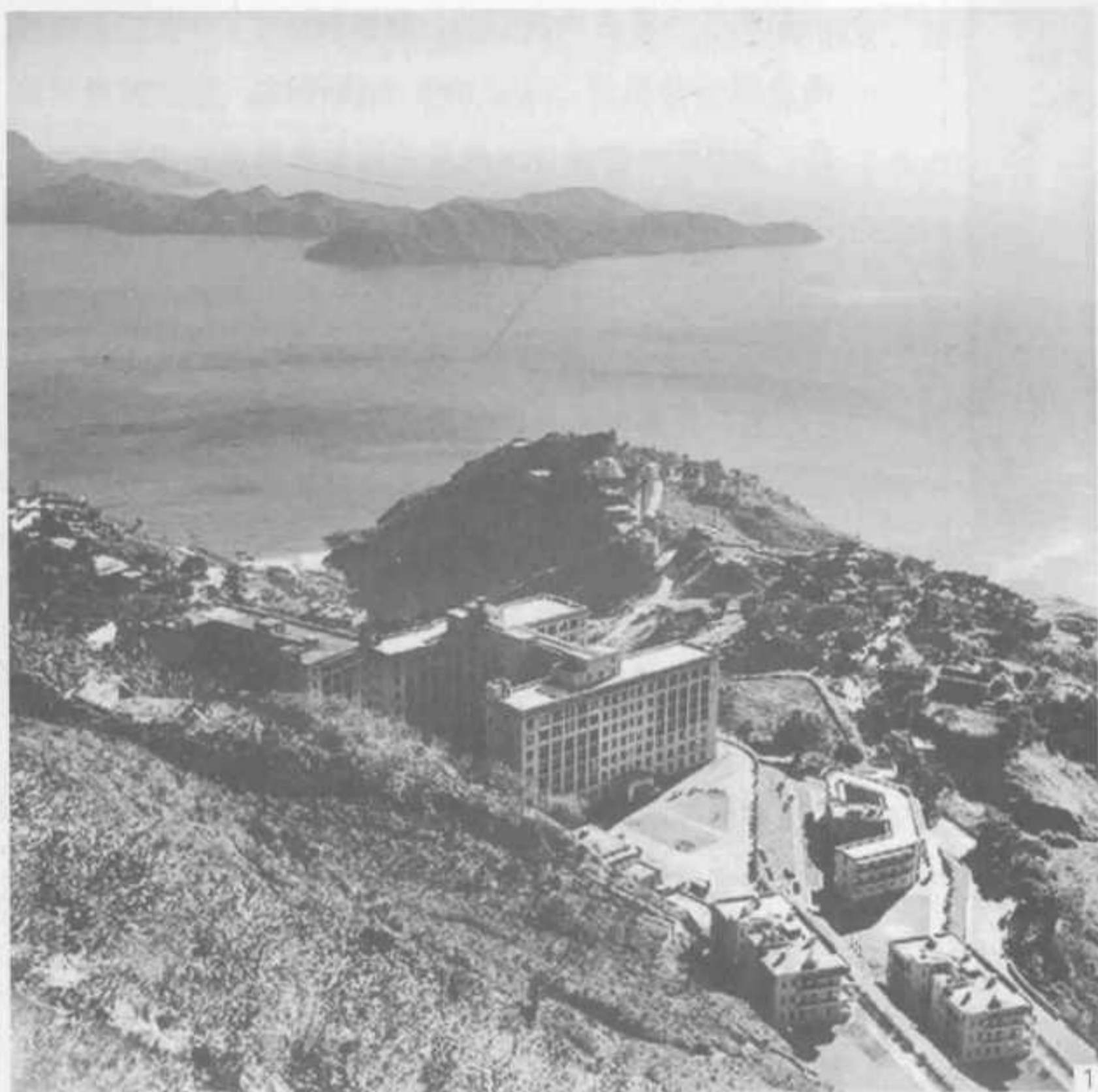
萧红的朋友们，已纷纷潜返内地了，茅盾走了，胡风走了，叶以群走了，柳亚子也走了。但萧红却在病榻之上，动弹不得，每天只能透过窗口眺望天空，时浓时淡的烟幕，在窗前飞过，把蓝天搅得一片混浊。这惨黯的画面，她在上海见过，在武汉见过，在重庆见过，今日又见，仿佛是一个缠上了她的恶魔，从上海一直追到香港。多么可恨、可恶的画面。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在漫天硝烟之下，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不久，香港亦告沦陷。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为误诊而做了喉管手术，致使不能饮食，身体日益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稍好，强支病体，在一纸片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等字句。

天空的硝烟还没散去，一面太阳旗在玛丽医院楼顶升起了，大门口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尽管由于健康原因，萧红无法加入到逃亡的队伍，她再也没有机会重返白山黑水的故乡了，但也决不会留在香港被侵略者所利用。她被悄悄转移到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由于连日惶惶流离，缺医少药，加上内心受着万分痛苦的煎熬，1月22日，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怀着许多未及完成的写作计划，怀着对遥远故乡的绵长梦想，与世长辞，告别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乱世。

当萧红那盏灯悄然熄灭时，香港的街道上，到处是排队的人龙，买米的、买柴的、买船票的、上银行提钱的，形成了混乱的人潮，互相拥挤着，喧嚣着，填满了所有的大街小巷。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等船赴澳门的行列更长了，由永安码头一直排到长洲码头，至少有一个华里以上。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买米的行列，比等船的更多……”对明天充满焦虑的人们，谁也没有留意，那个在红十字临时医院里寂寞离去的女子。

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骆宾基处理完她的后事，安葬好她的骨灰，也



- 1 / 玛丽医院和博览海峡
- 2 / 戴望舒（右）、平泽（中，日本《读卖新闻》驻港记者）、叶灵凤1942年年初在萧红墓地吊祭



丁玲（右）、革非（中）与萧红（左）

营救陈寅恪脱险的朱家骅



一起离开香港这块伤心地，往桂林去了。1月25日，香港沦陷一个多月，萧红的头七还没过。曾经以日记形式，逐日记下香港保卫战及沦陷后那些日日夜夜的萨空了，终于也在这天离开香港了。他乘船前往澳门，然后转赴内地。他在香港的最后一篇日记写道：

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帜。

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所有未死的人们，告别死者，告别黑暗，毅然走向明天。

香港沦陷前夕，国民政府也开列了一份紧急撤退的人员名单，派飞机到九龙接载。有“三百年仅此一人”之誉的陈寅恪，是名单上最具分量的学人之一，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朱家骅曾致电陈寅恪，让他赶紧收拾行装，携家眷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

当时陈寅恪与夫人、女儿寓居九龙太子道369号的3楼后座，自开战以后，听着日机在头上不断掠过，爆炸声此起彼伏，已抱随时可死之心。接电后又燃起一线希望，举家匆匆赶往启德机场，不料却被挡在跑道之外，不准登机，因为飞机已经满座，并被告知，这是最后一班机了，不会再有飞机来了。与陈寅恪同一遭遇的，还有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以及蔡元培的夫人等人。

朱家骅所说的“最后一线生机”，于焉断绝。无可奈何，陈寅恪一家只能惶惶然返回家中。陈寅恪的女儿流求记述：“父亲仍在做赴英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的西装。不料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迅即被日军占领，一时社会秩序混乱，孤岛上生活困难，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人心焦虑不安。”^①

陈寅恪辞去在香港大学的教职，在家闲居避乱。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告断塞，唯靠些微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节省口粮，夫人唐筮不得不实行缩食计划，几个月不沾腥荤，有时以红薯根皮糊口，每餐亦只得半饱，偶有一个咸蛋，全家五人分食，如尝珍馐美馔。

陈寅恪还要不停应付日军的骚扰，经常被日军迫迁，他曾试过两个月没脱鞋子睡觉。有一回，日军又要征用他们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外面天寒地冻，兵荒马乱，日军到处设卡，随意当街杀人，陈寅恪的诸亲好友，早已雨零星散，求助无门。这时把他一家人赶到大街上，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女儿流求记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陈寅恪忍无可忍，毅然出面与日军交涉，由于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且理直气壮，终使对方同意放宽时限。后来这支军队因奉命开拔，整幢楼的居民才逃过一劫，幸免流落街头。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陈寅恪深信天之未丧斯文，仍坚持撰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新年之际，陈寅恪以手栽盆花为题，赋诗感怀：

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
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
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
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

——《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

陈寅恪



^① 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陈寅恪、唐筼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其中“埋名从古是奇才”，说的便是香港沦陷后，许多名流英杰、才子佳人，谨守春秋大义，践行“不食周粟”之志，纷纷隐名埋姓，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新年过后不久，日本当局派人持军票20万元，委任陈寅恪到上海或广州办学，陈寅恪以身体有病为由，一口拒绝。他给友人的信中说：“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汪精卫妻子）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①

以气节见称的义宁陈家后人，大节巍然，操持峻洁，岂肯为侵略者服务，只有毅然设法逃出。朱家骅再次密电澳门，让国民党地下人员转告陈寅恪，将会派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接应陈氏，请陈寅恪设法与之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然而，这位地下人员三番四次到香港，都因日军戒备

^① 引自《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陈寅恪致傅斯年函（1942年6月19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森严，无法与陈寅恪接上头。

陈寅恪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决意自行觅路逃走。5月5日夜晩，陈寅恪带着全家人，登上一条运粮的小货船，由于陈寅恪还欠着债务，走前必须偿还，以致盘川不足，不得不把衣服、鞋子都抵给了船家，才能上船。他们悄悄逃到澳门。在澳门，他找到了重庆政府派来的地下人员，取到了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拨发的一笔款项及可用于逃亡的部分川资。

这笔钱如渴时甘露，解决了部分难题，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的路途了。大海茫茫，一叶孤舟，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狂风巨浪之中。女儿因为晕船，瘫坐在椅子上，陈寅恪鼓励她说，自己在她这个年龄（13岁）已经乘海轮东渡留学，最初也是晕船，但咬牙坚持，慢慢适应，最后竟锻炼到可以在风浪颠簸之中，与水手一起吃饭。陈寅恪在船上赋诗《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剝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诗中表达了一种狐死首丘的故国之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死不渝。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海上之旅，他们终于登上了广州湾的陆地，然后沿着潜江、柳江，向桂林进发。陈寅恪的兄长听到他安全抵桂的消息，赋诗《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祝贺云：“穷愁羁我在，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虏，余生息祸胎。”而“正气吞狂虏”五字，恰是陈寅恪在香港守身如玉、守节不移的写照。

另一位与陈寅恪同一遭遇的人是叶恭绰。当日军进攻九龙时，他已拿到了飞往重庆的机票，却因为机位被其他党政要人所占，无法成行。他在政坛的显赫历史以及在文化界的名望，足以使他被重庆政府列入抢救名单和被日本人列入最重要的网罗名单之中。这时，他身陷四面环敌的危殆之地，随时有不测的风险。



叶恭绰

日本人想利用叶恭绰组织文化协会，他断然拒绝了；后来想捧他出来做广东省省长，也被他拒绝了；再请他另立华南政府出任主席，他还是嗤之以鼻。对种种威迫利诱，叶恭绰一概严拒，把门关得死死，连一条缝隙也不给日本人和汉奸留下。一个真正的士人，身处国家、民族、文化存亡绝续之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唯求自谦自足，无负平生所读的圣经贤传，以酬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恩泽而已。

叶恭绰羁泊孤岛，生活贫寒，然守志不渝。他尝赋“浣溪沙”词，内有“势压扶桑大海东，江山生色气葱茏，谁云此树不英雄”

等句，也许正可洞察他此时的心迹。叶恭绰在香港一直熬到1942年的10月，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成功逃离，移居内地。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对那些已经被侵略者盯上的人来说，正面临着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关头。走，一路上风雨如磐，生死难卜；留，或做汉奸，或为楚囚。虽可偷生，却生不如死。因此，大多数人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走”。只要走得动就走，只要有路可走就走，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粤剧泰斗马师曾，在香港沦陷后第三天，就带着全家老少11口，逃到澳门，再从澳门逃到湛江。多年后，马师曾回首往事，曾赋诗感叹：“银线络流萤，凭栏听雨声。可怜翠袖湿，风舞泪痕轻。”寄慨之深，令人泫然。

在湛江，马师曾与欧阳俭、罗丽娟、红线女、梁冠南、马师球、甘燕明等艺人会合，组成抗日剧团，全团有六十多人，随行眷属一百多人。其后陆续从香港逃出来的艺人梁雁崧、郎筠玉、赵连碧、少浪萍、廖少德、陈展鹏、郭湘文等，都加入他们的队伍。

逃亡者加快了逃亡的步伐，日本人也加紧了收网兜捕的速度。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在报纸上登出了“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启事，所有电影院都反复打出幻灯字幕，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文化人士到香港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报到。1942年1月22日，日军电影报道部按图索骥，把一批未及撤走的香港文化艺术界人士，召集到半岛酒店开会，企图营造一种“人心归向”的假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字，包括有京剧

马师曾



大师梅兰芳和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胡蝶等电影界名人。

第二天的报纸，对这条消息大肆渲染，还说梅兰芳、胡蝶在招待会上致了词，表明这两位艺术家已归顺了日本统治者。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和忧虑。然而，事实证明，所谓梅、胡归顺日本，只是敌人造出来的谣言。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怀柔手段，拉拢这批艺术工作者，说服他们像当年联手创作《最后关头》那样，拍一部表达“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主旨的电影——《香港攻略战》。

但是，敌人太不了解这些血管里流着中国血的艺术家们了。

关文清，香港电影的拓荒者，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携影片《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赴美公映，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各地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热情，纷纷捐款寄回内地慰劳抗战将士。他在日本考察时，见日本工业发展迅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虽然是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于是拍摄了《生命线》（1935），以及《抵抗》（1936）、《边防血泪》（1937）、《公敌》（1938）抗战三部曲，并参与了经典抗战爱国影片《最后关头》（1938）的拍摄。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影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映，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的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他是香港抗战爱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会因为侵略者的淫威而屈膝吗？当然不会。

吴楚帆，1935年以出演宣传铁路救国影片《生命线》一举成名。1937年凭着《人生曲》一片荣膺“华南影帝”称号，当时他只有26岁，血气方刚，前途无量，出



1 / 关文清
2 / 吴楚帆

演过《四子从军》（1938）、《战云情泪》（1938）、《最后关头》（1938）、《大地晨钟》（1940）、《岳飞》（1940）等多部影片，他会向日本侵略者弯腰吗？当然不会。

胡蝶，中国第一流的电影女演员，曾经在左翼电影《狂流》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角色，细腻地展现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获得好评如潮。她主演的《姊妹花》，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1933年获选为“电影皇后”。她把香港沦陷日，痛心称之为“蝶耻日”，在回忆录中写道：“香港沦陷后，我几乎是尽可能不出去，因为在一切交通要道或是街角都堆起了沙袋，由日本宪兵放哨，中国人通过步哨都必须做九十度鞠躬，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甚至可能遭到日本宪兵的恶毒殴打。这种屈辱，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能忍受的。”^①她会颯颜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吗？当然不会。

更不用说在演艺界德高望重的梅兰芳了，当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之日，他已预感到香港陷落之后，日本人必然要把他推上舞台。因此毅然采取一个表明个人立场的行动：蓄须罢演。他曾经对友人慨然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这样一位有骨气的艺术家，会为敌人登台献唱吗？当然不会。

在半岛酒店的招待会上，艺术家们都以沉默回应日本人的邀请。沉默，就是反抗。日本人一厢情愿地拟定了参加拍摄《香港攻略战》的人员名单，消息传出后，香港电影人纷纷抵制。虽然他们无法与日本人的刺刀硬

^①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梅兰芳蓄须明志

黎民伟



碰硬，但他们可以逃亡。

关文清秘密邀约了吴楚帆、张瑛、黄曼梨、白燕、梅绮、大口何等著名编导和演员，就在半岛酒店的招待会开过五天后的1月26日，农历腊月廿九，这一年没有年三十，这天就是除夕夜了，香港没有往年的过节气氛，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一片肃杀之象。关文清等人偷偷搭乘“白银丸”轮船，逃往广州湾（今湛江港）。

他们在广州湾上岸后，在当地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剧五天，随后便各奔东西。关文清返回开平老家，在开平中学、越华中学（因战时从广州迁入开平赤坎镇）任高中英语教师。而吴楚帆则被迫改行做了九八行的经纪。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仍矢志不忘救国，吴楚帆、张瑛等在湛江联络了一批香港电影从业人员，组织成立“明星话剧团”，演出《林冲》《雷雨》《钦差大臣》《欲魔》等宣传抗日爱国的戏剧。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也是日本重点拉拢的对象。香港沦陷后，他隐姓埋名，潜伏了二十多天，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下，扮成盲人，混在难民队伍当中，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逃到了桂林。在途中历尽颠危，身体几乎累垮，加上患了肺结核，差点死在桂林的一间破房子里，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踟蹰的情形下，他完成了反映香港沦陷前后的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然后又长途跋涉，于1944到达重庆，担任中央电影摄制场编导委员。

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纪录片之父”的黎民伟也在香港。当年他和兄长黎北海合作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自己反串女角，而他的妻子严珊珊在片中扮演侍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早出现女演员的影片。1927年，黎氏兄弟的《庄子试妻》和由广州人侯曜执导的《西厢记》在欧美公映，成为最早介绍到欧美的

中国电影。他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沦陷后，黎民伟携眷经澳门逃入内地，奔走于广州湾、桂林、柳州、八步一带，从事戏剧宣传抗日救亡。

尽管每天都有文化界人士逃离香港，但也有一些人，因为拖家带口，行动不便，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沦陷区内。粤曲演唱名家李少芳因为怀了孩子，快要生产，无法逃亡。她是著名粤曲艺人小明星的徒弟，星腔的第一代传人，当时的粤曲演出场地，多在市井茶楼，但李少芳位卑未敢忘忧国，演唱的多是《恨填卢沟月》《光荣何价》《烽火满危关》《鸡鸣起舞》一类宣传抗日救亡的曲目。她那有特殊韵味的平喉唱腔，曾令无数听众潸然泪下。

香港沦陷后，这个身材瘦小的弱女子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勇敢地选择了继续登台，继续向全香港演唱《光荣何价》。她仿佛忘了自己正处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一反星腔凄婉柔弱的腔调，以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唱出：

战场拼命，杀尽敌人复建新中国，
把功业完成，杀敌人复建新中国，
千秋万世留名。

……

起救危亡，当令同胞钦佩，
光荣何价卿知否？看来不止值连城，
洒将热血亦要把国运重兴！

一曲既罢，掌声四起，而李少芳却被日本宪兵当场逮捕，以“煽动抗日情绪”的罪名，连同她未满月的孩子，一起关进了赤柱监狱，长达两年时间。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因为两个爱子在身边，一时无法走脱。以他赫赫扬扬的声名，自然是日军网罗的重



李少芳

《李少芳粤曲从艺录》





要对象。日军占领香港后，驻军司令酒井马上派人寻找梅兰芳，把他带到半岛酒店。当酒井看到梅兰芳留了两抹小胡子后，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一位大艺术家，怎么好退出舞台？”梅兰芳从容回答：“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老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坏了，不能再登台演出了。唱了快四十年戏，也该退休了。”

梅兰芳从一开始，就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日本人三番四次请他登台，梅兰芳都推辞了，或以牙疼为由，或以剧团不在香港为由，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梅兰芳蓄须明志，在香港传为美谈，人们都在暗中表示钦佩。梅兰芳不肯上日本人的舞台，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窗帘，关掉电灯，躲在被窝里收听短波电台，尽管他的楼上楼下都住满了日本人，但他依然每天收听，一听到战局有什么新变化，赶紧告诉好朋友，共同分享。

梅兰芳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无法脱身，于是决定先把两个儿子偷偷送回内地，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再伺机脱身。当时他的爱子葆琛和葆珍，都在香港读书，梅兰芳托朋友安排好出逃路线，把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绍斯”“绍

马师曾（右）、红线女（中）拜访梅兰芳



武”（因为两人的小名是小四、小五，取其谐音），以掩饰身份。出发那天，梅兰芳在家里摆了一场饯行的家宴，与爱子凄然相拥，依依惜别。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梅兰芳既天天盼望得到爱子的消息，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直到两位爱子已安全返回内地的确信传来，才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有人建议他化妆逃回内地，但他觉得自己目标太大，这样做风险极高，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与其偷偷逃亡，不如光明正大返回上海，因为上海也是日占区，日本人没理由不让他去。

1942年夏天，梅兰芳从香港坐飞机，飞返上海。当他一脸憔悴地出现在马斯南路的寓所门口时，为他开门的夫人不禁痛哭失声，因为上海盛传梅兰芳坐船回上海，在途中遇到空袭，船沉人歿。梅兰芳回到上海后，一直杜门谢客，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

梅兰芳离开香港后，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弟子”，还留在香港，那就是中国电影界的头牌女星胡蝶。1935年梅兰芳和胡蝶应邀到苏联访问，在路上胡蝶曾拜梅兰芳为师，学习京剧。尽管不算很正式的师徒关系，但胡蝶时常自称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而梅兰芳也没有否认。

日本人把胡蝶列为重点拉拢对象。她没有随关文清逃亡，甚至不愿意离开香港，她并非对日本人有什么好感，而是这里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她的丈夫潘有声在香港做生意，生活还算过得平稳。日本人也向她承诺过，保护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尊重中国人的自由，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与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进行合作。但她很清楚，日本人许诺的种种优待条件，都是要拿中国人的良心来交换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她最终也要走上逃亡之路的，因为她“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唯其这样，才能在后来设法避过日军的耳目，逃离香港，奔向大后方”。

果然，不久日本人邀请胡蝶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思想。胡蝶意识到，这是一生名节存毁的最后关头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很谦让，但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做幌子，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全家都为此事感到焦急。有声说已到了我们该走的日子。”

胡蝶夫妇和游击队取得秘密联系，让他们安排出逃的路线，然后把历年积存的财物装了三十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人运送回国。到了出逃那天，游击队派人来接他们，全家人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避开人烟稠密之处，



胡蝶和潘有声的结婚照



专挑僻静之处行走，朝广东境内进发。胡蝶在回忆录中追述：

那时的香港还没有今天的繁荣，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那时出入过境并不需要什么通行证。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走了一天，总算到达广东省的惠阳，然后从这里坐柴油车到曲江，也叫韶关，把我们护送到惠阳，游击队的任务就算完成。有声交给游击队三千元港币，作为护送的费用，虽然游击队一再说他们很高兴能协助我这样一个有点名气的演员逃离虎口，我们还是请他们收下，作为我们对抗日事业的一点心意。^①

由于游击队安排周密，行动神速，等日本人发现时，胡蝶早已远走高飞了。虽然她的三十箱行李，在路上被强盗洗劫一空，物质上损失惨重，但她总算脱离魔掌，保全了个人名节的清白。

日本侵占香港，薛觉先未及逃脱，被日本人强迫登台演出，唱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演出《王昭君》时，在“投崖”一段中泣血悲呼：“苍天啊！苍天！山河沦丧，野哭苍生。悲我昭君，无以和戎，悲我昭君，无以报国。生而弃国，虽生犹死，死而报国，虽死犹生。无愧于心，便无愧于国，无愧于己，便无愧于人。”演出《咬碎寒关月》时，更以无限悲愤的腔调唱出：“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佑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一腔忠愤热血，不知可洒向何处，喷向何人。

^① 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许多热爱薛觉先的观众，都为他的遭际扼腕叹息，担心他变节投敌。一向珍惜令誉的薛觉先，更是备受煎熬，度日如年，时时寻找逃走的机会。到1942年5月，机会终于来了，他秘密逃到广州湾，随即登报声明：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将全力为国家服务。中国人无不为之欢呼，而日本人恼羞成怒，派人到广州湾绑架他。幸得到通风报信，薛觉先与妻子唐雪卿及时躲藏起来。等到他的剧团原班人马到齐后，重新扯起“觉先声”的大旗，奔走广西玉林、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等地举行义演，将所得除伙食费外，全部捐作抗战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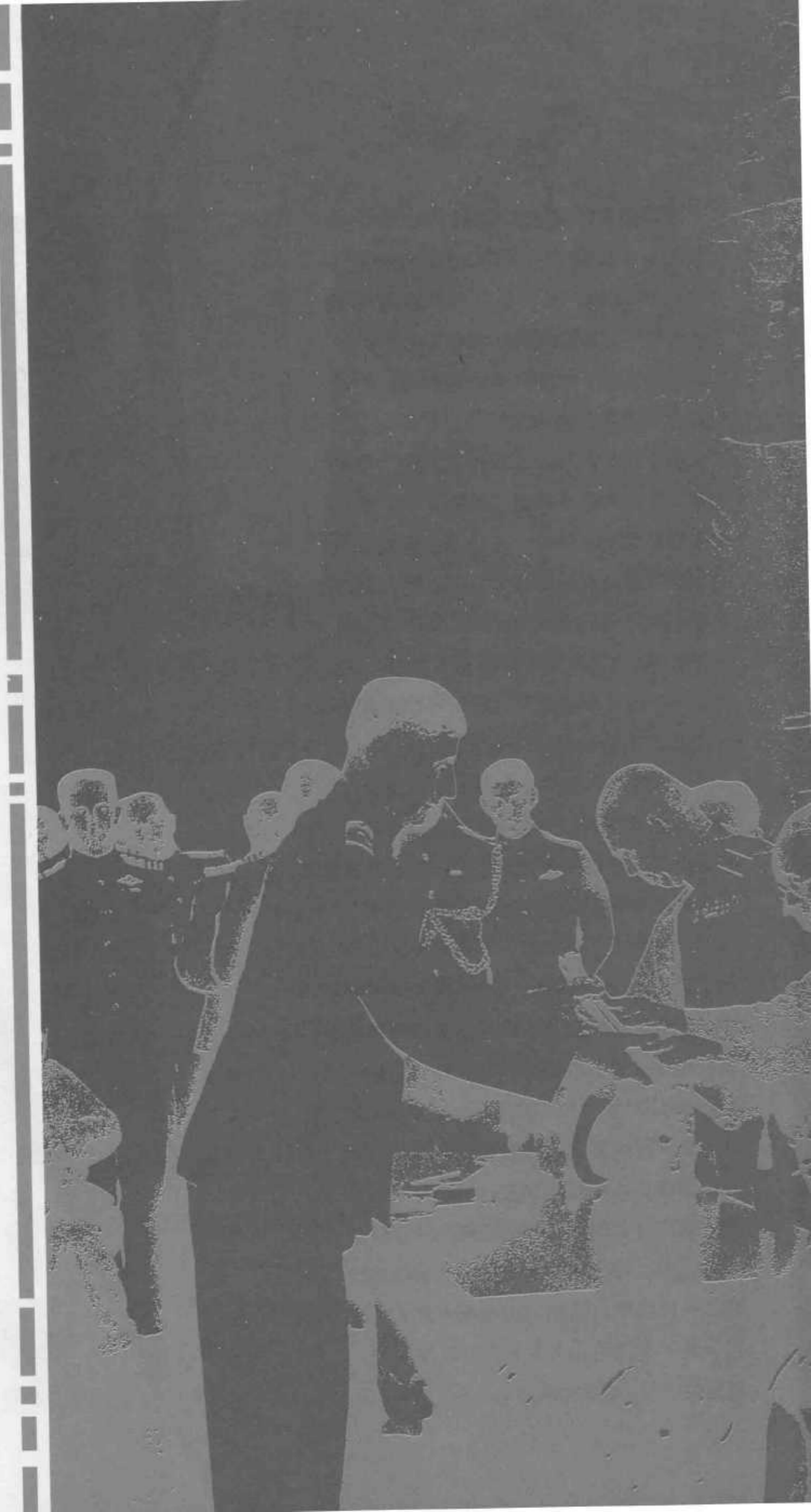
也许有人会疑惑，梅兰芳、薛觉先、马师曾、李少芳这些唱戏的艺人，与陈寅恪、叶恭绰这些文人士大夫，陈策、陈济棠这些政界、军界中人，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国难当头，何以会取如此一致的立场？

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长大的，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即以《易经》元亨利贞而言，无非是仁礼义智。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民众者，就是元亨；奋起抗敌，浴血沙场为利；守节不移，以身殉道为贞。在国家危难之时，守节也是抗敌。有此气节，国家、民族未来复苏的生机，就不会灭绝。贞下起元，凤凰涅槃，胜利的一天，必会到来。



薛觉先戏装照

世界
历史
地理
知识





第四篇

苦尽甘来《《



日军轩尼诗道的入城仪式

日本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成了香港人最惨痛的一段记忆，直到今天，甚至成了香港历史的一个特殊符号，一个不会有任何歧义的专有“名词”。老一辈的香港人在形容生活极艰难时，常会用一句口头禅：“仲惨过三年零八个月嗰阵时。”意思是还惨过三年零八个月那时候，可见那三年零八个月在港人的记忆中，是多么悲惨的岁月。



日军入城



酒井隆在弥敦道举行入城巡行

日本人的殖民统治，给香港来了深重的苦难。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更深邃之处时，这“三年零八个月”所展现的，不仅有饥饿、奴役、家破人亡的痛苦，不仅有苦难辛酸的泪痕，也有不屈不挠、奋勇抗敌的记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上演了如此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一幕。

香港沦陷不久后，出现在日本一份期刊上的插图，表示香港已成日本占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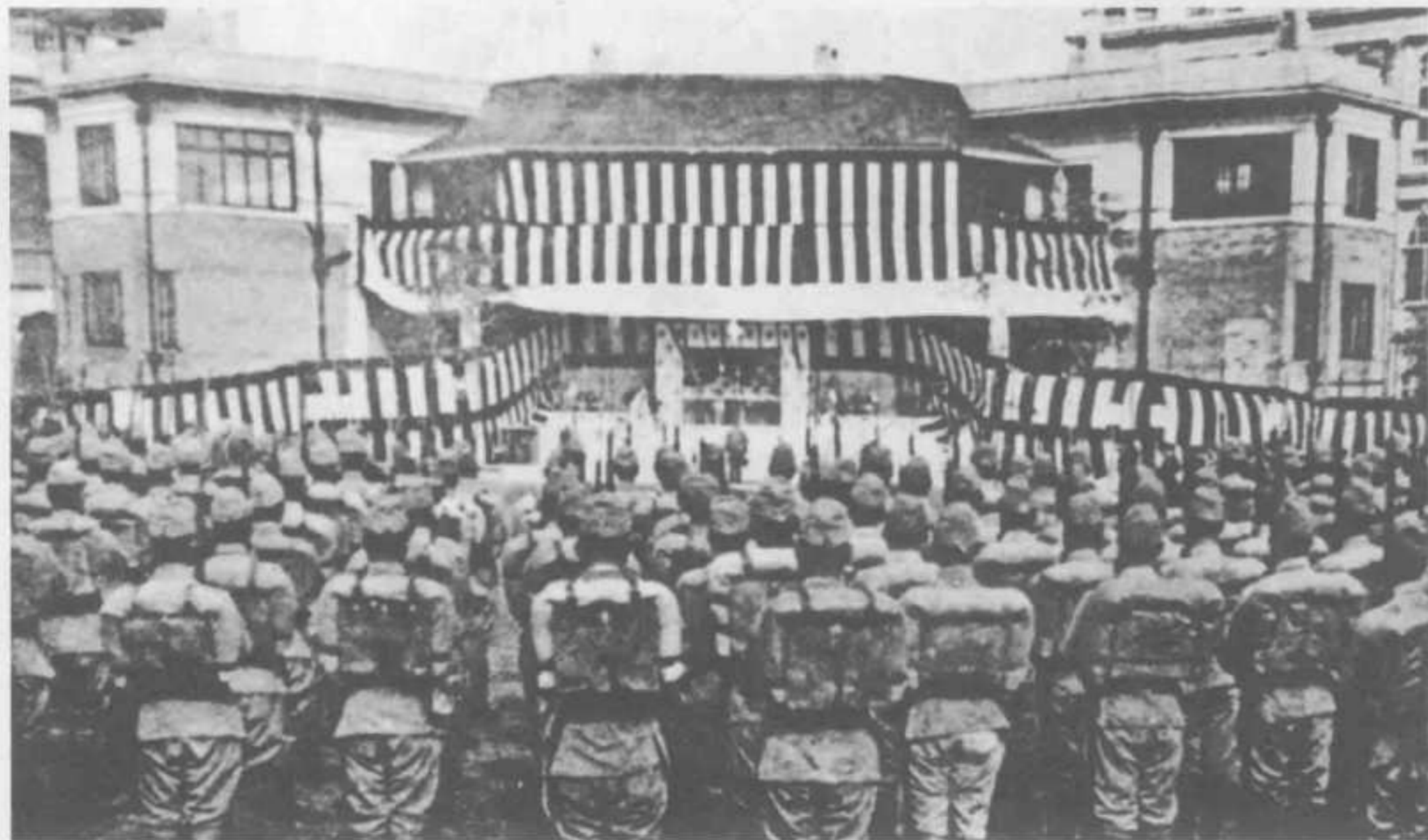


矶谷廉介

艰难岁月

沦陷后的香港，变成一个人间地狱。1942年2月20日，日本的“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督，总督之下的行政首长为总务长官，负责协调和监督政府各个部门，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道部、管理部、外事部等机构。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首任日本港督，总督部设在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军事总部设在九龙半岛酒店，宪兵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宪兵队队长及负责防务的防卫队队长，与总务长官同级。日本人还征召印度人和香港人当“宪查”，协助宪兵维持治安，搜捕抗日分子。

1942年，日军在香港木球场庆祝占领香港周年纪念





- 1 / 日军步入汇丰银行
- 2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
- 3 / 半岛酒店



矶谷廉介摄于占领地总督部前

香港没有成立华人的傀儡政府，最初由部分绅商成立一个名为“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的过渡组织，以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如粮食供应和维持治安等。后来，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由华人组成“华民代表会”和“华民各界协议会”（以下简称“两华会”），名义上代替了战前的行政、立法两局的角色，前者是矶谷廉介总督的咨询机构，后者负责向前者提供意见，共同承担“消除官民间隔阂”之责，实际上是协助日本人统治的傀儡组织，分别由香港社会名流罗旭和、周寿臣出任两华会的主席。

1942年1月的皇后大道中，一辆巴士被日占领地政府改作宣传车



諭 告

朕得香港乃英圖強佔我東洋之土地，以物質文明，鑿我東亞已經百年。現一類為我忠勇義烈之皇軍佔領，成其大日本之皇土。人類公敵之英國，使用無厭野心不逞企圖之香港地，經已挫折消滅。極其東亞其東亞其東亞也。夫大東亞戰爭終局最大目的，乃確係東亞之安定，進而實欲世界和平，謀其邦之榮耀。

故軍政府下之香港，今後之統治建設，應共同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一洗香港政府之恥，方能發揚東洋未來之精神文化，庶幾國民同休。 整理，而克重進固金之東亞永遠勝利之基礎。

本督特受香港佔領地總督之委任，今日親臨此土，當遵 聖旨，竭盡心力，以期無負使命。願其民永遠之福利，亦在大東亞戰爭全勝之後，現由各界民應忠誠愛護，各種聖戰之意義，切戒淫放，在皇軍治下，當盡努力，對於時局多所貢獻。凡我民不，如能奉公守法，挺身自勵，一秉東洋精神，完成大東亞戰爭之使命。本督當以知已待之，其有違反國義，不守國法者，乃東亞其東亞之公敵，亦我皇土之民，無論何種，無論何種，本督當以軍律處治，決不容恕。茲當奉任之始，特此通告知之，其各遵遵，勿違。

香港占領地總督 磯谷廉介

佈告 (一)

皇軍警備為治安上之關係、對一般店舖或民家之注意、若是皇軍警備隊到者、即時開門、若延遲是防害者、當局看做有抱敵意、絕對處罰、

一月廿七日 北警備隊長

1 / 日军告諭
2 / 日军佈告

为了表明香港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地政府在香港岛宝云山山顶兴建一座忠灵塔，纪念阵亡的日军，并使之成为香港的新地标。同时把香港改名为香岛，以昭和十六年取代西历纪年。总督发布的命令称为“香督令”，凡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一律改以“香九”为名；主要的街道、公园、酒店、商店等，都换上了日本名字，昂船洲变成了向岛，香港仔改为元香港，跑马地马场改为青叶峡竞马场，太子道改为鹿岛通，皇后大道东变成了东明治通，德辅道西易名为西昭和通，半山般咸道改为西大正通，宝云路改为雾岛通，半岛酒店换上了东亚酒店的招牌，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兵头花园易名为大正

日军在金马伦山竖立的忠灵塔



设于湾仔半山的“千岁馆”。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医生，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详细记录日军强征妇女做慰安妇的暴行。他写道：“江口上校（日本驻香港岛军官）的娼妓区域计划，被迅速实施及发展，他提议以五百妓女作为日本皇军的泄欲工具……”“我在湾仔中华旅馆门前，发现养和医院失去的救护车，我查问旅馆要此车何用，答谓载运妓女至香港大学作检查的……我见有不少日本兵在内，而妓女约有二百余人，这是一家供日军士兵泄欲的妓院……”^①

日本人的计划，是准备在香港建立500个慰安所，主要分布在湾仔骆克道一带，中环、金钟兵房及花园道口的旧美梨大楼、半山区、旺角，甚至人烟稀少的粉岭都有。日军竟然征用中学、教堂等处设立慰安所。在湾仔骆克道的多家慰安所内，就有一千多名慰安妇，除香港妇女外，还有从广东各县抢来的女性。不少慰安妇因不堪凌辱而自杀，或遭到拷打折磨，留下终身残疾。

因为日本人并没有把香港当作长久的殖民地经营，而只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战略要塞和南进的物资集散中枢，因此，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是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掠夺，所有“非中立国”的银行在门口插上一块“金融班管理”的牌子，就被没收了；很多饭店、住宅、商店、公司、当铺，特别是五金行和汽车行，日本人把“搜集部管理”的牌子一插，就归他们所有了。仓库存储的物资被抢运回日本，日本人还发起“献铜运动”，要求市民把家

^① 引自《香港慰安妇》，载《头条日报》2014年8月8日，<http://www.h1.com.hk/>。



1



2

- 1 / 日军占领时期，皇后像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被日军从基座上移走，图后方的建筑物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摄于20世纪40年代
- 2 / 准备运往日本的断手女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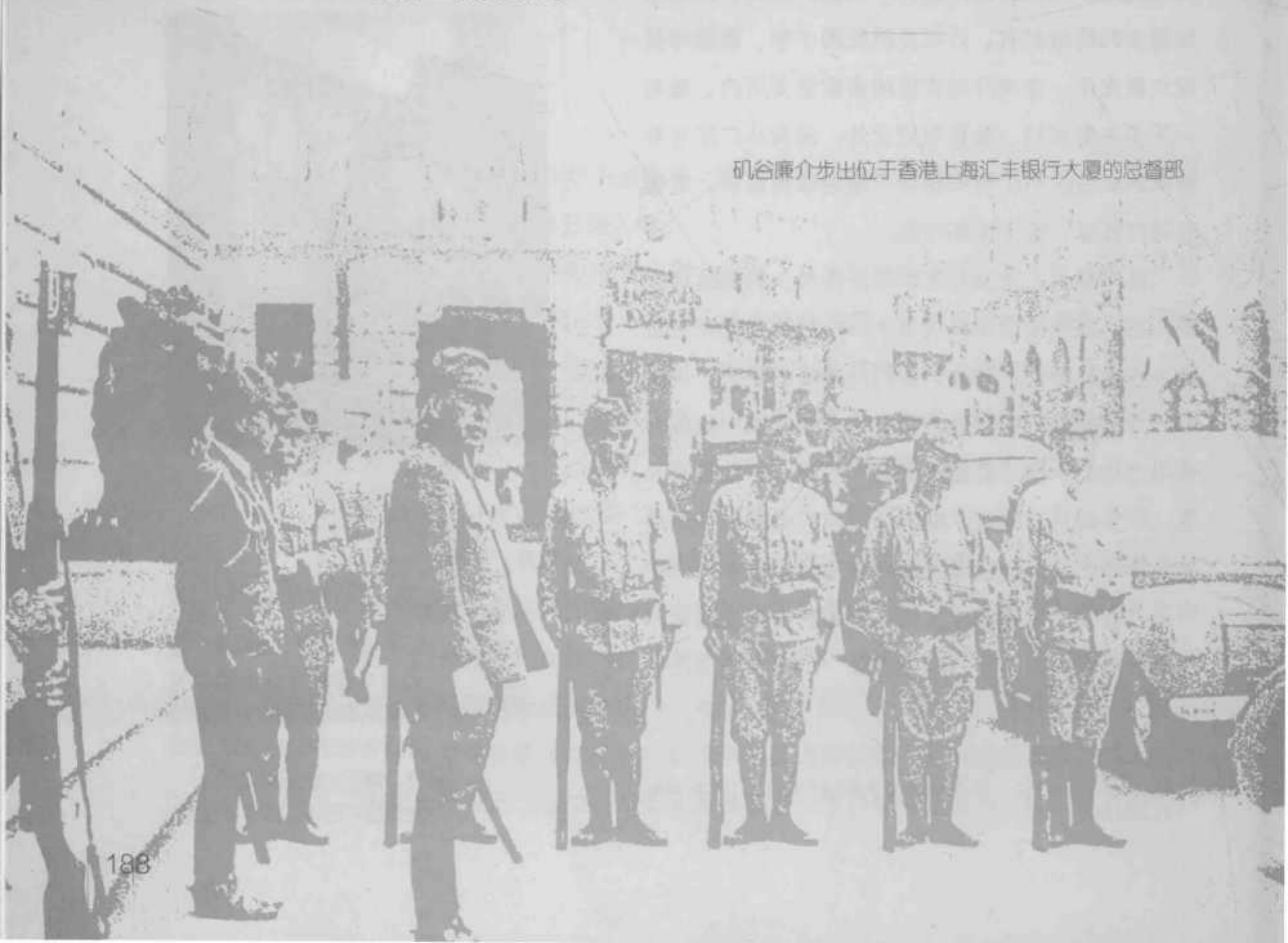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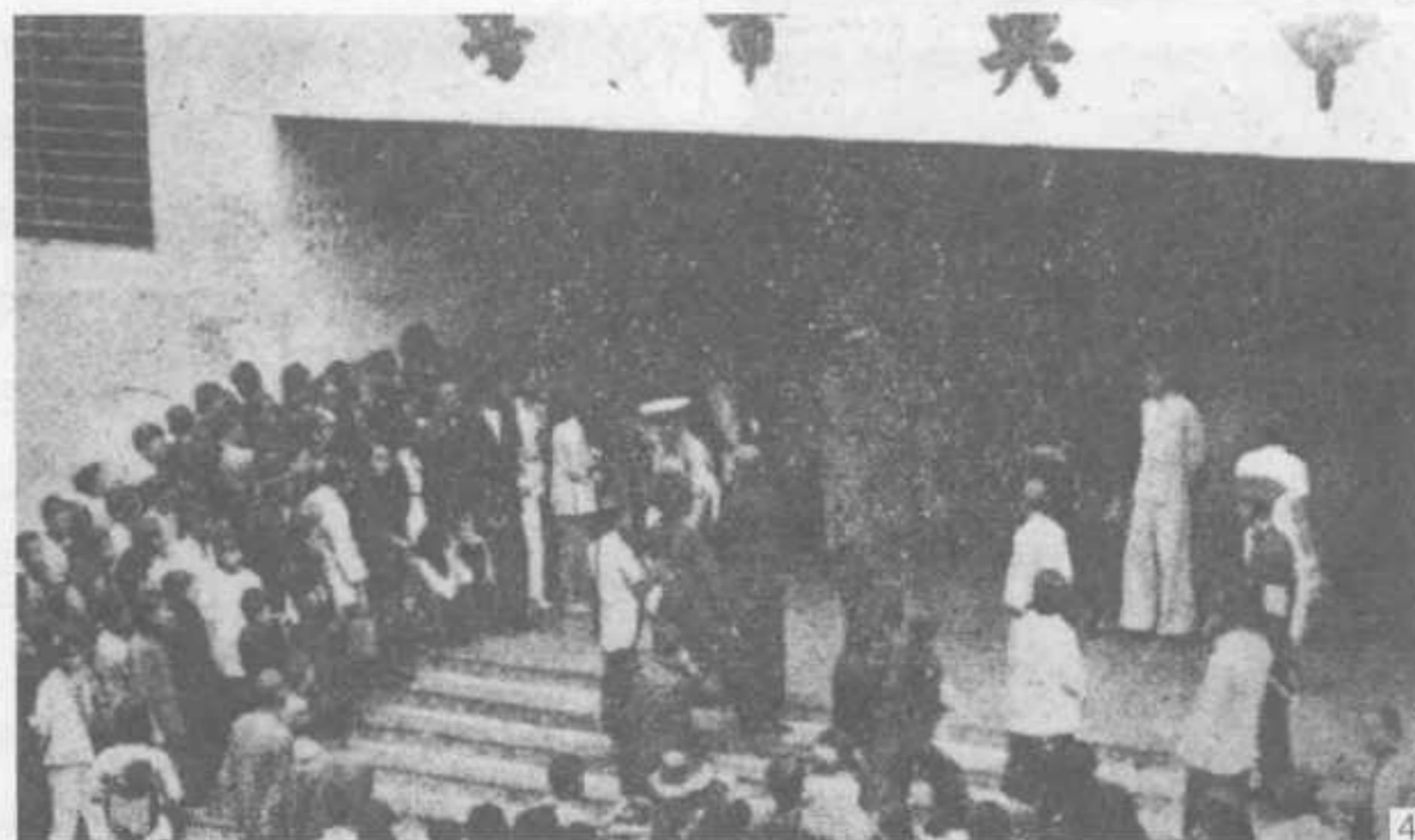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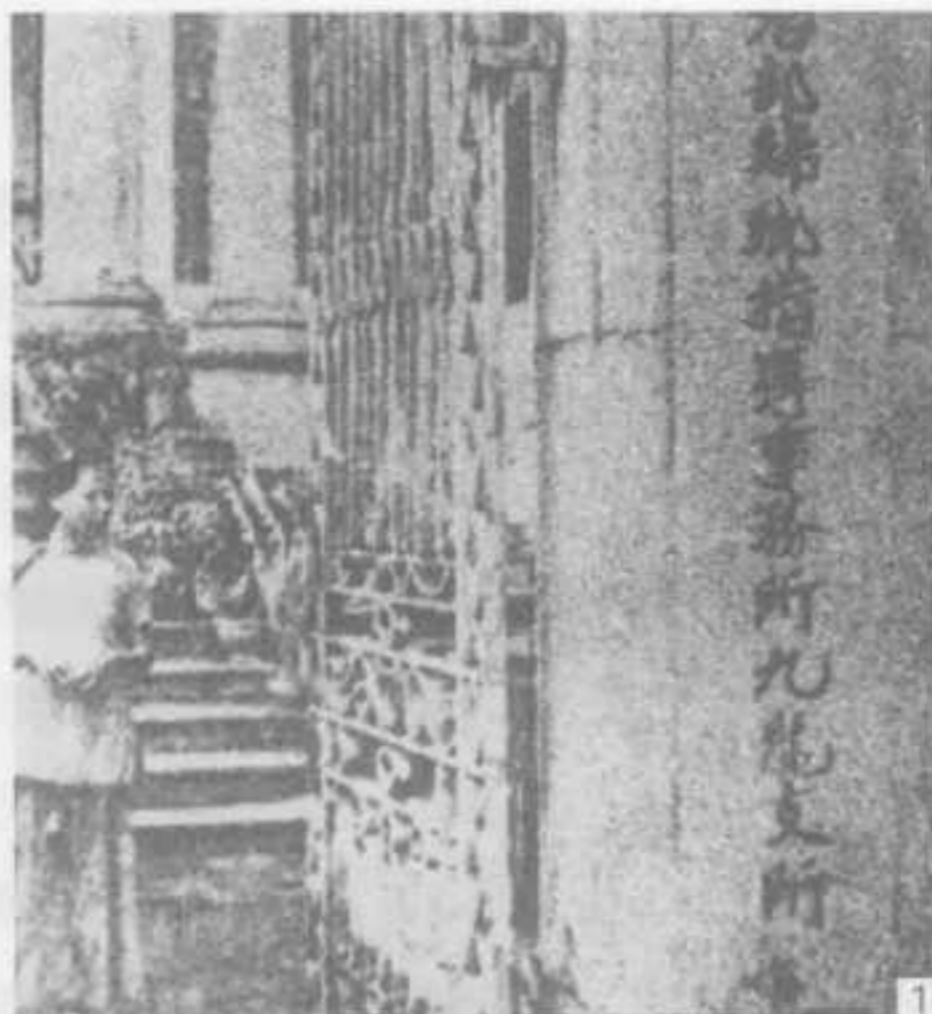
中的铜器献出来。

香港（包括港岛、九龙、新界）的一百五六十万人口，被日本当局视为沉重负担，民治部成立“归乡指导委员会”，计划把一半人口强行赶入内地。第一年估计就有50万人离港返乡。这种遣散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每天在广九线上，难民的队伍，见首不见尾，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恹恹惶惶，迈着蹒跚的步伐，朝着暮色昏暝的远方走去。许多人因为饥饿、疾病、劳累、绝望，熬不下去，在半路上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被土匪袭击、抢掠而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不计其数。

撤到韶关的广东省政府原来制订了一个对归侨的紧急救济计划，以三个月为一期。预计第一期的归侨为15万人，但到1942年2月，向政府登记的归侨，已达44万人。比预定人数增加两倍，没有向政府登记的或回到沦陷区生活的，更不知凡几，其中不少就是被强制疏散的香港人。到1945年，香港的人口仅余60万。

矶谷廉介步出位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的总督部





- 1 / 日军设立的归乡指导所
- 2 / 在西区上船离港的市民
- 3 / 在码头外等候回乡的市民
- 4 / 香港沦陷后，市民于铜锣湾避风塘旁抢购粮食的情形

然而，即使人口大大减少，但由于战争期间，正常的商贸活动几乎断绝，粮食供应逐渐困难。1943年以后，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还有大约两万名香港人和两万名中国内地人，被日军强行押到海南岛开矿，受尽虐待。在非人的环境中，成批成批死亡，到日投降时，海南岛的两万名华工，仅5000人幸存。

占领地政府以港英政府腐败，港币币值没有保证为由，宣布在香港使用军用手票，代替港币。最初的比率是1:1；没多久就贬到1:2，即1元军票兑换2元港币；1942年10月改为1:4；到1943年6月30日全面禁止港币流通，规定港人在限期内向台湾银行按1:4的定率兑换军票，严禁除军票以外的货币流通，甚至强迫港人将外币、黄金、珠宝兑换成军票，违者严惩不贷。但最可怕的是，这些军票都是没有准备金的，与白纸无异，强行兑换港币，等同强盗抢劫，许多家庭一夜之间，从小康沦为赤贫。

日军对全港的粮食供应实行管制，规定每人每天只配给六两四钱（十六两秤）大米，即每餐三两二钱米。其他副食品如油、糖、食盐等，亦采用配给制度。及至战争后期，日本在战场上渐渐处于下风，日子愈来愈不好过，香港受到严密封锁，粮食供应变得紧张，占领地政府改变配给制度，普通市民停止配给大米，改配绿豆，只有公务员和一些与战争相关的重要工厂的工人、修筑工事的泥工，才可获得大米配给。

1943年5月与1941年9月相比，砂糖价格涨19倍，食油涨15倍，大米涨10倍。到后期，涨风更是如脱缰野马一样，一路狂奔。在一些奸商囤积居奇的操弄下，市面米价暴涨，每斤从几元飞涨至两百多元，有如“白色恐怖”，人人谈米色变。饥民抢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港人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军用手票



在街头巷尾，时时可以看见饿死的人，横尸道旁；市场运冻猪肉的车，都被征用来运死尸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谣言，在市井流传散布，据说有人把新鲜尸体，割肉当猪肉出售，又哄传上海街有云吞铺，以人肉做馅包云吞；也有市民在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筲箕湾曾经发生这样恐怖的事情：一个年轻女人饿倒在街头，没有咽气，但她的大腿肉、胸肉和其他部位的肉已被人割去，眼睛还在一眨一眨。听者无不毛发倒竖。那些街市的阿婶阿婆都有经验，买猪肉一定要连皮的，否则分不清是人肉还是猪肉。一位香港人回忆：

还记得，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曾忆述，当年他的家人有一趟到肉店买猪肉，肉贩子随手切下了一大块，他的家人拿回去后珍而重之地弄好，并放在饭面上蒸熟。吃饭时将整碟“猪肉”取出，却赫然发现偌大的一块肉竟缩成了一小片，据说这是人肉才会有的现象！此刻他们才惊觉在肉贩处买来的，极可能是一块人肉。事关在日治时期的香港，恐怕是猪肉难求，人肉易得，贩子将人肉充当猪肉出售，以图鱼目混珠。^①

对那段日子，另一位香港人也有着同样悲惨的记忆：

一天，父亲出门工作，见前门躺了几具死尸，他胆子小，不敢走前门，改走后门，怎料后门也有几具死尸，他吓得退回屋里头，不敢出门，可是一定



一所“总督部指定港九白米配给所”

1942年的一张纳粮银单据



① 陈伟强：《香港人吃人的一段日子》，载《太阳报》2012年10月5日。

要谋生，后来只好硬着头皮，跨过死尸出门。

父亲目睹一个女人被日军押着游街示众后杀头。这个女人被揭发偷人家的婴儿回家宰杀煮吃。父亲描述这个女人当时很镇定，她太饿了，杀婴煮吃太凶残，吃过人肉的人眼睛会冒出吓人的绿光。

父亲又说，当时如果在路上有人呕吐，马上有人扑过来把呕吐物吃掉。

他又提到一个诨号杀人王的日本军官。

死人很多，日军怕引起瘟疫，很重视地方清洁，要求市民隔日洗街。我家这个区杀人王经常出来巡视，见不够清洁，命令士兵把户主抓出来，不由分说拔出武士刀当场砍杀。

有些人被杀的一刹那仍然站着，身首异处，鲜血如泉涌出丈外，甩掉脑袋的身体，自然反应地仍可向前走几步，才倒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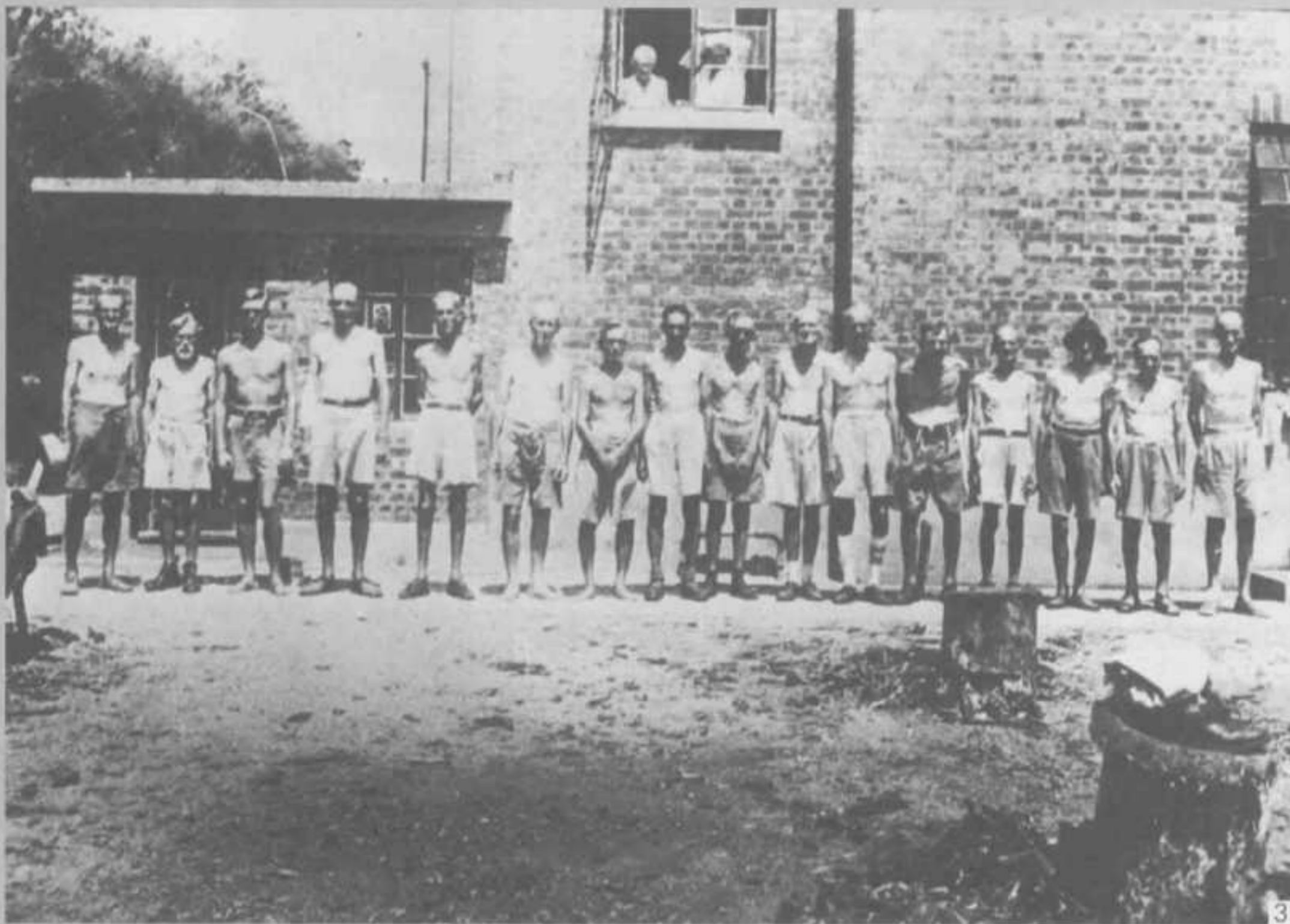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披露的数字，志愿者每天在香港市区街道上收集到300~400具无主饿殍，最高纪录是一日收到731具。日占时期，因饥饿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万多人。

日军嫌战俘消耗粮食，遂随意虐待。留港的战俘大都被迫从事如修建道路、扩建机场等苦役，白喉、脚气病等非常流行，其中以深水埗战俘营为甚，1942年便有100多名战俘因而死亡。

1942年5月19日，日军集中营约10 000名囚犯被日宪兵送至西环，押上19艘船，关闭在舱底，19艘船由一艘小型火轮船拖带开行，出海不久即遇大风，日宪兵斩断轮船拖缆，任由19艘船随波漂流，最后14艘沉没，约3000人葬身鱼腹。另有一艘船亦破损严重，多人死伤。一些坠海者虽拼尽力气游回岸边，但因无人拯救，最后大部分都死在沙滩上。

除大米外，木柴也是凭证配给的。当时普通港人的日常生活，仍然以柴炭煮食为主，市面上供应的多是质量很差的杂柴，又称“山打根柴”，但价钱却贵得惊人，堪称“炊琼蕪桂”。然而，1943年以后，连“山打根柴”的来源也渐枯竭，狮子山上的林木被砍伐一光，只能靠新界和离岛的山柴供应。于是，

^① 普通一丁：《日本占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父亲传略之二）》，<http://www.backchina.com/blog/257122/article-23597.html>。



1 / 战俘
2 / 被押往拘留营的战俘
3 / 赤柱拘留营里的俘虏



日军拘捕西方银行家,并将他们囚禁于中国旅馆

鼠窃狗偷之辈便盯上了筲箕湾、西湾河、湾仔大坑、西营盘、西环等地，那些被强制疏散走的人家遗下的住宅，趁人去楼空，破门而入，把门板、窗棂、楼板、桌椅、箱柜，甚至椽子、梁柱等木料，统统锯断盗走；有些山野荒坟，也被人掘开，劈烂棺木，当木柴出售牟利。皇仁书院、庇理罗士女书院、英皇书院等学校的桌椅均被拿走，许多书籍地图册簿，都被人偷出来当助燃的废纸，论斤贱卖。由于燃油紧缺，电力只能有限供应，1943年总督部下令，晚上只许在20时至23时亮灯。

霍英东的母亲刘氏，原来和别人合资购置了一条名为“兴和”的小火轮，用于驳运货物。日军一来，小火轮被强行征用了，霍家的生活来源立告断绝，陷入了困境。居民口粮改为绿豆、浆粉。米饭已经从饭台上消失了，代之以木薯粉、番薯藤和“神仙糕”（一种难以下咽的代食品）。

霍家和千千万万香港小市民家庭一样，在苦海中，载沉载浮，挣扎求存。最初霍英东把家里的值钱



日军在香港戒严的街道上巡逻



东西拿到街上摆卖，但后来能卖的都卖光了，家徒壁立，山穷水尽。他四处找工作，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轮船上当锅炉工。锅炉房在船舱底部，炉火熊熊，没有任何降温设施，许多人干着干着就中暑倒下了。霍英东的工作，就是在炉前加煤、出渣。虽然他出身于水上人家，但从6岁入塾开始，大部分时光，都在校园度过，不曾做过体力活。加上体质不好，营养不良，体重只有40多公斤，根本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最后被老板解雇了。

其后，他又在太古船坞做过打铁工、风炮工，又到太古糖厂化验室当过试糖工，在粮油仓库做打哩（给大米过磅），但每份工都做不长久，不是自己体力不支，被迫辞工，就是被人炒鱿鱼。

香港十室八九穷，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当时日军要修复启德机场，需要大量碎石，把香港著名历史遗迹——宋王台炸毁，石块用于修筑机场。宋王台是南宋皇帝当年南逃至伶仃洋边的時候，在海边一块巨石下休息，后人在石上刻上“宋王台”三字，纪念这位蹈海而亡的皇帝。霍英东也在启德机场做过苦工，日本人付给工人的日薪是0.75元军票，扣除伙食后，只剩下0.55元。霍英东从谢菲道的家去启德机场，要在天星码头渡海，船费一角钱，来回两角，每天就只剩下0.35元。这区区的0.35元，成了霍英东每天步履趑趄地出门的唯一动力。

霍英东后来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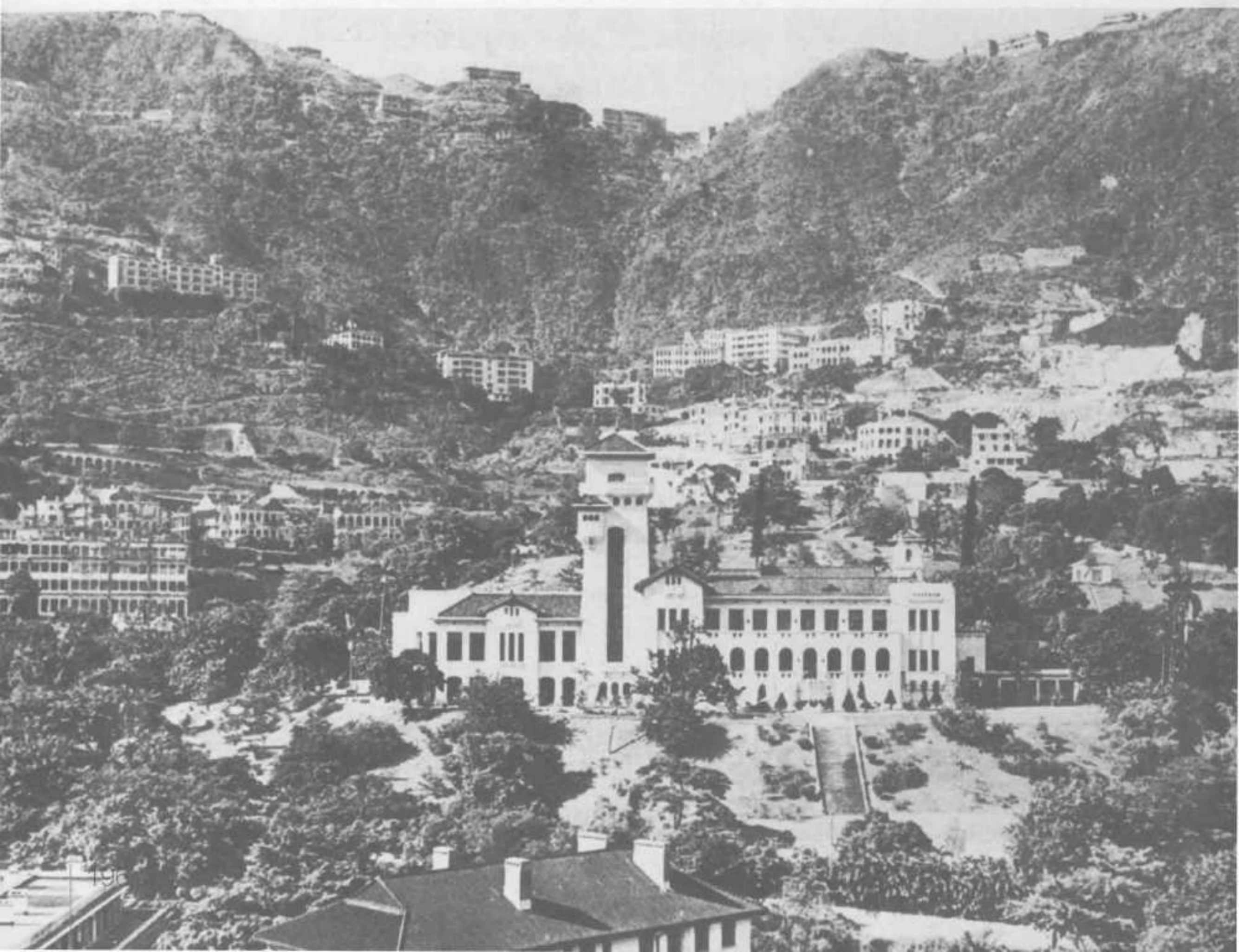
日军占领香港，环境完全改变了，变得比以前更贫穷，更困苦。生活所迫，我每天到船坞、机场当苦力。起初配给“六两四”口粮，已不足糊口，后来米粮更见缺乏，吃木薯粉、番薯藤、“神仙糕”，更是有气无力的。有一次要搬一个电油桶，铁桶掉下来，把我一个指头压爆了。如此度过了苦难的三年零八个月。^①

① 霍英东：《我与体育运动》，载《我的参与》，霍英东基金会，2003年版。

像霍英东这样际遇的香港人，遍地皆是，在茫茫苦海中，挣扎浮沉。直到战争结束，启德机场的修复工程也没有完成。但为这个工程而累倒、累死的香港工人、战俘，已经一批又一批了。

虽然海牙《陆战法规惯例条约》等国际法，明文禁止交战各国对一切文化教育机构施行破坏，但在沦陷时期，香港文化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很多有名的学校如华仁书院、中央英童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喇沙书院、圣士提反书院等，都被强行征用成为日军的医院或战俘营。有些学校甚至被日军当成斩杀犯人的刑场，如拔萃男书院，有些竟然被征用做慰安所，实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香

港督府在沦陷时期被改作他用。此照片曾被政府用于制作官方圣诞卡，于1945年11月摄



港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8万人跌至1945年的只有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都陷于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本人一来，关闭了615所，只剩下34所。

就在这仅有的34所学校里，推行的也是清一色的皇民教育。日语被规定为必修课程，中小学每周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日本的文化礼节及国情等，也都成了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在高小的中文科课文中，塞满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内容。

日本人还成立了60多所日语讲习所，鼓励开办私营的日语学校，规定凡日伪机构或日资企业招聘华人时，能说流利日语者，不但优先录用，还额外配给粮食。日本人强迫教师参加日语考试，不合格的须接受3个月的日语培训，否则就要辞退。唯一的高等院校只有东亚学院一所。

在沦陷期间，香港的报业一片凋零，只有《南华日报》《香港日报》《星岛日报》等寥寥数家。

然而，中国人是不会接受奴化教育的。著名诗人戴望舒，曾经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担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沦陷后，戴望舒被日军以“宣传抗日”罪名逮捕，投入大牢。在狱中，他怀想故国，一腔愤激郁闷之意无所发舒，托于歌咏以自见，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报纸揭露日军的残暴



1 / 港九独立大队蔡国梁大队长
2 / 港九独立大队陈达明政委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
那里，永恒的中国！

港九独立大队

国难方殷，外患日亟，一场抗敌救亡的神圣战争，正如风行水涌，在港九地区迅猛地展开了。

1941年12月，当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九龙时，两支活跃于东江的抗日游击队，已蹑尾开入新界，他们在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的带领下，收集英军撤退时散失的武器弹药，武装自己，迅速在新界、九龙建立据点，同时在西贡圩设立地下联络站，统领起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新界原居民子弟纷纷加入这支队伍。1942年1月，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一支主力大队和四支地方大队。

港九独立大队（以下简称“港九大队”）是四支地方大队之一，于2月3日在新界西贡半岛鸡公山腰一



1 / 港九独立大队鲁风副大队长
2 / 黄作梅

条僻静的小村——黄毛应村正式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同年底，鲁风调任港九大副大队长。蔡国梁是香港工人出身，陈达明是迁往香港的广州大学经济系学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毕业于皇仁书院。队伍中不少人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儿女。

尽管与这一年正面战场上的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相比，区区数百人的港九大，不过是“米粒之珠”，但“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历史不应忘记，在香港这块地方，曾经有过这么一群人，曾经为民族做过一些可歌可泣的事情。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并不因他们人数不多，或活动区域不大而有损分毫。

港九大队的旗下最初有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长枪队主要活跃于沙头角地区；海上队活跃于西贡半岛沿海，负责海上交通；而短枪队到1942年底，已发展为西贡、沙头角、坑口和元朗4支短枪队。初期短枪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撤离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社会精英，在这个任务完成后，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和土匪。后来发展到有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市区中队、西贡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六支中队，六百多名队员。

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召开联席会议。2月25日，会议收到周恩来的电报，经中央批准，抗日游击总队的领导成员名单确定下来了，曾生任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梁鸿钧任参谋长，杨康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些电报来得正是时候，人心大



曾生和夫人阮群英1938年12月中旬在坪山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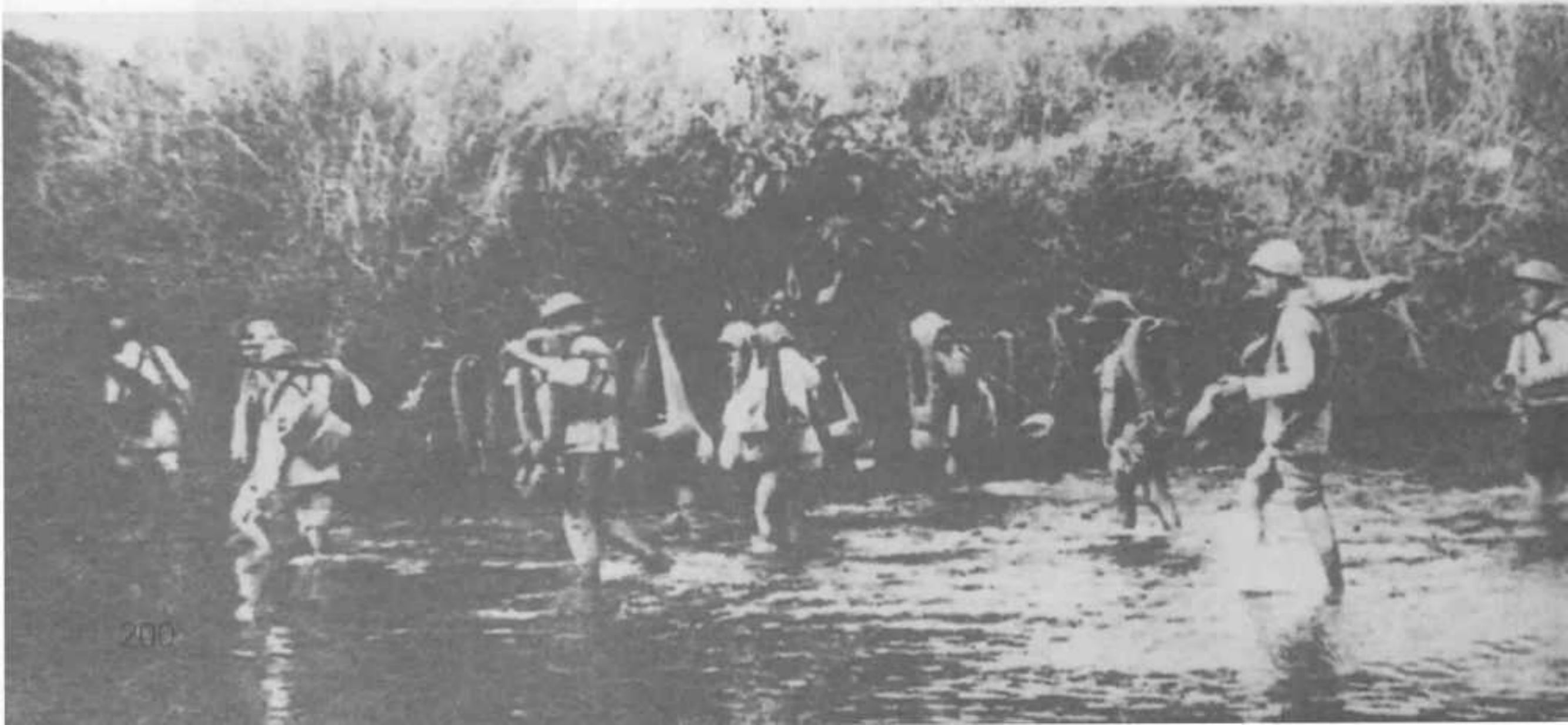
东江纵队在行动

振。

对于游击队是否公开亮出中共旗号，会议对东江形势做了评估之后，认为“应该亮出”。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9月各大队开军人大会公布，接受共产党领导；第二步，在10月正式向外公布。

正如曾生所说，乌蛟腾会议是“克服困难，扭转被动，走向主动的重要会议”。会议之后，为了“闯出胜利发展的新局面”，抗日游击队开始四面出击，猛烈地扩张着自己的队伍与地盘。

惠阳大队挺进梧桐山，开辟新的根据地；独立中队深入稔平半岛，并扩建为护航大队；路西的珠江队也频频出击西乡、福永；宝安大队连续进袭固戍、沙湾；第三大队把宝太公路搅得天翻地覆；罗浮山区也亮出了“第二独立大队”的旗号，活跃于增城和博罗之间。从乌蛟腾会议之后，至这年年底，抗日游击总队一共打了大大小小八十多场仗，不仅恢复了惠东宝





东江纵队的游击战士们



港九独立大队在行动中

根据地，而且把地盘扩大到莞太、宝太公路、广九铁路沿线、大鹏湾、大亚湾，建立了港九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整个粤东地区，遍地烽火。

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惠阳县土洋村宣告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联名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东

三个港九独立大队小战士





江纵队成立时，下辖七个大队，共三千多人。

港九大队是东江纵队的一个大队。它成立后，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宣传抗日主张，办文化夜校，组织抗日联防会、妇女会、兄弟会、儿童团、游击队之友等群众组织。南涌、鹿颈、乌蛟腾等村，几乎每家都有人出来帮助游击队工作或参加港九大队，甚至一些伪政权也在暗中向游击队输诚，充当两面政权，公开为日本人服务，暗中为港九大队服务。

港九大队建立初期，主要活动范围在西贡的赤径、嶂上；沙头角的南涌、乌蛟腾；元朗的八乡、十八乡等地和一些远离圩镇的山区。经过不懈努力，渐渐把旗号打响，活动范围不断扩展。西贡区扩展到沙田地区，直到九龙区；沙头角区则扩张到铁路线上的上水、粉岭、大埔等圩镇附近；而元朗区的荃湾、屯门、大水坑等，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边界附近行军

都成了他们出没之地，已迫近了九龙市区。

据《东江纵队史》所载，1942年初冬，短枪队在狮子山下伏击日军一个班，重创敌人；在茶果岭小冷室，短枪队击毙两名日军密探；在西贡的北围，短枪队截击敌人，击毙一名日军翻译和两名宪查；在牛池湾，短枪队化装成客家妇女，接近日军哨所，歼灭了哨所内的日军伍长和宪查16人；短枪队又化装成日军密探，深入九龙市区，在金棠酒家击毙汉奸特务肖九如。游击



海上中队短枪队员李坤化装成女村民执行侦察任务



1



2

1 / 四名女游击队员

2 / 手持驳壳手枪的一名港九独立
大队游击队员

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次行动，是由刘黑仔扮成日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驶到九龙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把一条写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横幅，悬挂在司令部的门口，造成极大的轰动，敌人肝胆俱寒，民众拍手称快。

刘黑仔是港九大队中一位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刘锦进，大鹏镇东北村人。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三。父母早逝，11岁进本村小学读书，1934年毕业。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一员。他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射击神技，有“神枪手”之称。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12架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保卫下，从桂林起飞，奔袭香港日军的启德机场。当日战况激烈，日机起飞迎击，双方在空中展开短兵相接的厮杀。引擎咆哮声、机枪声、爆炸声，压过了北风的啸声。据港九大队的情报，盟军飞机击落了日机3架，并炸毁了红磡船坞，但有15颗500磅炸弹落在大同厂附近，死伤20余人。中美联合空军飞行指挥兼教官敦纳尔·克尔（Lt. Donald w. Kerr）中尉的飞机中弹起火，被迫跳伞逃生。当他落地后，被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一名14岁的小交通员发现，迅速把他藏进了观音山外的芙蓉别村的一个土坑里，然后跑回村报告。

当晚，日军由九龙派兵数百，分乘10辆军车，直扑西贡圩，封锁交通，不准乡民出入，一连两天展开大规模的“梳篦行动”，搜捕克尔，甚至以放火烧山威胁，但始终找不到这位美军飞行员的踪影。为了打击敌军的气焰，2月13日晚，刘黑仔带着三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兵，闯到日军翻译家里，把这个汉奸押到小街口处决，并在现场留下一张纸条：“枪毙大汉奸者刘黑仔也。”

日军恼羞成怒，出动更多兵力去搜捕，并对村民进

行报复。刘黑仔决定“搞单大嘢（大行动）”，袭击日军戒备森严的启德机场，并由游击中队配合爆炸亚皆老街四号铁路桥、九龙宪兵总部附近的十二号铁桥，实行“围魏救赵”之计，逼使搜捕克尔的日军撤回。经请示大队批准，刘黑仔率短枪队执行夜间袭扰任务。他们潜入机场附近，袭击岗哨，乒乒乓乓地放枪，炸毁了一座油库和一架飞机。日军大为震骇，搞不清游击队的进攻规模有多大，只好匆匆调兵回防。

一周后，克尔的伤势已有好转，刘黑仔把他接到港九大队的嶂上村，准备送往宝安抗日根据地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一路上要穿越重重封锁，他们尽可能隐蔽而悄静地穿过日军防线。但经过九龙塘时，刘黑仔决定要给敌人留一点教训，因为这里的日伪据点，平日作恶多端，乡民早已恨之入骨。刘黑仔化装成日

左起为：黄作梅、刘黑仔、曾生、林展、尹林平



本军曹，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大摇大摆地闯进九龙塘的岗楼，迅速解决掉几个守兵，又迅速离去。

刘黑仔把克尔送到海边上船，转移到东纵司令部。2月底，东纵司令员曾生派人把克尔中尉送到桂林大后方。5月，美军轰炸机在袭击拜亚士湾日本运输舰时被击中，又有五名飞行员坠海，被当地渔民救起，护送到东纵司令部，游击队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后方。

《前进报》刊登了这条消息：

5月26日，我海上队在大亚湾海面救了五个盟国美籍机师，他们是美国在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是日晨7时由桂林起飞的，同行的还有一机，目的是轰炸敌人的运输船。9时许，在大亚湾辣甲岛附近发现了敌浅水舰两只及敌船数只，便开始低飞轰炸。敌舰一只被炸伤（据渔民报告：一铁拖被炸沉）。但在战斗中，他们的飞机也给敌舰的机枪射中，伤及机器，被迫降落，用橡皮艇逃生，遂为我队救护。其中二名手脚受轻伤，经我敷药治理，并殷勤招待，他们十分感激，休息了数天，已于本月×日由我派队护送转返韶关回桂林去了。^①

东纵先后营救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三舰队的八名美国飞行员，受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的高度赞扬。克尔和另外获救的五名飞行员分别给东纵写了感谢信。克尔的感谢信写道：

在我的飞机给敌人击中着火，而我跳伞落地上以后的几天，我感觉到我的情况是几乎绝望的，但是自从在你们的照料之下，而时间安全地过去，我逐渐感觉到极安全了，我带着日益增长的奇异来看你们这个庞大组织的力量，机巧、认真、精明和勇敢。当然，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你们和你们的工作，但因为这些的大部分必须保守

克尔中尉夫妇



① 《前进报》1944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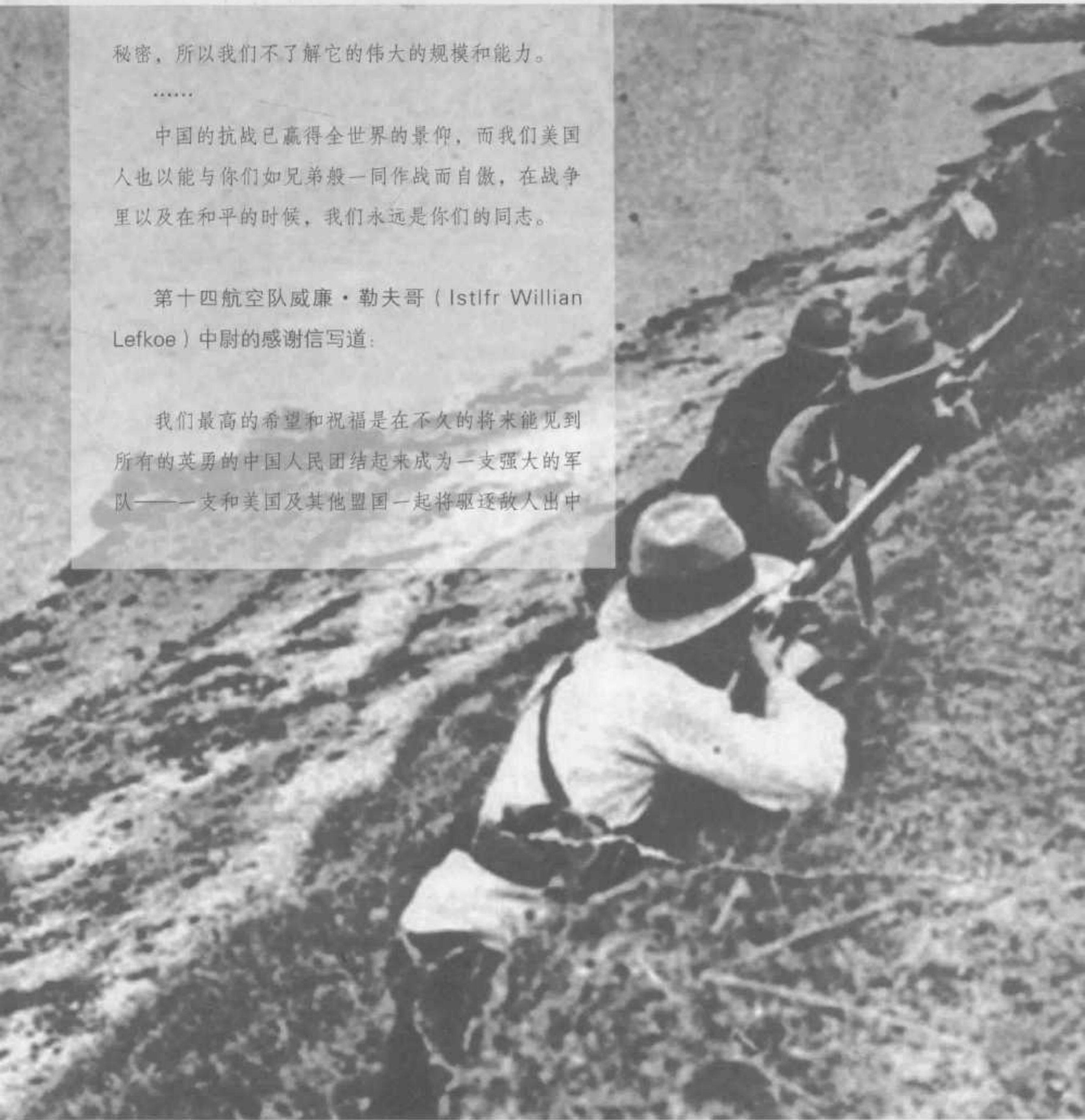
秘密，所以我们不了解它的伟大的规模和能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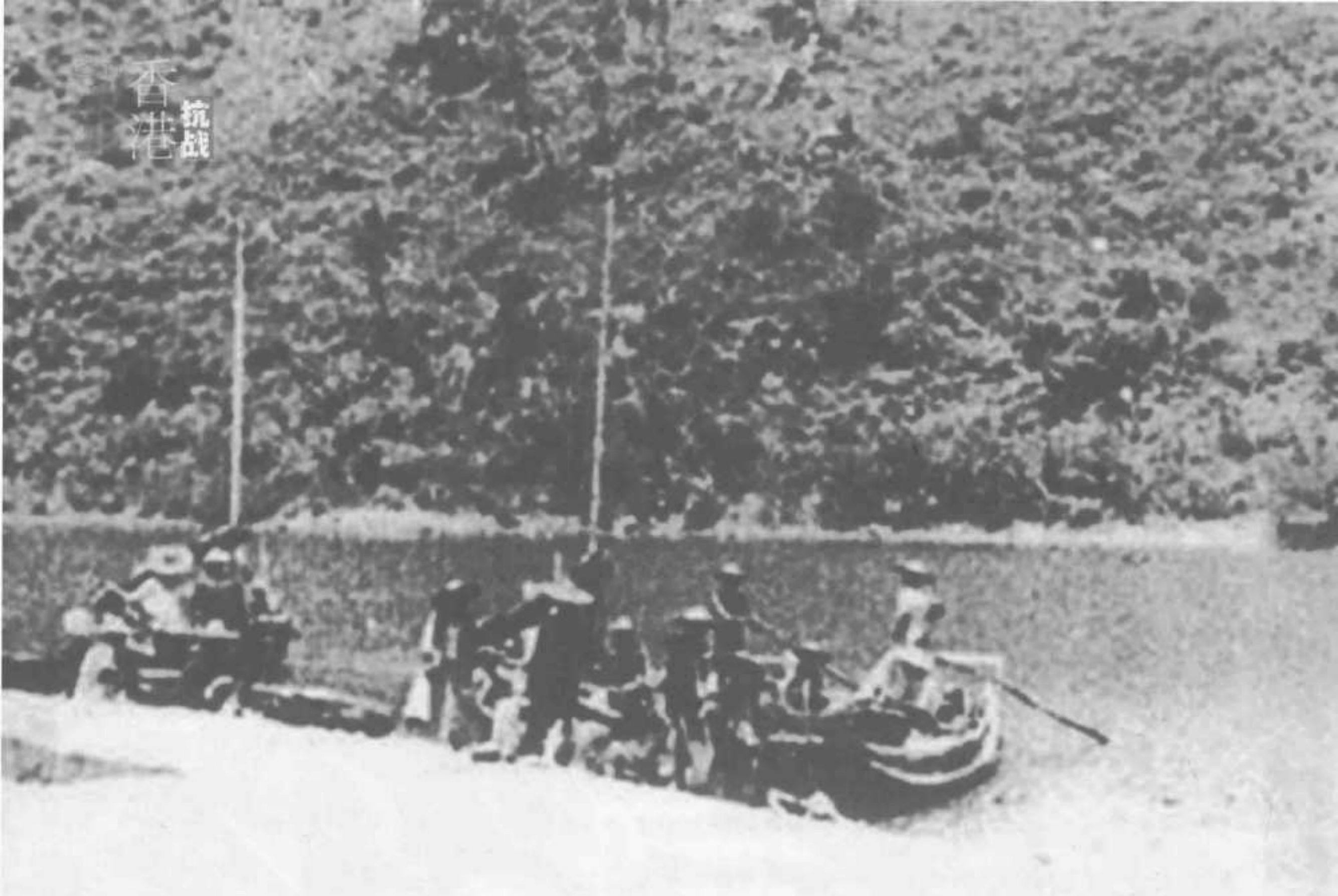
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第十四航空队威廉·勒夫哥 (1stlfr Willian Lefkoe) 中尉的感谢信写道：

我们最高的希望和祝福是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所有的英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支和美国及其他盟国一起将驱逐敌人出中



战场中的东江纵队



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

国所有土地的大军，一支英勇战士构成的，而他们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她所应有的强大的大军。^①

港九大队在海上和陆上神出鬼没，令日伪疲于应付。1943年11月下旬，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西贡以东果洲海面，发现日军机帆船拖着一条“大眼鸡”船，向香港方向行驶，海上中队的两艘游击船立即靠近攻击，迫使日军斩断拖缆，仓皇逃去，海上中队缴获了“大眼鸡”上的大批高丽参和数十吨白报纸。

1944年4月13日前后，港九大队派人潜入港九城乡各区，一连几天，在旺角、深水埗、大角咀、油麻地、筲箕湾、中环、荷里活道、十五殿、土瓜湾、红磡、铜锣湾、鹅头桥一带，散发《告港九同胞书》及各种传单，多达2.8万余张，大大震动了日本当局。

4月21日，港九大队成功炸毁了九龙区旺角窝打老道的第四号火车铁桥。据

^① 黄作梅：《我们与美国盟邦的合作》，载《胜利大营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

《前进报》报道：“当时夜深人静，轰然一声，震动全港，市民均从梦中惊醒；敌寇则惊心胆丧，当夜三时许，即动员全港宪查，集中九龙方面，至翌晨六时，始敢施行大戒严，九龙交通，完全断绝。”^①对日伪的震慑力之大，可想而知。

5月，港九大队在坪洲海面攻击一艘日军机帆船，迫敌逃遁。8月16日，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出动两艘游击船，夜袭停泊于沙头角对海黄竹角海面的伪海上挺进队船只。经过激战，击沉敌船3艘，毙伤敌人38名，缴获轻机枪2挺，冲锋枪4支及一批长短枪。日军匆匆派出炮艇增援，企图追击海上中队，但港九大队早已埋伏在南澳港湾山上，以轻重机枪火力封锁海面，逼退了日军。

11月30日，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大鹏里岩角，发现一艘日海军运输船，海上中队三艘游击船立即摆开品字队形，全速展开攻击。突击组长曾佛新一马当先，抢登敌船，不幸中弹身亡。其他队员依然奋勇争先，冒着枪林弹雨，从两舷强行登上敌船，全歼船上敌人，俘敌7人。

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最初作战用的木船



① 《前进报》第59、第60期合刊，1944年5月11日。

曾生司令员在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盟国的空军在广九沿线的空中打击敌人，我们则在海上陆上打击敌人，大家都为着消灭日寇的共同目标而奋斗。虽然这个斗争的配合还不能算得密切，但从目前的形势来说，我们已尽了应有的任务，这就是抢救在空战中降落沦陷区的盟国飞机师、香港地区被俘虏的盟国人士、被奴役的印度士兵。在前一件工作中，二月间从敌人的重重包围搜捕之下，救出了美国空军克尔中尉，五月间又救出了美国空军列夫柯中尉、拉维星尔中尉、爱利斯技士、康剥军曹、石克军曹；在后两个工作中，八月间救出了英国海军葛云上尉，并前后救出印籍官兵34名。盟国人士感激不尽，对我队在这里坚持斗争，在国际上作了生动的报道。”^①

进入1945年，港九大队对日军的进攻，比以往更加猛烈。

1945年5月2日，海上中队攻击停泊于大鹏湾水头沙湾的日军运输船和“大眼鸡”船，他们化装成渔民，在夜间发起突袭，强行登上敌船，全歼敌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6支和一批物资。击毙日水兵8人，俘虏6人，解救中国船员28人。

8月，港九大队三艘游击船在海上巡逻时，在大浪口发现一艘日军运兵船，游击船即以品字队形，向日军展开攻击。但运兵船上火力极猛，海上中队有3名队员牺牲，2名队员重伤。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击沉敌船，日军除2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葬身鱼腹。战后打捞到1门日式山炮、6支步枪和1台无线电发报机。

据历史记载，活跃于珠江口的大屿山中队海上小队，在元朗中队海上小队的配合下，从1944年春至1945年夏，先后缴获日军运输船、机帆船22艘，大大补充了自己的物资；东纵的海上部队共俘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多人，俘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百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1门，各类物资一大批。

今天，在西贡斩竹湾西北的山冈上，耸立着一座抗日英烈纪念碑，便是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无畏战斗、英勇捐躯的港九大队战士和当地乡民。纪念碑背倚长山，面朝三丫口避风塘及濠西洲，依山傍水，地势雄壮，四周

^① 曾生：《一年来的对敌斗争》，载《深圳档案文献选编》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曾生题字），建于1988年

种满英雄树、青松、翠柏，隆冬苍翠不凋，郁郁葱葱；春季木棉花开，红浪怒翻，有如丹霞映日。碑园西侧有巨大的石书，镌刻着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

纪念碑以步枪为形状，象征坚强的抗日力量，基座铭文曰：“抗战胜利，倏忽四十余年，往者已矣，我辈每念往日游击战士与地下工作者，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前赴后继，献出生命。据可查考者已有七十人，黄土长埋，默默无闻者，尚不止此数。抗日先烈以鲜红热血谱写壮烈史诗，皆应铭记表彰，以慰英灵，以昭后世。”悲怆壮丽的浩然之气，充塞于蓝天碧海之间。

铁鹰与猛虎

香港是日军在南海上的重要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补给基地，对整个华南地区乃至太平洋地区的战局，影响至巨，因此，被盟军列为轰炸的重要目标。

第一次对香港的大空袭，发生在1942年10月25日。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前身即赫赫有名的“飞虎队”）二十多架

B-25C轰炸机、P-40E战斗机，从昆明起飞，中途在桂林补充燃料后，从桂林出航，沿非沦陷区上空潜行，当接近南海海岸线后，迅即沿海岸飞向澳门，横穿香港西部海峡，到达九龙半岛北部，然后向南进入轰炸航线。

这次空袭由于情报不准确，美军飞行员对地形不熟悉，B-25C轰炸机进入九龙后，竟把大部分的炸弹投到九龙西部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一颗颗200多公斤的重型炸弹，雷鸣般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到处升腾起巨大的火球。一颗250公斤级的炸弹，最低限度可以激起100立方米的砂土，造成五六米深、直径约12米的漏斗型深坑。100立方米的砂土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其破坏力是惊人的，周围6米范围，都属于“土壤震幅威力圈”，无数房屋被炸得像纸屑一样漫天飞舞，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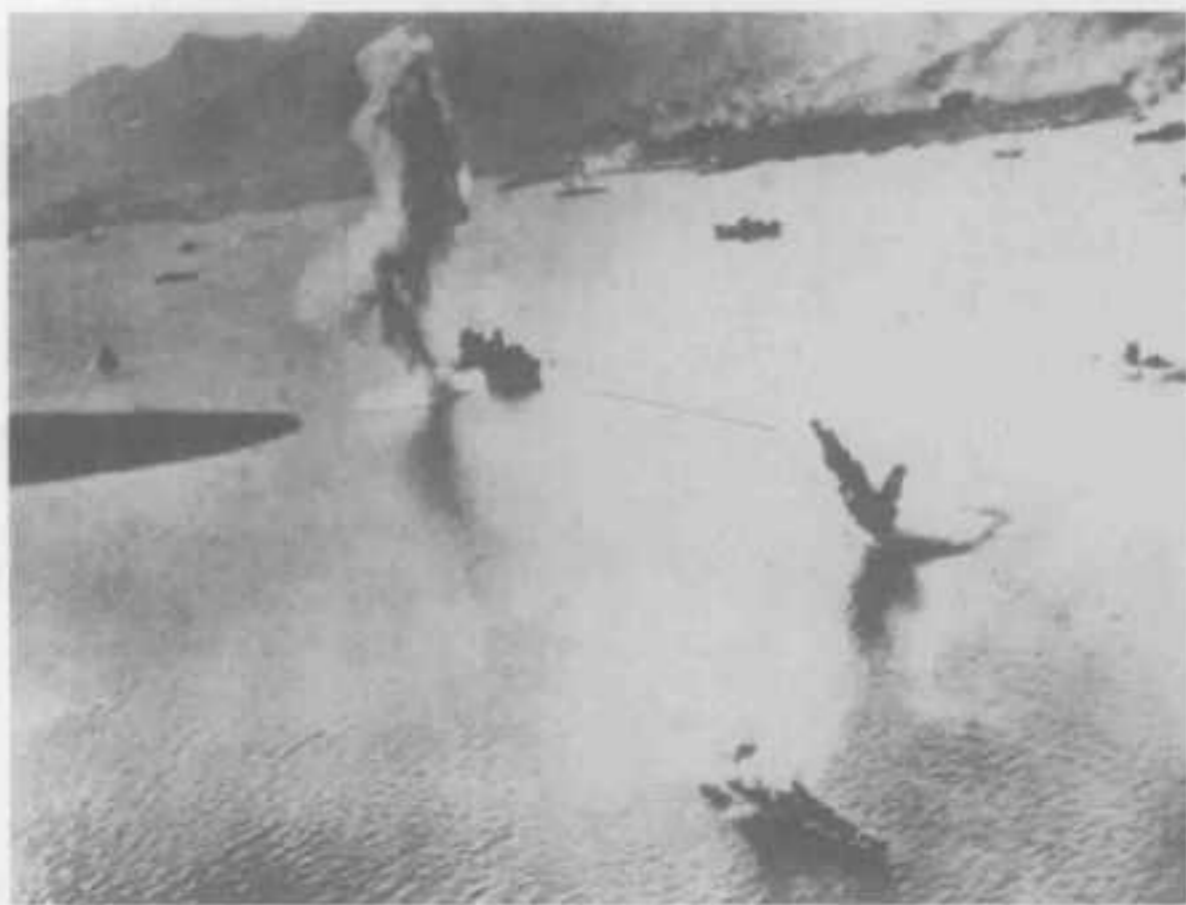
日军20架中岛一式“隼”战斗机从汕头起飞，6架中岛二式“屠龙”战机从九龙起飞拦截。激烈空战，瞬间爆发。双方战机在天空盘旋翻滚，互相追逐。战斗机格斗时，大家都想咬对方的尾巴，便于射击。战机上的机枪喷吐着火光，像一条条狂怒的金蛇，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一架日机的油箱被击中，在空中发生猛烈爆炸，四分五裂的碎片，像天女散花一样在空中飞舞；紧接着又一架日机中弹，又一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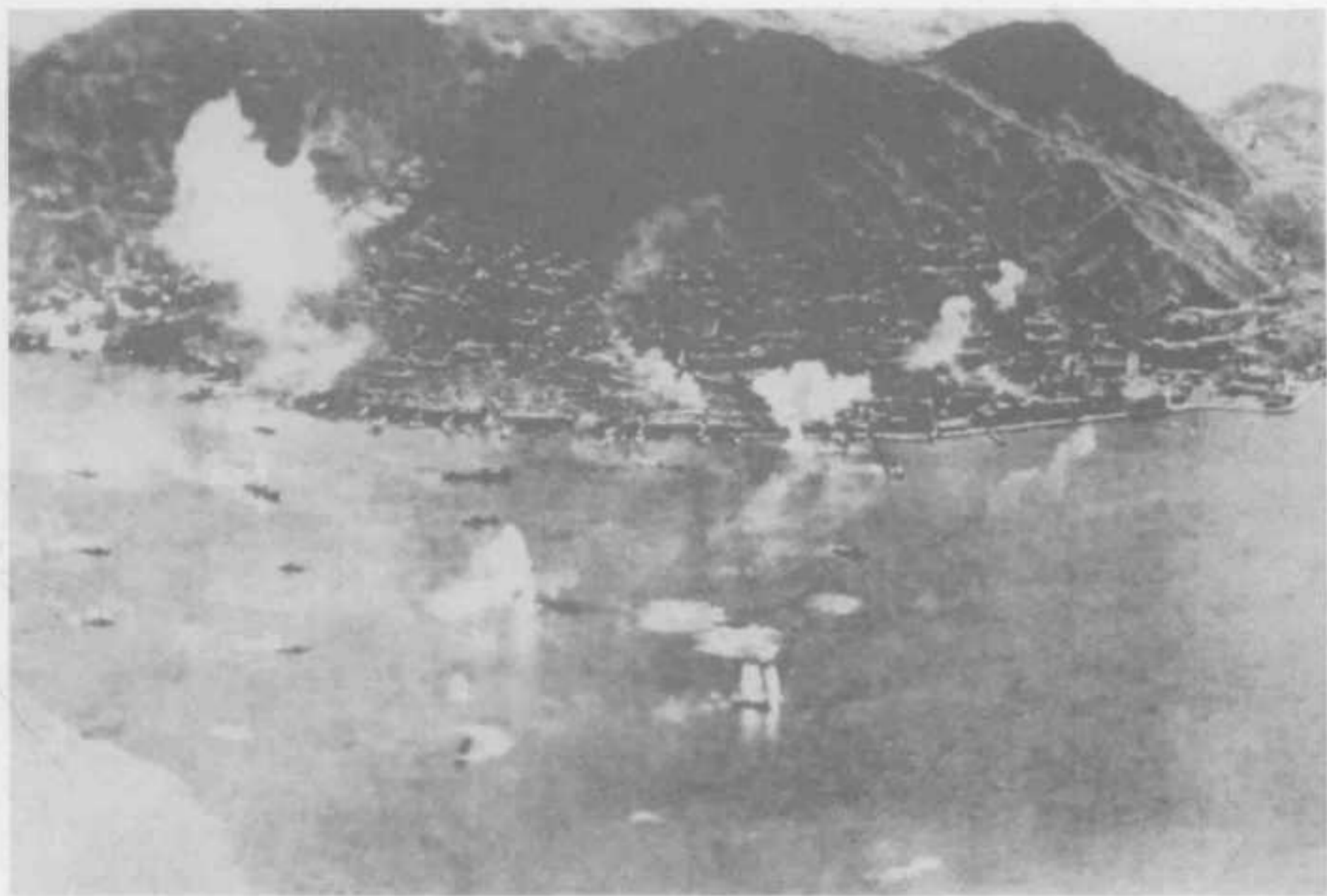
在这场恶战中，先后有18架日机被美军击落。美军也有一架B-25C轰炸机受伤被迫降落在日占区，飞行员和领航员被俘，其余人员逃脱。轰炸机飞返桂林补充油弹，再次出击，轰炸香港的电厂和广州天河机场。10月25日下午再度出击，轰炸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和船只。

盟军B-25C轰炸机



盟军轰炸维多利亚港日军船只





盟军空袭香港

空袭行动突显了盟军情报工作的软肋，他们曾经多次派情报人员到九龙侦察，都无法得到启德机场的准确资料。加强情报工作，遂成为当务之急。香港沦陷后，经游击队营救，安全逃到曲江的英军陆军野战救护队总指挥赖特上校，1942年3月，获得英军高层的批准，并以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的承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成立了英军服务团，负责协助盟军搜集日军在港活动和防卫情报，并设法偷运物资和药物给战俘及其他被拘留人士。服务团名义上隶属于印度陆军，实际上归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军情九处领导，由赖特担任指挥，总部设在桂林。

1943年3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继续执行在华作战任务。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加紧了对香港的轰炸。情报工作显得更加刻不容缓了。8月，英军服务团派出原香港副华民政务司，现任服务团副团长的何礼文（David Ronald Holmes）潜赴沙田区，与港九大队联系，希望港九大队协助英军服务团完成拍摄日军占领九龙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军事设

施的任务。

这个任务落在短枪队头上。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与何礼文在沙田附近的观音山吊草岩村见面。经过商量，初步选择拍摄地点及目标是：从观音山上拍摄日军启德机场、铜锣湾军火仓库、鲤鱼门炮台和兵营。黎明时分，先派人摸上观音山一带，进行侦察，然后再上山进行拍摄。

翌日清晨4时，队伍踏着黎明前的黑暗出发了。据黄冠芳回忆，武工队员按指定路线，先上观音山进行搜索。半小时后，天色渐明，在山下等候的队伍，抬头远眺，终于在熹微晨光的烘托下，看见了搜索队员挥舞的信号旗子：没有发现敌情。黄冠芳和何礼文马上背起摄影器材，沿着崎岖山路，迅速登上观音山，在山上一座炮楼里隐蔽下来。

等太阳出来以后，何礼文按游击队指示的方位目标，把日军在九龙的机场、军火仓库等目标，统统拍摄下来。那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照片相当清晰。当他们完成任务后，山路上，已有不少从九龙城上山打柴的民众了。

这些情报为盟军轰炸日军军事设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黄冠芳仍清楚地记得：

约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10时许，突然从大鹏湾方向上空飞来数架战斗轰炸机，轰炸香港、九龙日军的军事目标，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开始向日军发动进攻了。于是立即通知在观音山放哨的一位同志和当地民兵，注意盟军飞机轰炸敌人目标的情况，把飞机轰炸的弹着点逐一记录下来。这一次轰炸没有命中敌人的主要目标。日军的机场、军火库和兵营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为了把这次轰炸的情况搞得更加清楚，我们马上通知九龙市区中队的方兰、黄扬声两同志组织人员专门收集有关情报，并绘制成简略地图，我们再收集送大队情报室综合，然后再上报司令部转给盟军第十四航空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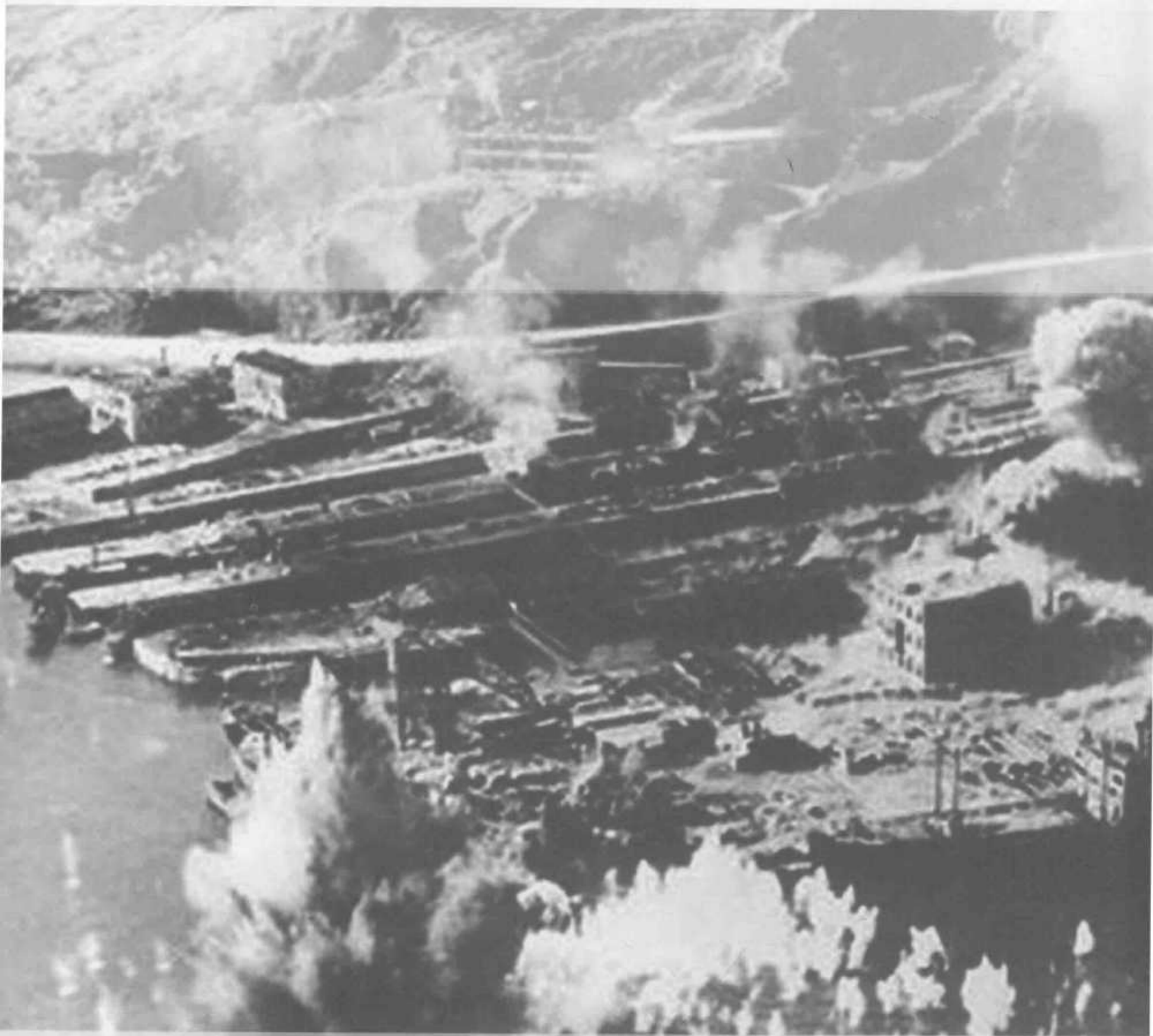
大约又过了十多天，盟军第十四航空队再次派飞机轰炸。这次，日军的铜锣湾军火库、启德机场、鲤鱼门炮台、太古船厂(当时有数艘日军舰在那里修理)等目标，都遭到第十四航空队飞机的猛烈轰炸，几个目标



1 /1944年，克尔所在的第十四航空队进行轰炸日军启德机场的战前部署

2 /盟军轰炸机飞临香港上空





盟军轰炸太古船坞



都熔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机场的十多架战斗机都被炸坏，油库着火，军舰当时被炸沉了两艘，其余遭到了创伤，鲤鱼门炮台和军营也遭到严重破坏，使日军在九龙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的打击。^①

9月2日，盟军飞机大举轰炸了广州和香港。那天阳光朦朦胧胧，透过瓦灰色的云层，向大地洒落下来，能见度并不太好。16架美军战斗机群，从桂林起飞，为空袭九龙的轰炸机护航。一位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服役的中国飞行员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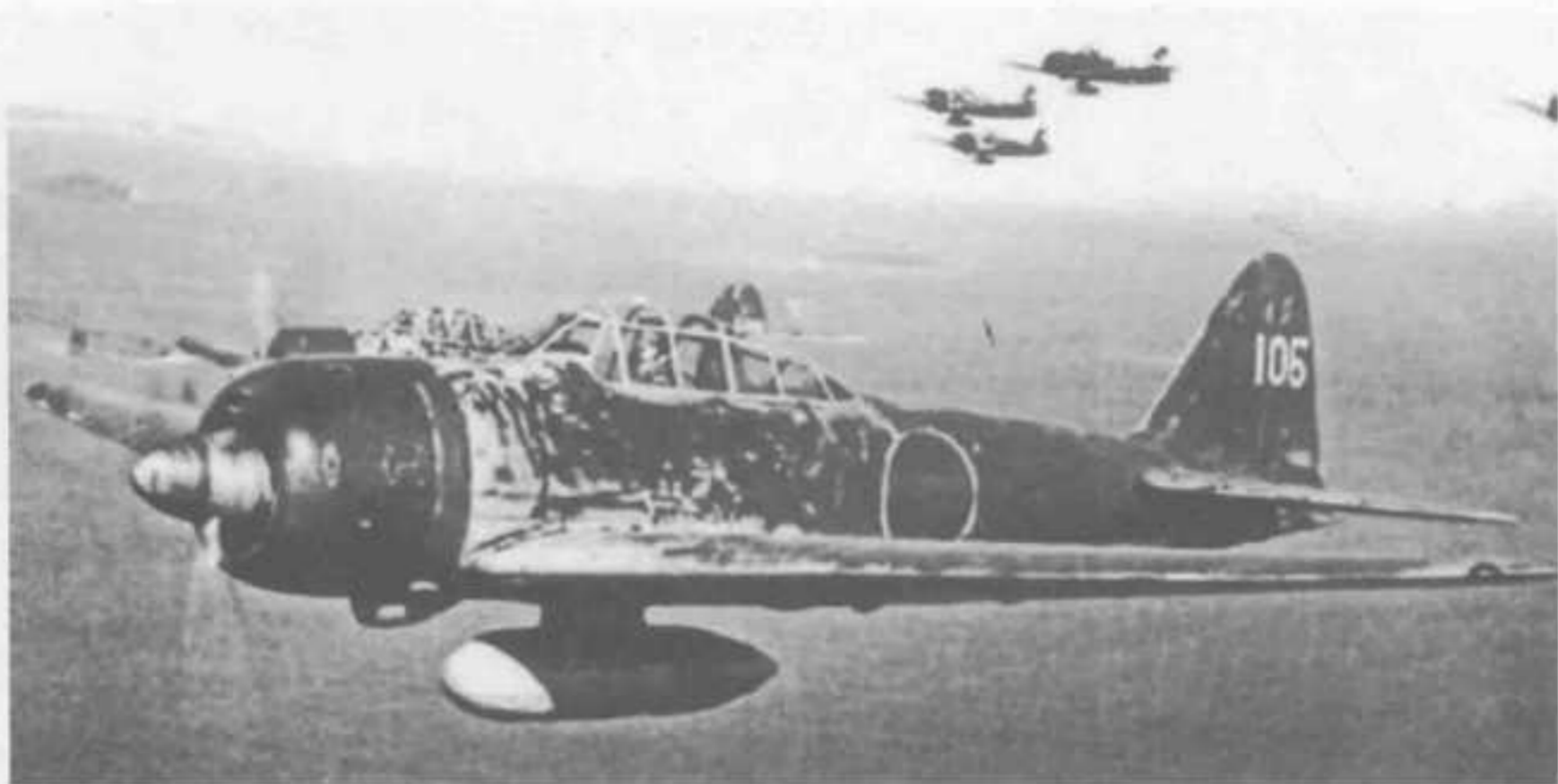
“一想到两年前我们第一批赴美受训学生正是从九龙码头乘远洋轮，横渡太平洋去美国；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开始，祖国的苦难正深。现在又要从空中看到香港、九龙，心头有种难以形容的滋味。”

战斗机编队在梧州上空与轰炸机群会合后，向九龙方向扑去。B-24重型轰炸机开始向九龙船坞投弹，整个尖沙咀一带，笼罩在浓烈的硝烟烈火之中，海面上激起一条条冲天的水柱。日军的零式战机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企图截击盟军的轰炸机，与护航的战斗机编队展开激烈的空中肉搏战。飞机的机关枪子弹，在燃烧的空气中划出纵横交错的火网，炮弹不断开花，尖厉的弹片和子弹左飞右窜，弥漫天空的黑烟仿佛成了一道屏障，使视野受阻，战机在浓烟中穿插，经常差点相撞才看到对方。那位中国飞行员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1943年的夏季，这样紧张激烈的战斗非常频繁。”^②

11月底，盟军接到情报，日军有一艘运载重型武器装备的货船，已抵达九龙，但尚未卸船。第十四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奉命摧毁这批武器，阻止它们投入战场。12月1日，

^① 黄冠芳：《配合英军服务团拍摄九龙日军目标回忆》。

^② 程敦荣：《光荣的岁月，悲壮的历史》，引自陈应明、廖新华编著：《浴血长空》，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日军零式战机

8架P-51A和24架P-40K掩护13架B-25G轰炸机，由桂林起飞，空袭九龙码头和红磡船坞。下午，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机群从西往东飞抵九龙上空，背对着太阳，令地上的防空火力难以瞄准。密集的航空弹像雨点般落下，停泊在码头的一艘大型货轮和一艘维修中的船只，被炸得支离破碎，码头上的厂房、吊机等也纷纷中弹起火。中美飞机完成任务返航至中山县上空时，遭到日军零式战机拦截。经过一轮激战，盟军击落日机两架，自损一架。

1944年2月11日，6架盟军B-25J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突破日军的防空炮火，从5000米高空向启德机场投下20多颗航空弹，虽然有部分商业区和平民住宅被误中，但日军损失惨重。10月16日，发生了一宗惨剧，美军第11轰炸机中队袭击九龙时，炸弹落在正在上课的红磡小学校，几乎全体教师及学生死亡，连同附近民居共300人死亡，300人受伤。1944年12月24日，盟军轰炸机炸中省港船“岭南丸”，造成数百人的死伤。最严重的一次误炸，是1945年1月，盟军飞机的炸弹炸中湾仔市中心，酿成市民约1000人死亡，3000人受伤。另一次是1945年4月，误炸铜锣湾法国医院（圣保禄医院）及铜锣湾避风塘，造成49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尽管香港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他们对盟军的空袭，却并无

什么怨言，因为对日本侵略者，他们恨入骨髓，恒抱有“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的心态。盟军的轰炸愈频密，人们看得愈清楚，日本人的空中力量，已陷入衰竭，他们几乎挡不住盟军的任何一次空袭。盟军可以在任意的时间，随便飞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扔下他们所能携带的全部炸弹。日本人快完蛋了，胜利的曙光已在前头了！

在东江纵队的协助下，英军服务团成功地救出了数以百计的香港平民和38名在香港执行军事任务时被日军俘获的美军战机机师。同时，英军服务团还为逃到内地的香港军人、难民提供接济和援助，包括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治、食物、疫苗注射等。由于赖特的杰出贡献，1942年、1944年他先后获英国颁授的OBE勋衔和CBE勋衔。

尽管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的合作为时并不长便奉命中止，但取得令人瞩目的战果，令美国大受鼓舞与启发。1944年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向重庆政府提出，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美军驻重庆高级顾问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谈判，要求派八队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合作。但实际上最后只有两队观察组成行，一队去了延安，一队去了东江纵队。

1944年10月7日，欧戴易（Merrills.Ady）少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东江纵队，要求进行情报合作。欧戴易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的技术代表，在第十四航空队担任参谋。他送给了曾生司令员一支精巧的小手枪和一千多粒治疟疾的金鸡纳霜，作为见面礼。对于整天在荒山野岭出沒的游击队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药物。

东江纵队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请示电报。10月13日，周恩来复电，同意与美军在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等方面进行合作。随即，东江纵队抽调袁庚负责筹备联络处的工作。1944年11月1日，东江纵队再次就联络处的筹备情况请示中央。中央同意在东江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正式任命袁庚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主管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敌占区的情报和交换情报的工作。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广东宝安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先后任训练队教官、护航大队队长。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在罗浮山，欧戴易的观察组也设在罗浮山北侧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家



1945年，驻守香港新界边防的日军撤离粉岭。

里。他们通过东纵架设在罗浮山上的电台，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把有关情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东江纵队联络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日军在香港启德、广州天河、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以及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由于有了游击队提供的这些准确的情报，盟军对香港的空袭，愈来愈有成效了。

陈纳德将军、第十四航空队曲江办事处、昆明办事处，均先后给东纵发来感谢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对你们近来关于敌军及其活动、驻地和番号的报告特别感到喜悦，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

企图和活动，帮助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

欧戴易在调离观察组时，给曾生写的告别信，特别提到了袁庚所做的贡献，令他深感敬佩：“你们经过袁先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我感到极大满意，请把我的深切情意向尊敬的袁先生及他的工作人员表达。”^①

东江纵队所做的贡献，盟军都铭记于心，1947年2月，英皇乔治六世邀请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到伦敦参加胜利大游行，并授予MBE（大英帝国员佐）勋章，这是在当时唯一获得英皇勋章的共产党人。

最后的战争

1944年，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在所有战场上败象纷呈。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虽然还死鸭子嘴硬，向国际社会表示：“为求自保自卫与东亚之解放而作战之决心，丝毫未感动摇。德国之投降，不能令日本之作战目标有丝毫之变更。”但无可否认，其国力已濒临竭尽，大势已去，投降只是迟早的事。

早在战争刚开始的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发表《大西洋宪章》联合声明，确认被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应恢复其权利。1941年4月，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调任外交部部长，于途经美国回国途中，受命与美国政府交涉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美国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等有关权益，并于战后就此事举行正式谈判。由于美国带头表态，英国外交部随后也发表声明称，表示打算于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

英国海军少将夏忒准备宣布英国海军舰队到达香港



^① 引自《东江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权并解决有关问题。7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做了同样的表示。

1942年1月，中国参与签订华盛顿26国反侵略共同宣言，被列为四强之一，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内地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迅猛高涨。中国政府开始就归还九龙（新界）租借地和英国展开谈判。

但英国始终认定，香港是英国属土，丘吉尔坚决反对把香港归还中国。在1943年11月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丘吉尔愤然表示：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言下之意，香港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1944年9月以后，盟军对香港的空袭愈来愈频密，预示着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势逐渐丧失，战争已接近尾声，盟军形势一片大好，英国更不肯让步了。1945年4月，丘吉尔公然声言：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

在英国的强硬立场面前，为了顾及盟军的团结，有利于对法西斯阵营展开即将来临的全面大反攻，蒋介石被迫同意让步。1943年1月11日《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签订，并不包括香港、九龙、新界问题在内。

1945年7月26日，一个全球瞩目的星期四，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8月7日，报纸首次公布关于日本广岛被一颗“新型炸弹”轰炸的消息，人们并不知道这颗炸弹，就是原子弹。日本大本营的公告很简单：“一、昨6日广岛市因受敌机B-29型小编队之攻击，发生相当损害；二、敌机于此次攻击中，似使用新式炸弹，详细情形刻正调查中。”^①三天后，第二颗“新式炸弹”落在日本长崎市，两城尽毁。

那个年头，不少香港人每天都躲在家里收听短波广播，8月15日，透过“丝丝沙沙”的电流声，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出现了：“今天中午11时30分，东京电台播出了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日本政府已向盟

^① 《申报》1945年8月8日。

国无条件投降。美国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正式宣布，特派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帅接受日本投降。麦克阿瑟元帅于本日通知日皇裕仁，渠已被派为盟军统帅，有权直接与日本当局接洽尽早停战……”刹那间，所有在香港沦陷期间受尽磨难的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狂喜之中：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终于到头了！

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



市民为欢庆日本投降而举行的舞狮活动



1945年香港社会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①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夏忒（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少将率领的太平洋舰队，正全速向香港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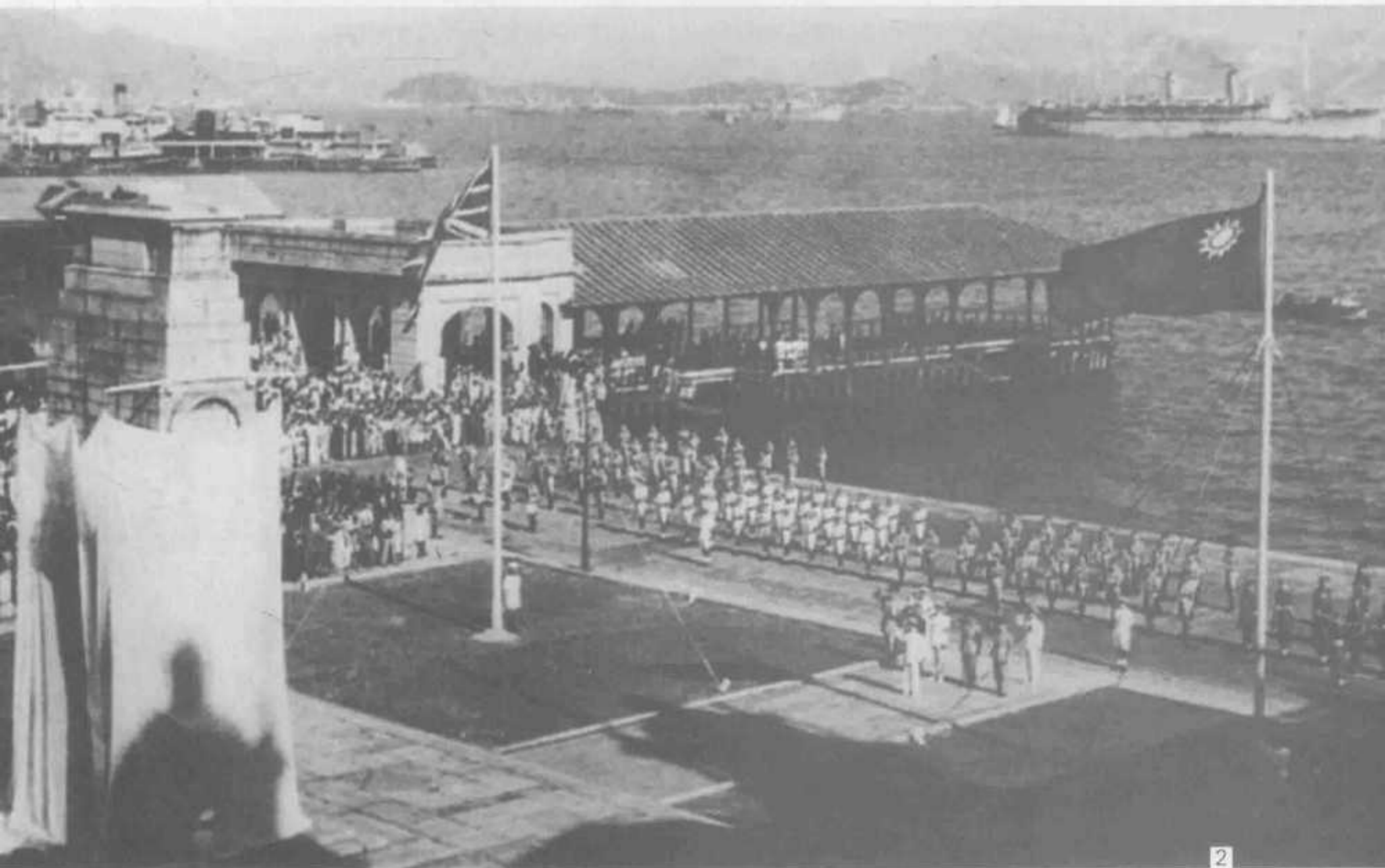
8月16日，日本的香港总督部宣布取消灯火管制，但依然实行宵禁。8月18日，商店和居民已纷纷挂起中国国旗。19日，香港前辅政司詹逊（Franklin Charles Gimson）从战俘营中获释，宣称奉英国政府殖民部指令，出任署理港督，与原香港政府被关在战俘营中的官员组织临时政府。23日，总督部宣称，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在未接到指示之前，当局依然履行原有职务，暂时不遣散华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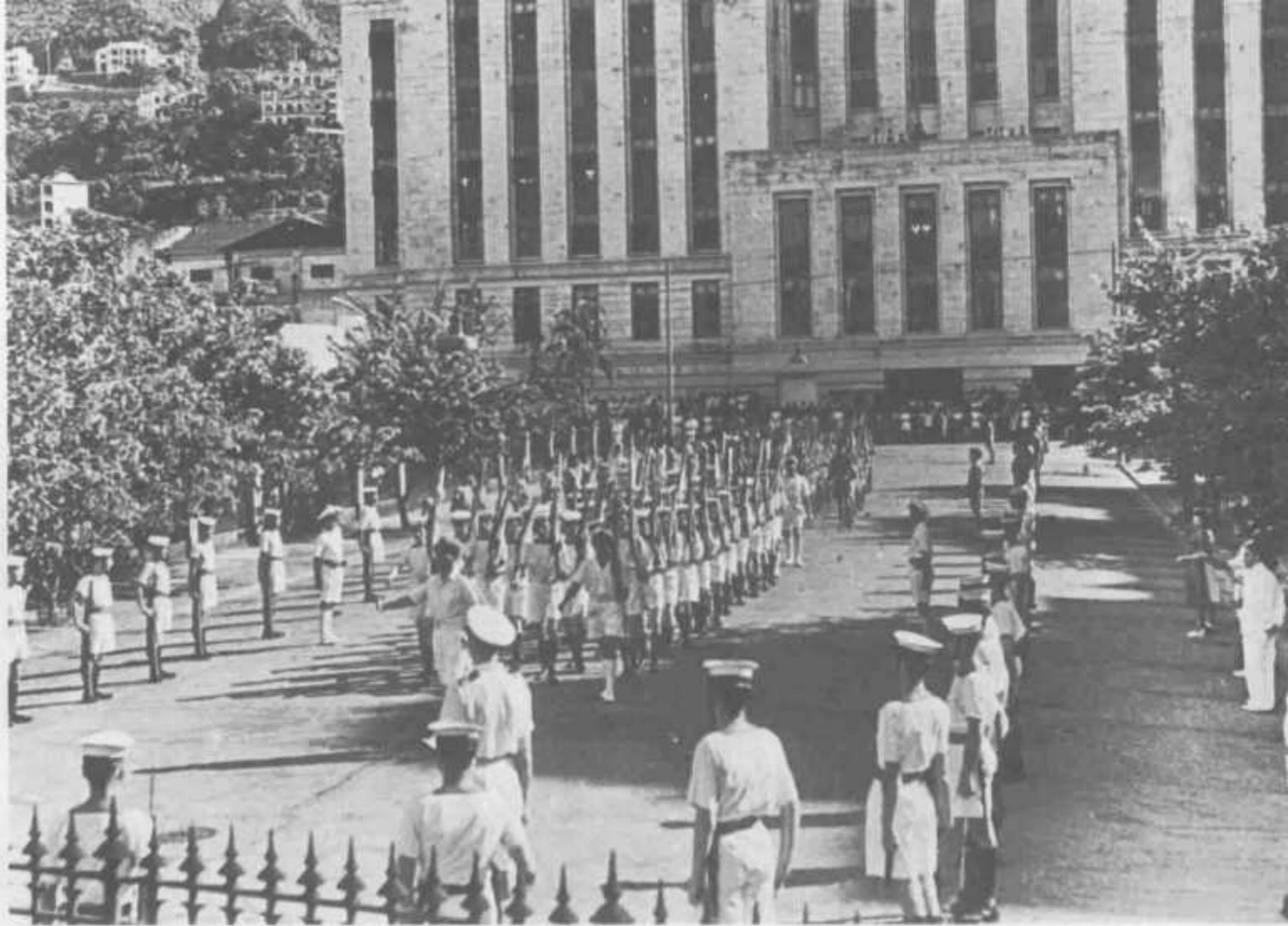
① 《申报》1945年8月18日。

工。29日，原港督杨慕琦在沈阳集中营获释，飞赴重庆。

由于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蒋介石下令由第十三军赴香港受降，新一军、新六军开入九龙，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夏慤8月30日在香港登陆后，重新升起了米字旗，并拒绝中国军队参加香港受降，中国只能派代表旁观受降签字仪式。

- 1 / 英国国旗于赤柱集中营内徐徐升起
- 2 / 8月30日英军“光复”香港。图为中英双方在和平纪念碑前举行的胜利纪念仪式





在受降仪式中担任仪仗队的英国太平洋舰队成员，在皇后像广场进行步操

9月1日，驻港英军在中环皇后广场举行接管香港仪式。夏悫出任总督，詹逊出任副总督兼军政委员会委员长，组成了临时的军政府。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字投降。9月4日，英军接收九龙。



日本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在英国皇家海军护送下到达港督府出席投降仪式



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向日本代表宣读投降条约协定



1 /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2 / 日本海军中将藤田类
太郎签署投降文件



于受降仪式中交出佩刀的
日军代表陆军少将冈田梅吉



当时社会纷纷乱乱，三山五岳的地痞烂仔，又蠢蠢欲动，英军力量不足，无法迅速有效地恢复政权，某些地方遂成管治真空。9月上旬，夏悫派人到沙头角联系港九大队，希望双方共同维持九龙新界的治安。东江纵队派出由袁庚、黄作梅等人组成的小组，到九龙半岛酒店英军司令部与夏悫会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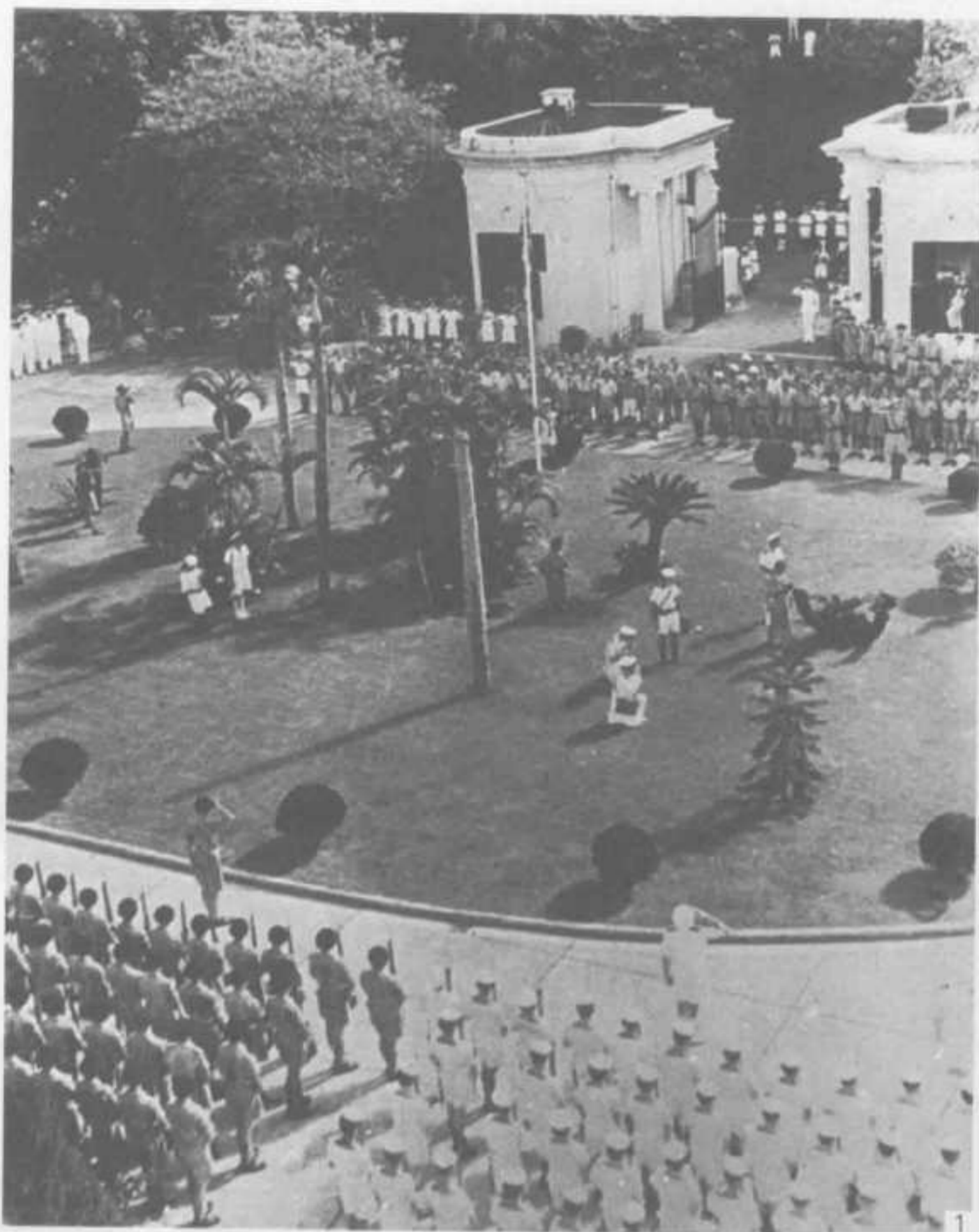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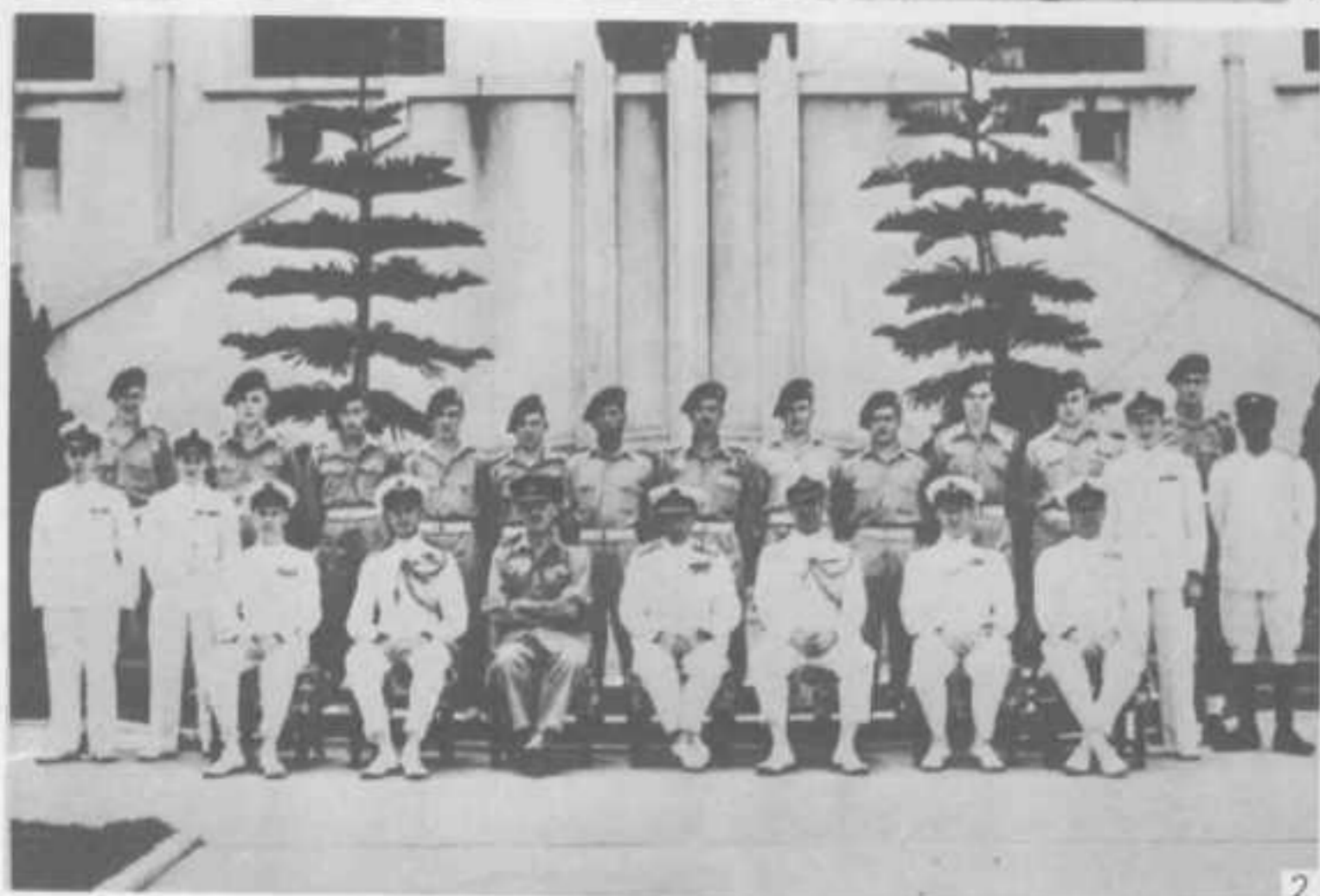


2

- 1 / 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在日军签署投降文件后，于港督府检阅皇家海军
- 2 / 重返香港履新的港督杨慕琦爵士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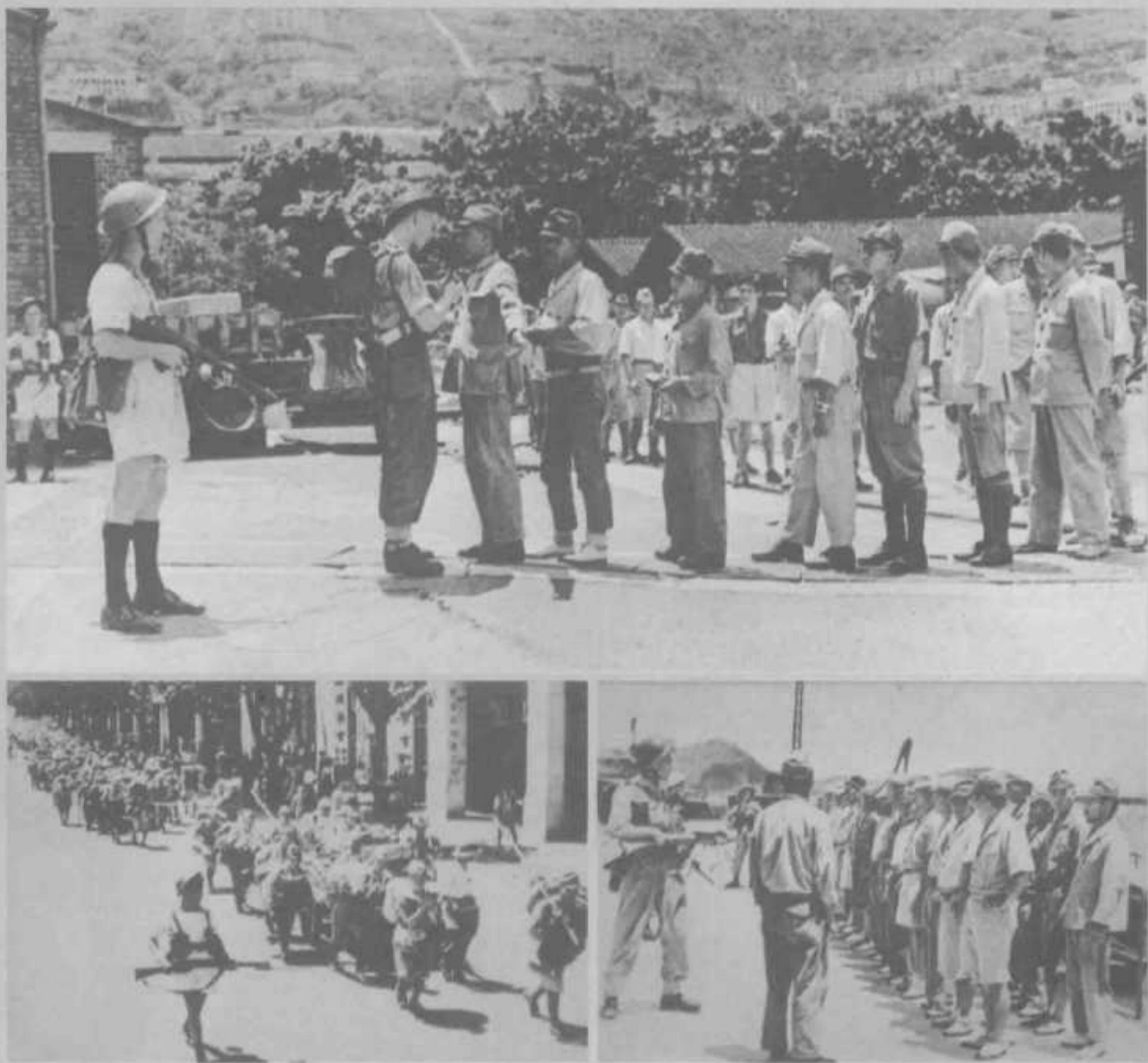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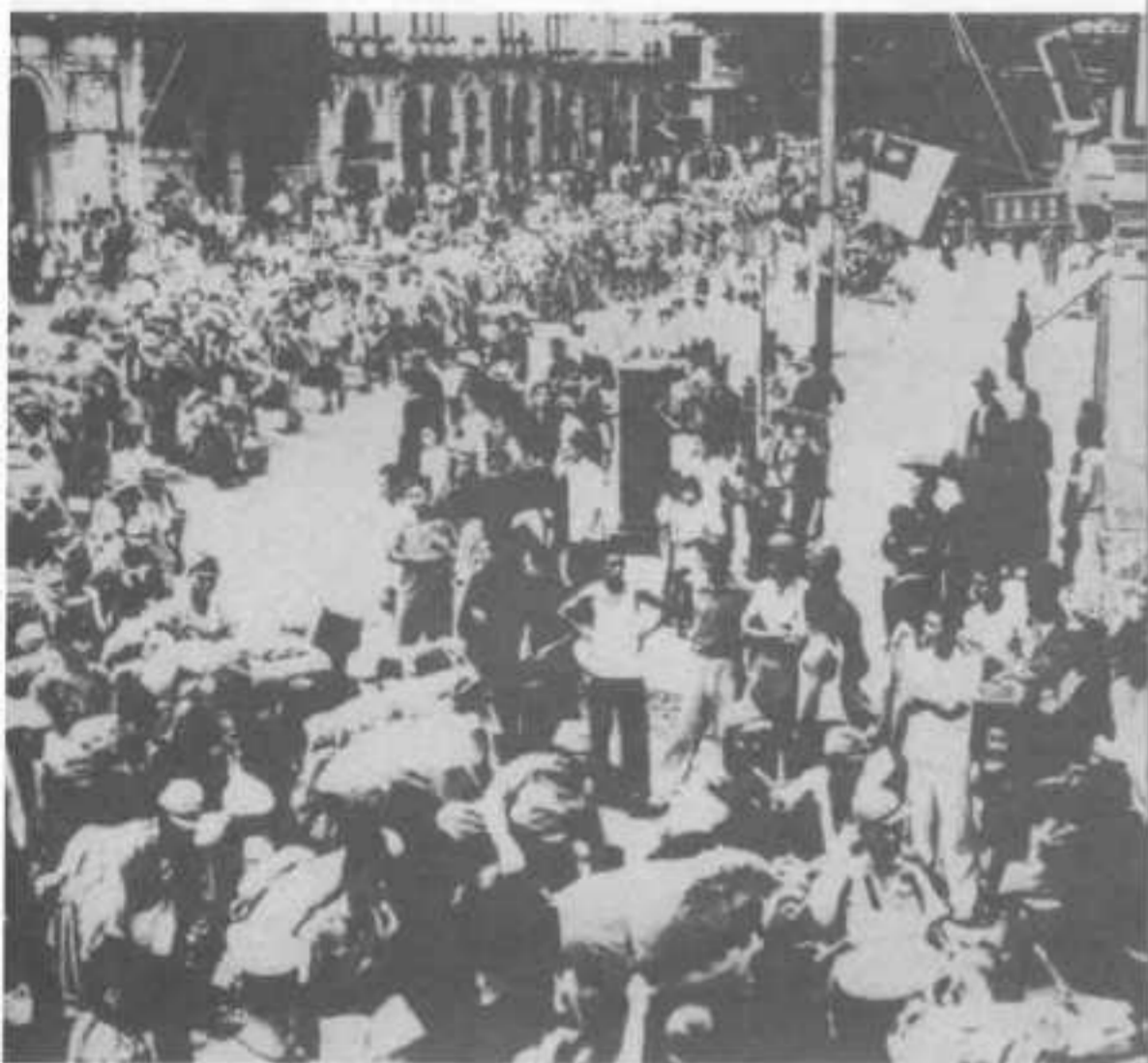
- 1 / 投降仪式后，港督府升起英国国旗，英国海员及皇家海军举枪敬礼
- 2 / 海军上将夏忒及其同僚于港督府主楼前留影

夏惠希望港九大队在新界地区停留一段时间，维持治安。港九大队慨然应允，同意留下必要的干部，组织各地的民众武装，负起新界地区维持治安的责任。作为回报，英方同意东江纵队在九龙设立办事处，并在大埔的康乐书院开办医院，治疗东江纵队的伤病员。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奉命发表宣言，向港九同胞告别，一周内撤出港九地区。大部人员后来随东江纵队北撤，一部分留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员复员。

中国的第十三军于9月中旬接收广九铁路沿线，解除当地日军武装，但他们却无法越过深圳河分界线。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日军俘虏和汉奸逃入英界，中国军队前往追捕，但被英方军警拦阻，双方爆发冲突，中方士兵高呼“收回港

英国海军及陆军人员拘禁在香港投降的日军





日军战俘被送往集中营

九”，并鸣枪示威。这类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可见中国官兵憋了一肚子的气。

为了照顾中方面子，英方同意国民政府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中转站，并从日军手中接受装备。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共有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经香港从海路北运，包括第十三军、新一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三军以及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

1946年4月30日，港督杨慕琦重返香港，复任总督，正式成立香港政府。日本人修建的忠灵塔被炸毁了。所有被改为日本名字的地方，一律恢复原有名字。香港之战的日本指挥官酒井隆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6年9月13日执行枪决。香港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提早获释，1967年死于日本。日军支那派遣军司令官、

准备经香港北上的国民党士兵摄于佐敦道码头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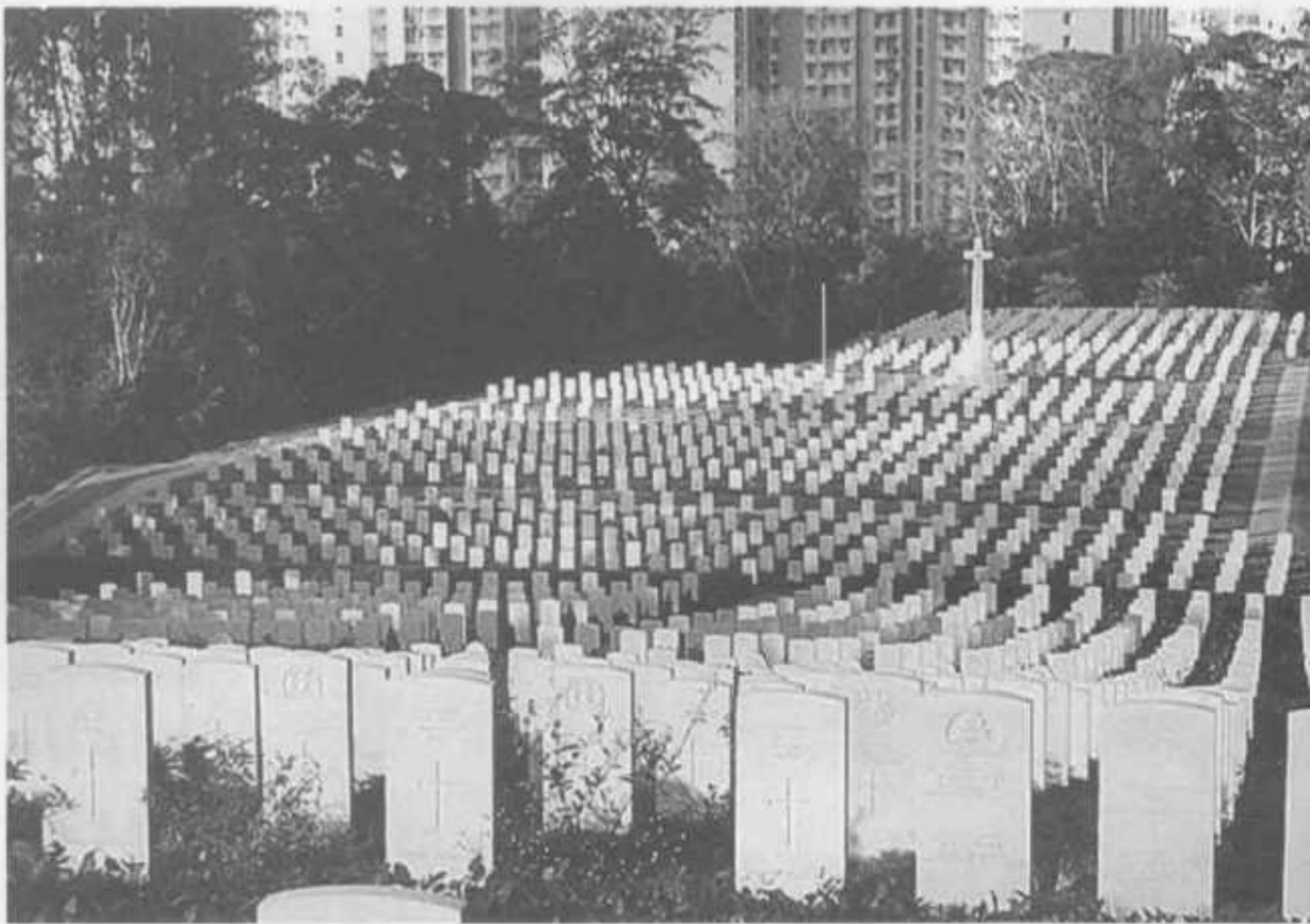
1944年12月接替矶谷廉介担任香港占领地总督的田中久一，被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7年3月在广州执行枪决。香港战争法庭亦对一批乙、丙级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依据《大英律法》，22人被判死刑，在赤柱监狱处以绞刑；14人因证据不足获释；其余被判处六个月至终身监禁。

战后，为了纪念香港保卫战中死难的官兵，港英政府修建了赤柱军人坟场和西湾国殇坟场。在赤柱军人坟场，安葬了691名在香港保卫战中阵亡的官兵遗骸。西湾国殇坟场则安葬了1578名战死沙场的军人和少数平民，其中有59名海军，1406名陆军，67名空军，18名商船队人员，20名香港本地义勇军和8名平民。他们来自英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缅甸、荷兰以及香港和其他地方。

如今，他们都长眠在同一片蓝天之下。

在港英管治时期，港九大队对香港抗战的贡献，长期被埋

香港西湾国殇坟场





抗战胜利重光邮票

没，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褒扬。直到香港回归之后，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大会堂隆重举行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仪式，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龕内。特区政府立法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并依据太平洋战争抚恤条例，对烈士家属、曾经负伤和被俘、被虐待的队员给予抚恤，在港有永久居住权的队员及家属享受公务员的医疗待遇。

燃烧着血与火的历史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

然而，历史遗留了太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军票问题、慰安妇问题、掳日劳工问题，给香港人留下的深创剧痛，至今没有能够完全抚平。

在三年零八个月艰苦岁月里，香港市民与全国所有沦陷区的人民一样，承受了这场旷世浩劫带来的深重苦难，也为保存中华国脉民魂，为文化道统的传承不绝，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悲壮事业，做出了英勇的抗争与牺牲。他们终于迎来了胜利。

尽管战后的香港，一片凋敝，像个巨大的废墟，乱七八糟，丑陋不堪，整个社会似乎停顿了，不复有生机。但即使在最破败的景象里，依然透露着人们不灭的希望：只要假以时日，香港人一定把这颗珍珠上的尘垢擦干净，让她现出璀璨的光芒。